

上帝之饮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6 GLASSES

六个 瓶子 里的历史

(Tom Standage)

[美] 汤姆·斯丹迪奇 —— 著

吴平 葛文聪 满海霞 郑坚 —— 译

啤酒、葡萄酒、烈酒、咖啡、茶、可乐，
直到今天，我们还用这几种饮品来庆祝新生，
纪念故人、促成合约的签订，建立并巩固社会关系，
提神醒脑或消除烦恼，做药引子济世救人。

文明的进程
No.

1

上帝之饮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6 GLASSES

六个 瓶子 里的历史

(Tom Standage)

【美】汤姆·斯丹迪奇 —— 著

吴平 葛文聪 满海霞 郑坚 —— 译

啤酒、葡萄酒、烈酒、咖啡、茶、可乐，
直到今天，我们还用这几种饮品来庆祝新生，
纪念故人、促成合约的签订，建立并巩固社会关系，
提神醒脑或消除烦恼，做药引子济世救人。

文明的
进程

No.

①

中信出版集团

上帝之饮

——六个瓶子里的历史

[美] 汤姆·斯丹迪奇 著

吴平 葛文聪 满海霞 郑坚 译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
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
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
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为了方便
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
网站，网站的名称为：周读网
址：www.ireadweek.com

目录

前言

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的啤酒

石器时代的酿造历史

文明社会的啤酒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葡萄酒

爱上葡萄酒

帝国的藤蔓

殖民时期的烈酒

烈酒与远航

帮助美国建国的饮品

理性时代的咖啡

伟大的提神剂

咖啡馆网络

茶与日不落帝国

茶之帝国

茶之魔力

可口可乐与美国的崛起

从苏打水到可口可乐

瓶子里的全球化

译者后记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加小编微信一起读书

小编微信号：2338856113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20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 1、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 2、 每年豆瓣，当当，亚马逊年度图书销售排行榜
- 3、 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 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著
- 6、 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 7、 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 8、 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 9、 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 10、 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和得到电子书

也可以在我的网站（周读）www.ireadweek.com

自行下载

备用微信公众号：一种思路



前言

人类的历史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历史。

——卡尔·波普尔，科学哲学家
(1902~1994)

干渴比饥饿更致命。人没有食物，尚可维系数日。若是缺水，则三两日都难以生存。对生命而言，除了呼吸，没有什么比水更重要。数万年前，由于没有运水、储水的容器，远古人类便临水而居，或近江河湖泊，或依清泉溪流，以便获取足够的水来维持生命。自古以来，水源的分布制约并引导了人类的发展，一些饮品应运而生，相继扮演了人类历史的塑造者。

直到1万年前，人类才发现清水以外的其他饮品。这些饮品并非取之不尽，信手拈来，而需经过复杂的酿制过程。它们的出现向长期以来哺育人类的清水发起了挑战。在随后的岁月中，除了充当人类聚居地受污染水源的替代品，它们还在历史变迁中分别扮演过各式各样的角色：如充当货币，用于宗教仪式，作为党派政治立场的象

征，引发哲学及艺术灵感的源泉，上流社会彰显权贵的珍物，征服异国或平息内乱的武器等等。直到今天，我们还用各种饮品来庆祝新生，纪念故人，促成合约的签订，建立并巩固社会关系，提神醒脑或消除烦恼，做药引子济世救人。

历史潮起潮落。从石器时代的村落、古希腊的餐厅到启蒙时代的咖啡馆，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点的变换、文化的更迭，不同的饮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各自的重要作用。当一种饮品满足了人们的某种需要，或顺应了某个时代的历史潮流，它便流行起来。有时候，流行饮品还能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影响历史的走向。考古学家按照不同时期人类使用的不同器具划分历史时代——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等——那么我们也可以按不同时期流行的不同饮品来划分。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的是六种饮品——啤酒、葡萄酒、烈酒、咖啡、茶还有可乐，它们勾勒了世界历史的走向。其中三种含酒精，另外三种含咖啡因；它们之间有一点是相同的：在古往今来的历史变迁中，它们都标志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期。

农业的兴起使人类踏上了通往现代社会之路，标志其开端的是谷物的种植。最早的农业出现在约1万年前的近东地区；同期，啤酒也随之

问世。5 000年后，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大规模有组织的农业生产使人类有了剩余谷物，从而为这两个同期文化的崛起奠定了物质基础。剩余谷物的出现使一小部分人不用再去田间耕作。于是，全职教士、牧师、记事员及工匠出现了。对于世界上第一批城市居民及第一批文献作者而言，啤酒不仅是滋养生命的甘霖，同时还和面包一起充当着他们的口粮及工资。因为当时谷物就是社会的经济基础。

在公元前的千年岁月当中，古希腊城邦内蓬勃兴起的文化，引发了政治、哲学、科学、文化等方面的诸多发展和进步。这些文化成果直至今天还依然支撑着现代西方思想。葡萄酒曾是地中海文明的血液，是将古希腊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大规模海运贸易的基础。当时，关于诗歌、政治、哲学的探讨都是在正式的酒会上进行的。在这类研讨会上，与会者共饮一碗稀释的葡萄酒。到了罗马帝国统治时期，饮用葡萄酒的风俗继续流传。当时，罗马帝国森严的等级制度在对葡萄酒类别和等级的精细划分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世界上两大主要宗教对葡萄酒曾持有截然相反的态度。基督教的圣餐仪式中，葡萄酒是主要饮品。但随着罗马帝国的瓦解，伊斯兰教的兴起，葡萄酒就在其诞生的地方被明令禁止了。

罗马帝国覆灭1 000年后，人们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重新追索，燃起了西方思想复兴的星火。这些古文化被阿拉伯世界的学者们完好地保存下来并进一步发展，欧洲的黑暗年代出现了曙光。同时，为了控制阿拉伯人对东方贸易的垄断，欧洲的探险家们急于向海外扩张。他们的航船西至美洲大陆，东达印度和中国，就这样，全球航海路线初步建立了。欧洲诸国竞相出海，开始了对世界的瓜分。在这段探险时期，一系列新生饮品涌现出来。它们的出现应归功于一种蒸馏技术的发明（事实上，这种蒸馏技术源自古代的炼金术，后经阿拉伯学者们改进而得）。蒸馏后的酒类饮品酒精浓度高，性质稳定，因此非常适宜海运。当时，朗姆酒、白兰地、威士忌等饮品还充当着买卖奴隶的货币，流通甚广。尤其是在北美殖民地，这些饮品甚至能影响政坛风云变幻，对美国的建立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地理扩张，方兴未艾；文化扩张，接踵而至。西方思想家们冲破古希腊传统观念的束缚，建立了一套新型的关于政治、经济、哲学、科学的理论。在这个理性时代，一统天下的饮品是咖啡，一种由中东传入欧洲的神秘而时尚的饮品。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兴起、遍地出现的咖啡馆，与出售酒精饮料的酒馆性质截然不同。咖啡馆逐渐发展成为政治对话、商业谈判及文化交流的主要

场所。咖啡能使人头脑清晰、思维敏捷，因此成了科学家、哲学家及商人的理想饮品。咖啡馆讨论引导人们建立起科学社会、新闻报业及经济机构，并为革命思想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种现象在法国尤为突出。

后来，在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向咖啡发起了挑战。茶在欧洲的风靡促使欧洲人开启了一条通往东方的财源滚滚的贸易航线，气势空前地巩固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并最终使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个全球超级大国。当茶发展成为英国的国饮时，就产生了保证茶叶稳定供给的需求，它深深影响了英国的外交政策，对美国的独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侵蚀了中国古代文明，并最终导致茶在印度的大规模生产。

碳酸饮料起源于18世纪的欧洲。100年后，随着可口可乐的发明，美国的软饮料自成一格。可口可乐是由一位亚特兰大药剂师配制出来的，最初用作兴奋剂，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美国的国饮。成为了帮助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活跃的消费资本主义的象征。在20世纪的岁月当中，可口可乐随征战四海的美国大兵一起巡游世界，继而成为世界上最广为人知、销遍全球的产品。如今，可口可乐又成了颇具争议的全球一体化市场的代

表。

饮品与历史的沉浮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历史的走向也有着重大的影响；这种密切和重大远远超出了大众对饮品的认识。谁喝了什么？为什么喝？饮品从何而得？要了解这样的细节问题，你需要了解诸多领域的历史：农业史、哲学史、宗教史、医药史、科学技术发展史及商业发展史。本书所关注的六种饮品，向您展示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经历了岁月的沧桑巨变之后，直至今天，这些饮品还依然存留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它们如同一本本液态典籍，记录着过往岁月中曾经推动历史的车轮走向现代世界的各种力量，让人们忆起那些早已逝去的年代。

了解这些饮品的历史由来，你所钟爱的饮品定会更具风情。

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的啤酒

Beer in Mesopotamia and Egypt

石器时代的酿造历史

人类文明与酿酒密不可分。

——约翰·西尔第，美国诗人
(1916~1986)

“一杯”史前花絮

大约5万年前，人类走出非洲。他们以族群为单位过着游牧采集的生活，每个族群约30人。他们钻山洞、住木棚、搭皮帐篷，靠打猎捕鱼、采集野果为生，为寻找季节性的食物经常搬迁临时的“家”。他们所使用的工具包括弓箭、鱼钩、骨针等。直到12 000年前，人类的这种生活方式才发生了显著的转变：住在近东的人类放弃了旧石器时代以采集打猎为主的古老生活方式，开始以村落的形式安定下来，从事农业生产，而这些村落最终发展成为世界上首批城市。他们还发明了若干新技术，如制陶、带轮车和文字等。

自从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即在非洲发现的15万年前的人类）出现之后，水就成为人类最

基本的饮品。水是生命之源，人体的2/3由水组成，世界上任何生命都离不开水。但是，当人类转向一种比采集狩猎更稳定的生活方式之后，他们开始钟情于由大麦和小麦这些最早人工栽培的谷物发酵而成的新饮品。这种饮品成了社会、宗教、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了人类早期文明的主要饮品，最早在人类走向现代文明之路上流光溢彩、绽放活力——它就是啤酒。

我们还不知道人类酿造世界上第一桶啤酒的确切时间，但可以确定，公元前1万年以前是没有啤酒的。啤酒在近东地区广为饮用应该是在公元前4000年。这可以从一幅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今天的伊拉克地区）的壁画上找到证据，上面画着两人正用苇管从一个陶制大酒坛中吸饮啤酒（因为古时酿的啤酒表面会漂有谷粒、谷壳和其他杂质，古人用苇管吸饮以避免把杂质喝进嘴里）。



这幅图案刻制在一枚图章上，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提坡高拉。图案大约刻制于公元前4000年，表现了两人用苇管从大酒坛中吸饮啤酒的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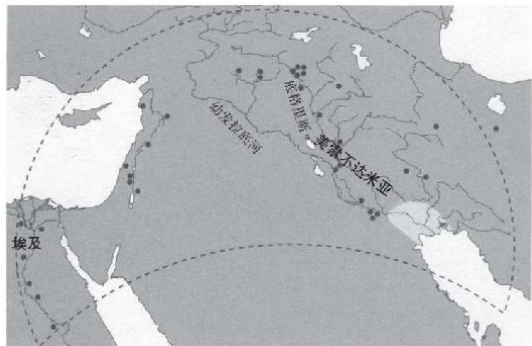
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大约出现在公元前3400年，所以早期的文字记载不能直接帮助我们弄清啤酒的起源。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啤酒的

出现与谷物的人工种植和农耕方式的应用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谷物正是酿造啤酒的原料。啤酒是在人类生活方式从游牧到定居的变革时期产生的，在此之后，尤其在城市出现以后，整个人类社会机制和社会关系骤然变得复杂起来。啤酒是人类史前文明的液态遗迹，它的起源与文明的起源密切相关，难以分割。

发现啤酒

人类并非发明了啤酒，而是发现了啤酒。公元前1万年左右，最后一个冰河时代末期，因为生活在新月沃地的人们大都以采集野生谷物为生，使得啤酒的发现成为必然。新月沃地从今天的埃及向北，沿地中海一直延伸到土耳其的东南部，再向南触及伊拉克、伊朗边境，因其地域形状恰似一弯新月而得名。冰河时代结束之后，该地区的高地为野绵羊、野山羊、野牛和野猪的繁殖提供了理想的环境，其中的一些区域生长着茂密的野生小麦和大麦，为以采猎为生的人类提供了极为丰富的食物。人们不但捕猎动物、采集可食用的植物，还大量收获野生谷物。这些谷物虽不十分美味但来源可靠；虽不太适合生食，但可以粗粗地砸碎或碾碎，用水泡着吃。最初，人们

可能只用谷物做汤：把鱼、坚果、浆果之类和水混在一起，放入泥或草木灰抹的篮子里，然后用小木叉将烧热的石头扔进去，谷物中含有少量淀粉粒，遇到热水膨胀破裂，溶入水中，使汤变得更加黏稠。



新月沃地位于近东，是人类最早从事农业生产并大规模定居的地区（图中所示虚线内地带）。

很快，人类又发现谷物还有另外一个不同寻常的特性：与其他食物不同，只要环境干燥、安全，谷物就可以存放数月甚至数年。没有其他汤料时，仅用谷物也可做成干粥或稀汤，这一发现促进了采集、加工和储存谷物的相关工具和技术

的发展。人类在这一方面做出的不懈努力为对付日后可能出现的食物短缺提供了保障。在新月沃地，考古学家发现，大约公元前1万年前就出现了用于收割谷物的石镰，用于运送谷物的手编提篮，用于烘干谷物的石炉床，用于储藏谷物的地窖以及用于加工谷物的磨石。

其实，以采集打猎为生的远古人类并非过着纯粹的游牧生活。他们很早就是一些临时或季节性的“住处”流动居住，开始了半定居生活。后来，储存能力的提高才使他们有能力完全留在固定的居所。20世纪60年代，一位考古学家做了一个实验，可以充分解释这其中的原因：他以至今仍生长在土耳其地区的一种野谷为收割的实验对象，旨在考察一个史前家庭使用镰刀收割的效率。他一个小时之内割了两磅^[1]多野谷。如果按照这个数字计算，若每人每天吃1磅野谷，每天工作8小时，全家人连续工作3个星期就可以收获1年的口粮。不过，这个家庭要住得离野谷生长的地方很近才能保证他们不会错过收获期，而且因收获量很大，他们也必须加强对谷物的保护。

由此人类最早的定居地便产生了。比如公元前1万年左右，在地中海东岸的永久性定居地就是一些简单的圆形房屋。房顶由砸入地面1码

（约合0.9米）深的木柱支撑。这种房间通常有一个壁炉，地面由石块铺砌而成，其直径为4~5码。一个典型的村落约有50座房屋，是一个二三百人的社区。虽然村民仍会捕猎少量瞪羚、驯鹿和野猪，骨骼检测却显示出他们的饮食结构仍以植物为主，如橡子、小扁豆、鹰嘴豆和谷物等。在这一时期，谷物仍靠采集而非人工种植。

谷物最初不是一种很重要的食品，在人类发现其两大与众不同的特性之后，它就变得重要起来。第一个发现就是，谷物吸水后会发芽，变得有甜味。因为很难保证储藏坑完全干燥，所以人类开始储存谷物后，很快就发现了这个特点。我们运用现代知识就能知道原因：谷物受潮后会产生淀粉酶，它将谷物中的淀粉转化成麦芽糖（所有谷物都会发生这种变化，但到目前为止所知大麦产生的淀粉酶最多，产生的麦芽糖也最多）。在那个缺少食糖的时代，这种能“麦芽糖化”的谷物自然会引起高度重视，从而加速了先浸湿再烘干的人工提取麦芽糖技术的发展。

第二个发现意义更为重大。粥被放置若干天之后会发生一些神秘的变化。尤其是由糖化谷物做成的粥，会产生一些细小的气泡，吃起来味道可口，还有些醉人，这是因为空气中的野生酵母使糖发酵生成酒精。简而言之，粥变成了啤酒。

不过，人类喝的第一种酒类饮品也可能不是啤酒。因为在发现啤酒的时代，人们也试图储存水果和蜂蜜。偶然发酵的果汁（可制成葡萄酒）或者水和蜂蜜的混合物（可制成蜂蜜酒）可天然生成少量的酒精。但水果是季节性产品，易于腐烂。野生蜂蜜的产量也很小。如果不用陶制酒坛，葡萄酒和蜂蜜酒就不能长久储存，而陶器直到公元前6000年才问世。另外，因为原料是供应充足且易于储存的谷物，啤酒酿制有了保证。在发明陶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在涂灰的筐、皮囊或动物的胃、挖空的树干、大贝壳或石制容器里酿酒。甚至到了19世纪，生活在亚马逊盆地的人们还在用贝壳烧饭。在今天的芬兰，一种称作萨蒂的传统啤酒仍是在挖空的树干中酿造而成。

发现了啤酒之后，人们通过反复实验来提高啤酒的品质。比如，熬粥时加的糖化谷物越多，发酵的时间越长，转化为酒精的糖就越多，因此啤酒的口感就越强烈。又如，粥煮得越透，啤酒的酒精度就越高，这是因为糖化过程只能将大麦中15%的淀粉转化成糖，但如果糖化的大麦与水混合并加热煮沸，那么其他的淀粉酶在高温下就会活跃起来，将更多的淀粉转化成糖，于是便有更多的糖通过酵母转化为酒精。

古代酿酒师还发现，反复使用同一容器会使发酵效果更可靠。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晚期的文献曾记载，酿酒师经常随身携带他们自己的麦芽浆桶。一个美索不达米亚的神话里还提到过“酿出好啤酒的容器”。反复使用相同的麦芽浆桶更容易使发酵成功，这是因为酵母菌遗留在浆桶的缝隙里，所以不必再依赖难以控制的野生酵母了。最后，还可以往粥里加入浆果、蜂蜜、香料、草药等其他调味品来改变啤酒的口感。在此后的几千年里，人们发现了为不同场合酿造不同纯度和不同口感的啤酒的方法。

晚些的埃及文献至少记载了17种啤酒，其中一些是在诗歌里提到的，现在听起来可能更像广告用语，如“国色天香”、“天籁之饮”、“快乐使者”、“餐之密友”、“丰盈富足”或“发酵之后”等等。用于宗教仪式的啤酒则有其独特的名字。同样，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献对公元前3000年的啤酒也有记载，其中列举了二十多种不同种类的啤酒，其中包括鲜啤、黑啤、鲜黑啤、烈啤、红棕色啤酒、淡色啤酒、淡味啤酒和低浓度啤酒。红棕色啤酒是一种含糖量较高的黑啤，而低浓度啤酒则是麦汁浓度较低、酿造时含水量较大的淡色啤酒。美索不达米亚的酿酒师还通过加入不同量的“啤酒面包”来控制啤酒的口感和颜色。“啤酒面包”的制作过程是：用发芽的大麦做成块状的

小面包，然后烤两次做成黑棕色、硬而脆的死面包，这样在弄碎放入酿酒桶之前可以存放数年。据记载，“啤酒面包”被存放在政府的仓库里，只有在食物短缺的时候才拿出来吃，储藏任何一种啤酒原料都不会这么方便。

美索不达米亚人使用面包酿酒的问题在考古界引起了很大争论。有人认为面包是酿造过程的副产品，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先有了面包后来又被用作酿酒原料的。不过，很有可能面包和啤酒都是由粥制作的。稠麦粥在太阳下或热石头上烘烤成为面包干，稀麦粥则发酵变成了啤酒。应该说二者只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面包是固态啤酒，啤酒是液态面包。

啤酒影响了什么？

因为当时没有文字，所以没有文献来证实在新石器时代（公元前9000年至公元前4000年）的新月沃地区域，啤酒在社会和礼仪方面的重要性。但从晚些时候的文献中，我们可以推断出最早开化的文明人（即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2]和古埃及人）饮用啤酒的一些情况。事实上，文化传统与啤酒的关系亘古持久，有的甚至遗留至

今。

早期啤酒具有重要的社交功能。根据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对啤酒的描述，基本上都是两人用苇管共饮一坛啤酒。但在苏美尔时代，人们已经有能力过滤啤酒中的谷粒、谷壳等杂质，而且陶器已经出现，这就意味着可以人手一杯分而饮之。众多的记载显示出，共饮的场景是一种自古留存下来的仪式，即便在那时吸管已完全不需要。

对此最可靠的解释是饮料不像食物那样能够完全被众人分享。当几人同饮一坛啤酒时，液体没有分别；反之，当切一块肉的时候，切出来的必然有好有坏，有众人想要的和都不想要的。所以与人分享饮料成了好客和友好的象征，它意味着饮料无毒、适宜饮用，也证明提供饮料的人是值得信赖的。在没有小杯的时代，人们只能同坛共饮。今天，让客人用苇管饮啤酒已不再是一种习俗，我们经常会选择用一个茶壶或咖啡壶沏茶、冲咖啡，或者与众人分享一瓶葡萄酒或烈酒。在公共场合喝酒的时候要碰杯，将杯子聚在一起不是也象征着我们分享同一坛酒吗？可以说所有饮酒礼仪都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古人认为，饮料，尤其是酒精饮料具有超自

然的属性。对于新石器时代的饮者来说，啤酒所产生的麻醉精神、模糊意识的作用无比神奇、难以言表。同样神奇的是，在其神秘发酵过程中，普通的米汤居然能变成啤酒。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啤酒授之于神。许多民族都编造出各自版本的神话，讲述诸神如何发明了啤酒并教给人类如何酿造。埃及人认为啤酒是农神，是身兼地狱判官的俄塞里斯偶然发现的。一天，俄塞里斯泡了一碗发芽谷子，放在太阳底下就走开了。当他回来的时候，发现米汤已经发酵，他尝了一口觉得味道还不错，便把这种方法传给了人类（这个故事正好与啤酒发现于石器时代的推测相吻合）。许多有饮啤酒历史的民族也有类似的传说。

由于人们认为啤酒是神授之品，因而理应用作宗教祭品。苏美尔人和埃及人把啤酒用在宗教仪式、丰收庆典、葬礼祭祀等场合。啤酒的宗教用途似乎可追溯到更早以前。事实上，无论在美洲、非洲还是亚欧，对于有饮啤酒历史的民族来说，啤酒在宗教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印加人用金杯盛满“契洽”（用玉米或木薯酿造的啤酒）举向升起的太阳，然后洒在地上或者喷出第一口酒祭祀地神；阿兹特克人^[3]用普達酒（一种由龙舌兰汁液发酵酿制的墨西哥啤酒）祭祀生育女神玛雅秀；中国人则将由黄米和大米酿的米酒用在

葬礼及其他仪式上。可以说，今天人们举杯祝愿福寿安康、婚姻美满、来世富贵，庆祝工程的顺利竣工，都是在回应远古的理念，即酒精能够产生超自然的能力。

啤酒与农耕：现代文明的种子

开始从事农业生产，是人类进化史上的重大转折点。有些人类学家甚至认为，啤酒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农业生产提供的剩余粮食使一些社会成员从粮食生产中解放出来，成为特殊职业者，专门从事手工业或其他商业活动，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推动了人类迈向现代社会的进程。这个过程开始于公元前9000年，新月沃地的人们已开始种植大麦和小麦，这就与之前单纯以果腹充饥和储存为目的的简单野谷采集有了本质的区别。

当然，从打猎采集到农耕种植的转变是几千年逐渐演变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耕种的农作物在人类的食谱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这也许只是瞬间的变化：在700万年前从猿进化成人后，人类就一直靠采猎获得食物。后来，他们突然弃猎从耕，弃采归

田。人类为何这样？为何是在这个特定的时期？史学界对此争论不休。目前有许多假设：可能是新月沃地地区可供采猎的食物由于气候变化、物种死亡或过量采猎等原因而灭绝；可能是一种更加稳定的生活方式（但仍属于狩猎采集的方式）提高了人类的生育能力，致使人口激增，从而需要新的粮食来源；更可能是啤酒见之于世后，在社会交往、宗教祭祀等方面赢得了极其重要的地位，人们希望通过栽培来确保稻谷供应，从而摆脱靠天吃饭和野谷充饥的境遇。从最后一种假设来看，人类从事农业生产的部分原因是为保证啤酒的供应。

尽管这种假设有将农业的开始归功于啤酒的嫌疑，但在历史天平由采猎向农耕和小范围定居倾斜的过程中，啤酒似乎更像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这是个棘轮效应^[4]：如果一个特定种群越依赖农作物作为其主要的食品，那么它的人口就增加得越快，就越难返回以狩猎采集为主的旧式游牧生活方式。

也可以说，啤酒的饮用对农业的转变起了微妙的辅助作用。因为当时啤酒很难长期储存，完全发酵只需一个星期，多数啤酒在完全发酵之前就被喝完了。以现代标准来看，这种啤酒酒精含

量相对较低，但富含悬浮酵母菌，极大地提高了其蛋白质和维生素含量，尤其富含维生素B，从而避免在狩猎让步农耕的过程中，由于肉类（富含维生素B）摄取减少导致的营养结构失调。

此外，即使在最小的部落里，人的排泄物也会很快污染到饮用水源。由于啤酒是由开水酿造的，所以比生水饮用起来更安全、更卫生。虽然直到近代人们才意识到饮用脏水有害健康，但他们早就知道要警惕来源不明的水，尽量从远离居住地并且水质清洁的地方取水（而采猎者就不必担心饮用到污染水的问题，他们人数少，始终到处流动，迁徙之后废物就遗留在了原地）。换句话说，人类从事农业生产之后，食物质量下降，而啤酒恰好提供了相应的营养成分，作为安全的液态饮品，喝啤酒的农民比不喝啤酒的人具有营养优势。

公元前7000至公元前5000年，新月沃地的农业迅速发展。人们种植的作物和驯养的牲畜（主要是山羊和绵羊）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新的灌溉技术使干燥的美索不达米亚低地和埃及尼罗河流域也能适合农业生产。这一时期典型的村落都是由泥和草盖的圆顶房，稍好一点的用曝晒而成的土坯建成。村外就是种植谷物、枣树和其他作物的农田，偶尔可以看到一些散养或圈养的牛

羊，到处是一派宁静祥和的景象。当然，人们也会尽可能捕获一些禽和鱼等野味来丰富食谱，但总体来说，这种生活方式与几千年来采集狩猎的方式已截然不同。此时的社会正向一个更复杂的模式发展，村落通常会用仓库来存放贵重物品，包括圣物和余粮。毫无疑问，这些仓库是公用的，因为其存储数量远远大于任何一个家庭的需要。

为了避免粮食短缺，人们一方面把余粮存入仓库，另一方面举行祭祀仪式向神灵祈求丰收。二者相互交织，所以人们一直把捐余粮当作对神之供奉，从而将仓库逐渐演变成了神庙。在新月沃地的许多地方，都可以找到公元前8000年左右刻着字的泥石。这些泥石在当时是用来记载捐粮的明细，以保证所有村民都尽可能将余粮拿到公共粮仓。这种宗教意味的捐粮仪式由行政祭司主持，他们靠余粮生活，也指导集体活动，如房舍的建造、灌溉系统的维护。这也播下了管理体制的种子，开启会计和写作等职业的先河。

人类生活方式由几百万年前的采集狩猎向农业的重大转变过程中，啤酒是否起到过推动作用，这个问题仍存有争议。不过，啤酒对于人类最早期文明的超乎寻常的影响，充分证明了它在史前时期的重要地位。尽管啤酒的真正起源仍笼

罩着些许神秘与猜测，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无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都与啤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1] 1磅约等于0.45千克。——编者注

[2] 苏美尔人，是历史上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中下游）早期的定居民族。他们所建立的苏美尔文明是整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最早，同时也是全世界最早产生的文明。——编者注

[3] 阿兹特克人（Aztec），是北美洲南部墨西哥人数最多的一支印第安人。——编者注

[4] 棘轮效应，是指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即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编者注

文明社会的啤酒

快乐即是啤酒；烦恼即是远征。

——美索不达米亚谚语，公元前2000年

畅饮啤酒，此生足矣。

——埃及谚语，公元前2200年

城市革命

世界上的首批城市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一块位于“两河流域之间的土地”。

两河指的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地理位置大约在今天的伊拉克。这些城市的居民大多是农民，他们住在有围墙的城里，每天早上出城务农。而那些不用天天耕作的行政人员和手工业者才是最早过上真正城市生活的人。纵横交错的城市小路上车轮滚滚，好不热闹；熙熙攘攘的集市买卖兴隆，颇具规模；宗教仪式按部就班，市

民享有法定假日，人们生活井井有条。那时的许多谚语都显示出与当今城市人同样的疲倦感，如：

有钱者幸福，有粮者快乐；

无钱无粮者别无选择，只有睡觉。

但是，人们究竟为何选择住在大城市，具体原因尚不清楚。很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方说，人们可能想住得离重要的宗教区、商业区近一些。而在美索不达米亚，安全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美索不达米亚是一大块空旷的平原，缺少天然屏障，这就意味着它易于受到外族的入侵和袭击。公元前4300年左右，村落逐渐联合起来，形成规模稍大一些的城镇，并最终形成了以耕田和灌溉系统为中心的城市。到公元前3000年，当时最大的城市乌鲁克已拥有约5.5万人口和方圆16公里的农田。到公元前2000年，南美索不达米亚的几乎全部人口都集中在几个大城邦，包括乌鲁克、乌尔城、拉伽什、艾瑞都和尼普尔。之后埃及发展迅猛，独占鳌头。一些城市如孟菲斯、底比斯等逐渐被列为古代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这两种最早期的文明（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最初为“住在城里”之意）差异甚多。政治一统使埃及文化近三千年经久不衰。美索不达米亚却时局动荡，政权、军权之争频繁。但在关键的一点上它们有惊人的相似：农产品尤其谷物均有剩余，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不但把行政管理者和手工业者从生产自己所需的粮食中解放出来，还有能力资助诸如修建运河、庙宇、金字塔等巨大公共工程。谷物不仅是商品交换的媒介，还是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基本的营养来源。可以这样认为，谷物有固态和液态两种消费方式，即面包与啤酒，均是可食用的货币。

文明人之饮

有记载的啤酒历史源于南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约在公元前3400年这里首先出现文字。从世界上首部文学巨作《吉尔伽美什史诗》的一段诗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美索不达米亚人把饮用啤酒视为自身文明的一大标志。吉尔伽美什是公元前2700年左右的苏美尔王，他死后，苏美尔人与后来在此定居的阿卡德人和巴比伦人把他的生活故事神化，创作了一首详尽的神话史诗，讲的是吉尔伽美什和他的好友恩思度冒险的

故事。最初，恩思度是一个愚昧无知、衣不蔽体的野蛮人，是一位年轻女子指引他走上通向文明的道路。一天，他们来到一个牧羊村，即所谓通向更高城市文化之梯的第一级台阶，在这里：

他们摆上食物。

他们斟满啤酒。

恩思度不知面包可食，啤酒可饮。

女子旋即道：“吃吧，吃下这食物，恩思度，人要以此为生。

喝吧，喝下这美酒，这是大地的恩赐。”

恩思度饱餐，至厌腻；豪饮，至七坛。

于是，他情绪失控，高谈阔论，喜极高歌。

他满面春风，以水净身，全身涂油，终于开化。

恩思度的野人天性是由他对面包和啤酒的无知表现出来的。但他在饮酒盥洗之后开化，立即准备前往吉尔伽美什统治的乌鲁克城。美索不达

米亚人认为，食用面包和啤酒是他们区别于野蛮人的标志之一，也使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人。有意思的是，这一理念似乎反映了啤酒与安定有序的生活方式相适宜，而非史前那种采集狩猎的无序生活方式。

饮酒醉人似乎并未影响饮用啤酒与文明开化之间的平衡。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学作品中，大部分涉及醉酒的内容均以幽默诙谐的方式叙述。恩思度的开化就涉及醉酒和歌唱。同样，苏美尔神话所描述的神都很容易犯错，像人一样嗜好饮酒，而且经常喝醉。他们反复无常的行为主要是因为生活不安定，自然因素变幻莫测，辛苦一年可能颗粒无收，到处掠劫的敌人可能随时出现。苏美尔的宗教仪式通常是在庙里神像前的供桌上摆上供品，接下来是盛大的宴会，祭司、拜神者食供品饮供酒来召唤亡魂，祈求神灵保佑。

在古埃及文化的所有记载中，啤酒同样重要。在始建于公元前2650年第三王朝的文献里有对啤酒的记载；出土于第五王朝末年（大约公元前2350年）的金字塔中的陪葬“铭文”里面，也记录了许多种类的啤酒（苏美尔人发明了自己的文字之后不久，埃及人也发明了自己的文字，记录日常买卖交易、国王的丰功伟绩等诸多内容。至于文字是埃及人自身智慧的结晶，还是受到苏

美尔文字的启迪我们不得而知)。通过对埃及的文学作品进行考察就可以发现，啤酒（埃及语中叫“hekt”）被提及的频率远远高出其他食物。同样在美索不达米亚，人们认为啤酒历史悠久，身世迷离，所以这个词经常出现在祈祷文和神话传说中。

在埃及流传的一个故事里，啤酒甚至帮助人类免受灭顶之灾。太阳神拉发现人类在策划谋反，于是派女神哈托尔下界惩罚。哈托尔很残忍，几乎将人类灭绝，太阳神拉害怕人类灭绝后自己将不再受到供奉，于是动了恻隐之心，将大量啤酒（有些版本说是7 000坛啤酒）染成红色冒充血液泼洒在田间，一闪一闪地折射出太阳的光芒，如一面失落于天堂的镜子。哈托尔停在“镜子”前欣赏自己娇艳无瑕的美貌，不禁俯身饮起来，结果喝醉了，沉沉地睡去，醒来后就忘记了她血腥的使命。人类因此获救，哈托尔也被供奉为啤酒和酿造女神。这个故事的多个版本在许多埃及国王如杜堂卡门、塞提一世、拉姆历斯大帝的墓中被发现。

美索不达米亚人对醉酒的态度是宽容的。而在埃及，从一些学徒抄录员抄写的文章中，可以感受到埃及人强烈反对嗜酒和醉酒。有一篇文章劝告年轻人说：“啤酒，把别人从你身边吓走，

将你的灵魂送入地狱，万劫不复。醉酒之后，你便是船上的一支破桨，任人摆布，只知服从。”一本名叫《阿尼智训》的书中有类似的忠告，“劝君莫贪杯，酒后失言麻烦多”。不过，这种练习性的抄文并不能完全展示出埃及人的价值观。他们只是想不停歇地学习，最后成为一名抄录员，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职业，比如说，有些文章就命名为“勿作士兵、祭司和面包师”、“勿为农夫”和“勿为车夫”等等。啤酒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都被视为来自远古的神赐，它为人类顽强地生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为文化和宗教所认同的一部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盖一座啤酒大厅”或“到啤酒大厅里坐坐”是埃及人十分常用的表达方式，意思是“玩得开心”或“（在热闹的宴会上）饮酒作乐”。苏美尔人用短语“一杯啤酒”指代宴会或庆功会，用“国王在某某家喝啤酒”指国王到某高级官员家接受贡礼。在两大文化中，啤酒又都是主食的一部分，没有啤酒的一餐算不上是完整的一餐。无论贫富贵贱、大人小孩、男女老少、国王平民，人人都饮啤酒。毋庸置疑，啤酒已成为人类最早文明的标志性饮品。

文字起源

最早有文字的记录是苏美尔人的工资条和纳税收据，其中表示啤酒的符号（一个陶器外形的字框里画着几条线）和表示谷物、织品、牲畜的符号同样是最常用的几个字符。因为文字的发明最初是为了记录谷物、啤酒、面包和其他物品的收集分发情况，也是新石器时代人们用徽牌记录公共仓库捐赠的自然延伸与发展。实际上，苏美尔社会是新石器时代社会结构的逻辑延伸，只不过规模更大，物质基础更雄厚。它是数千年经济增长、文化交融沉淀和积累的产物。就像新石器时代酋长招募余粮一样，苏美尔城邦的祭司招募剩余的大米小麦、家畜和针织品等。对外他们宣称这些东西为祭品，实质就是强加在居民身上的赋税。这些招募到的东西或交给庙中的工作人员消费，或用于易物交换、支付公共开支。比方说，祭司可以用配给面包或啤酒的方式支付维修灌溉系统或建设公用场所的费用。

这一考虑周全的管理系统赋予宗教对大部分经济的直接控制权。我们很难说这一系统导致了生产资料重新分配（一种古老的社会主义形式，国家为每一个公民提供一切），还是形成了近似奴隶制的掠夺性政体，但这个体系似乎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变幻莫测的自然环境下应运而生的。当地雨水稀少，两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不时洪水泛滥，农业生产主要依靠人们精心维护

的公共灌溉系统以及对本地神灵的虔诚祭祀（在苏美尔人心中对后者坚信不疑）。恰恰这两件大事都是由祭司（类似牧师）来掌管的，于是随着更多的村落发展为乡镇、城市，祭司手中聚集的权力越来越大。新石器时代简易的仓库变成了拾阶而上、建造精美的神庙。大大小小的城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苏美尔大地上，每个城邦都有各自所信奉的神灵，都有一个出色的祭司掌控农业经济的大方向。祭司靠上缴的余粮生活，在一些雕刻中，他们都被描画成留着须髯、头戴圆巾、身着长褶裙、用长麦管从大酒坛中吸饮啤酒的形象。

为使整个系统顺利运转，祭司和老百姓需要记录收入和支出，于是开始了对文字的探索。最初他们把交税收据以徽牌的形式存入“泥封”里（一种中空泥壳，里面放有几个徽牌）。不同形状的徽牌通常分别代表一定数量的谷物、织品或家畜。当人们把东西上缴到神庙里的时候，相应的徽牌会被放置于一个泥封里，收税人和纳税人都会在泥封未干处按上他们的印章，以证明泥封里的东西准确反映已交的税，然后把泥封存放在神庙的档案馆里。

不久，人们发现了一种能起同样作用但更简捷的方法，即将徽牌按在一小块湿泥板上，印出

不同的形状来代表大麦、牲畜。而签名可以直接印在泥板上，曝晒之后形状便可以永久固定。这样就不再需要徽牌，仅用它们的印记便已足够。人们逐渐就摒弃了徽牌印记这种记录形式，按照徽牌或者所代表实物的形状在泥板表面画出一些图形。有些图形后来直接代表实物，有些凹凸缺口的组合代表抽象概念如数字。

最古老的文献是一些手掌大小、精巧平整的泥板，约于公元前3400年出现在乌鲁克城。通常纵向分几列，再用直线横向分出小方格。每个格子里放置一排文字符号，这些字符有的是用徽牌印成的，有的是用细笔刻画的。尽管上面的符号也是按照由左向右、由上至下的顺序来阅读，但除此之外，它们与现代文字毫无相同之处，只有专家才能读懂。不过细看的话，代表啤酒的符号是很好辨认的，即一个酒坛子里有几条小横线。工资条上、行政文件里，以及抄写员练习用的包含数十种酿酒术语的字帖里都能找到这个符号。许多泥板上都列有一串名字，名字旁边记有神庙发放的工资数，如“某人应领啤酒、面包”。

最近，在对美索不达米亚的食物配给进行分析时，专家发现他们分发下来的食物搭配起来营养均衡丰富。这些食物以啤酒、面包、大枣和洋葱为主，辅以鱼、肉和蔬菜，如鹰嘴豆、小扁

豆、豆荚和大萝卜等。大枣富含维生素A，啤酒富含维生素B，洋葱富含维生素C，加起来能提供约3 500~4 000大卡的热量，与现代营养学家推荐的成人每日消耗的热量正好一致，这说明政府配给不是偶尔为之，而是许多人的主要粮食来源。

当文字被用作记录税收和配给分发的工具后，很快就演变得更灵活、更抽象、更具表现力。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一些符号开始代表某些特定的语音。同时，楔形、深刻痕的图形逐渐取代了浅划痕的图形，加快了书写的速度，但降低了图形的质量，从而导致文字越来越抽象，最终形成了首批楔子形状的早期文字形式。它们用苇秆写在泥板上，并以普通记录为目的。这些文字形式是现代西文字母的鼻祖，不过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又受到公元前2世纪加列文和腓尼基字母的影响，最终才衍生出西文字母。



一块公元前3200年左右刻有古楔形文字的泥板，上面记载了啤酒的配给情况。

与早期的象形文字相比，楔形文字的啤酒图形几乎已没有酒坛形状了，不过有的还能在泥板上看出来。如在记述农神恩奇为其父恩利勒准备宴会的故事中，尽管对啤酒酿造过程的描述稍为隐晦神秘，但主要步骤还是比较清晰的。也就是说，世界上最古老的有文字记载的食谱是“神酿”的啤酒。



楔形文字中表示“啤酒”的书写符号的历史演变。其中对酒坛的表述逐渐变得越来越抽象。

液体财富与健康

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赋税以谷物和其他物品的形式交到神庙，再重新分配用以建造公共设施。就两个文明来说，大麦、小麦以及加工出的固态面包和液态啤酒，都不仅是主要食品，还是便捷、流通的货币和支付形式。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曾记载：苏美尔神庙中最底层的劳力，每日配给啤酒1斯拉（约合1升）；普通官员为2斯拉；高级官员和王宫女眷是3斯拉；最高长

官则是5斯拉。在苏美尔遗址出土的大量大小相同的斜边碗，似乎就是用作标准量器的。达官贵人得到的配给多，并非因为他们喝得多，而是他们除了本人饮用外，还要有多余的给打探消息的人和文书抄写员去消费，并且支付其他的工作人员作报酬用。啤酒是液体的，便于量取分割，是一种理想的货币形态。

公元前2350年左右，来自邻邦阿卡德王国的君王萨尔贡统一了苏美尔地区相互敌对的各个城邦。在萨尔贡统治的后期文献中，我们发现啤酒被列为新娘聘礼的一部分。还有文献记载了妇女儿童为神庙短期工作时，啤酒会被用作劳动报酬：妇女每人2斯拉，儿童1斯拉。甚至连身为奴隶或战俘的妇女和儿童也按月配发啤酒：妇女20斯拉，小孩10斯拉。士兵、警察和文书抄写员在特定情况下会得到啤酒这样的特殊奖励。通信员也会以奖金的形式得到啤酒。公元前2035年的一份公文上，记载了乌玛城发给政府通信员的食品清单，数目不等的“优级”啤酒、“普通”啤酒、大蒜、食用油和香料等作为奖励发给苏·杜穆兹、诺·伊什塔、艾瑟·依利、尤·宁戈素和巴兹穆等人。这一时期，苏美尔国共有雇员30万人，全部领取燕麦月俸、羊毛年俸，或者等值的其他物品——替代燕麦的有啤酒或面包；替代羊毛的有织物或衣服。当时的每项交易都会由苏美尔的会计详细

地用楔形文字刻录在能永久保存的泥板上。



这是一个圆柱形封印上的宴饮图，有的人坐着用苇管从坛子里吸饮啤酒。

啤酒作为支付手段最经典的例子，可在埃及吉萨金字塔看到。根据金字塔建筑工人曾经吃住过的小镇上的记录，当时工人领取的报酬就是啤酒。记录上称，金字塔的建造时间约为公元前2500年。那时，一个劳动力的标准配给是3~4条面包和两坛啤酒（大约是4升）；管理人员和官员相对多些。难怪按古代雕刻记载，为孟卡拉王建造第三座吉萨金字塔的工人们称自己是“喝孟卡拉王啤酒的人”。这些建筑工人的工资记录证明，金字塔是由国家雇佣人员而非奴隶建的。还

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农民在汛期农田被洪水淹没期间建造的。国家以税收形式收缴谷物，然后以工资形式重新分配。建设工作给国家注入了某种凝聚力，向外族彰显本国的富裕强盛，为税收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人们将面包、啤酒当作工资或者货币，使之成为繁荣和富有的同义词。古埃及人几乎将它们视作生活必需品。词组“面包加啤酒”泛指维持基本生活的必需品，它们组合在一起的象形文字为“食物”之意。词组“面包加啤酒”还用于日常问候语，类似于祝别人好运健康。有一段埃及碑文，告诫母亲给上学的孩子每天准备两坛啤酒、3小条面包，以保证孩子的健康发育。美索不达米亚人也用“面包加啤酒”表示饮料和食物。苏美尔语中表示“宴庆”的词，按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就是“摆着啤酒和面包的地方”。

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埃及人还将啤酒用作医疗用途，所以啤酒与健康又有了更直接的关系。苏美尔尼普尔城（目前已知的苏美尔最古老的城邦之一）的一块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楔形泥板上，记载了一个以啤酒为主要成分的药方清单。这是有史可考的在医疗上使用酒精的最早记录。在埃及，啤酒是一种公认的温和镇静剂，也是药用香料和草药混合剂的主要成分。因为啤酒由开水酿

造，较之生水更不易受污染，还可提高某些成分的溶解度。一份写于公元前1550年左右的埃及医学文献中搜集了上百个草药药方，其中许多用到了啤酒：半个洋葱与有泡沫的啤酒混合可治疗便秘；啤酒加橄榄粉治消化不良；蘸取泡过藏红花的啤酒按摩产妇腹部，可以缓解分娩时的痛苦等。

埃及人还相信，他们来世的生活富裕与否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啤酒和面包。一般来说，标准的祭品包括面包、啤酒、牛、鹅、衣服，还有能洗去罪恶的泡碱。埃及的一些祭文向死者保证“啤酒永远不会变酸”。这一方面表现了他们渴望能永远喝上啤酒，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啤酒保鲜的困难，他们通过对亡者的慰藉来表达自己的美好愿望。人们在埃及的墓穴里发现了大量有关啤酒酿造、面包烘烤的场景和模具，以及许多坛酒（早已蒸发殆尽）和制酒的工具。人们还在公元前1335年入葬的法老图坦卡蒙王的墓中发现了一些酿造啤酒的特殊过滤器，而一些平民的坟墓，尽管很简易又很浅，但也都有几坛啤酒作为陪葬。

文明破晓之饮

啤酒伴随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从摇篮到坟墓。复杂社会形态的出现，文字的发展，以及啤酒的普及都源于剩余谷物的产生，所以人们对啤酒的热衷也就理所当然，不可避免。新月沃地拥有谷物生长所需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样的自然条件开启了农业，孕育了早期的人类文明，创造了文字的雏形，让啤酒得以在这块土地上繁荣兴旺。

尽管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埃及人酿造的啤酒还不含啤酒花（直到中世纪，啤酒花才被认为是啤酒的标准成分之一），但在数千年后的今天，当时的啤酒与相关饮酒习俗仍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虽然啤酒已不再是支付手段，人们再也不用“啤酒加面包”来问候彼此，但啤酒仍是工薪阶层的主要饮品。古人相信啤酒有神奇的魔力，延续到今天，就是为他人的健康干杯。啤酒仍代表友善、真诚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可以分享的饮品。无论是在石器时代的村落、美索不达米亚的宴会大厅，还是在现代的酒吧，自从人类文明初见曙光的那一刻起，啤酒就已经将人们联系在一起。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葡萄酒

Wine in Greece and Rome

爱上葡萄酒

快，给我拿一大杯葡萄酒来，好让我的大脑得到滋润，说出点儿精言妙语来。

——古希腊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公元前450年~公元前385年）

盛宴

公元前870年，亚述国王亚述纳齐尔帕二世为庆祝新都尼姆德的落成，举行了一个宴会。这是历史上最盛大奢华的宴会之一。新都的城中心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宫殿，基座由泥砖砌制——这是传统的美索不达米亚建筑风格。宫殿里有7个气势宏伟的大殿，每一个殿堂里都装饰着华美的木铜门，屋顶是用雪松、柏木及桧木建造的。墙上精美的壁画歌颂着国王远征异国的辉煌战绩。环抱着宫殿的是潺潺的溪流、轰鸣的瀑布、飘香的果园及绚丽的花园。据当时的楔形文字碑记载：花园和果园里种植的不仅有本土植物，还有一些国王远征时从别处采集回来的植物：枣椰树、雪松、柏树、橄榄树、李子树、无花果树及

葡萄藤等。这些异乡植物“花团锦簇，争奇斗艳，竞吐芳菲”。为了使新都人丁兴旺，国王号召各地人民迁居新都。当时，亚述帝国的领土占据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来自各地的人民齐集新都，各地的植物也在新都扎了根——这万物万民齐聚新都的盛景集中反映了亚述帝国辽阔的势力范围。为了显示自己的强大，新都一落成，亚述纳齐尔帕便迫不及待地举行盛宴庆祝。

这个宴会持续了十天十夜。据官方史料记载显示，当时参加宴会的人数达69 574人之多：其中，47 074人是来自国内各地的代表，16 000人是刚刚迁入尼姆德城的新居民，5 000人是来自异国的达官显贵，其余1 500人是皇宫内部官员。这次盛宴旨在展示亚述国王的至高权力及傲人财富——不仅给自己的臣民看，也给那些异国代表们看。宴会上总共供应了1 000头肥牛，1 000头小牛，10 000只绵羊，15 000只羔羊，1 000只羊羔，500只瞪羚，1 000只鸭子，1 000只鹅，20 000只鸽子，其他各类飞鸟12 000只，10 000条鱼，10 000只跳鼠（一种小型啮齿动物）及10 000个鸡蛋。当时的蔬菜并不丰富，宴会上只提供了1 000筐。上述记载也许包含夸大渲染的成分，但是其中至少有一点清晰可见：这次宴会的规模是空前的。国王向他的宾客们吹嘘，他会充

分尽主人之谊，让宾客尽情享受这次盛宴，然后再派人一一护送他们高高兴兴、健健康康地回到自己的国家去。

这次宴会上最重要也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国王对于饮品的选择。尽管亚述纳齐尔帕出身于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但他并没有把美索不达米亚的传统饮料作为主饮。宫殿石壁的浮雕中描绘的不是他用苇管吸饮啤酒的场景，而是这样的画面：国王优雅地用右手指尖托起一只浅碗，举至面前；那碗也许是黄金做的，而碗里盛的是葡萄酒。



亚述纳齐尔帕二世端坐在宝座上，手托一只浅碗。仆人侍奉在两侧，手拿蝇拍，防止苍蝇落入酒中。

当然，啤酒也在宴会的饮品之列，亚述纳齐尔帕为宴会提供了1万坛啤酒，同时还提供了1万皮囊（当时一种装葡萄酒的容器）葡萄酒——二者数量相当，然而后者以一种更加惊人的奢华凸显了国王的财富。当时，葡萄酒对于美索不达米亚人来说是稀有之物，因为他们的葡萄酒都是从遥远的北部山区进口的。北部山区人种植葡萄，

生产葡萄酒。把酒从山上运下来再运至平原地区耗资巨大，这使得葡萄酒的价格比啤酒贵出10倍以上。所以在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中，葡萄酒是一种富有异域风情的奢侈饮品，只有上流社会的人物才喝得起，平常百姓根本连尝都没尝过。在那个年代，葡萄酒主要用于宗教祭祀，它的昂贵和稀有使人们将之奉为“上帝之饮”。

亚述纳齐尔帕能有如此大的财力用与啤酒等量的葡萄酒来款待他的7万多位宾客，充分体现了他是何等富有。同时，把大量葡萄酒从迢迢千里之外的边疆运至京都，也充分显示了国王的势力范围是何其广大。更引人注目的是：宴会上的葡萄酒中，有一部分产自国王自家的果园。皇家果园里，葡萄藤蔓缠绕在树上——当时的葡萄都是这么种的——由一个设计精巧的运河系统进行灌溉。亚述纳齐尔帕不仅有着惊人的财富，而且他的财富都长在树上。新都的落成典礼上，一个很重要的仪式便是庄重地把葡萄酒献给上帝。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尼姆德的工匠们表现宴会时经常描绘出这样的场景：宾客坐在长木椅上，用浅碗畅饮葡萄酒，两侧有仆人侍奉；有的手持酒壶，有的手握扇子（或者是虫拍，以防有小飞虫掉进这珍贵的玉液琼浆里）。有些浮雕上还描绘了一些硕大的储酒容器，仆人们就从这里

倒酒重新把酒壶填满。

亚述人逐渐把饮用葡萄酒发展成为一种烦琐而正式的社交仪式。公元前825年的一块方尖碑上描述了这样的场景：亚述纳齐尔帕的儿子撒曼尼瑟三世站在遮阳伞下，左手握剑柄，右手持葡萄酒碗，脚边一个人双膝跪地，向他苦苦哀求。有了这般权威的宣传，葡萄酒及其酒具便自然而然地成了权力、荣耀和繁荣的象征。

来自山间的“优质啤酒”

对亚述人来说，葡萄酒是新鲜事物，但它绝非新生事物。和啤酒一样，葡萄酒的缘起早已湮没在史前的岁月当中。葡萄酒的发明（或者说发现）是如此古老，以至于我们只能在神话和传说中间接地寻找蛛丝马迹。但也有史料显示：葡萄酒的酿造始于公元前9000年~公元前4000年间的新石器时代，最初产于扎格罗斯山区（相当于今天的亚美尼亚及伊朗北部）。葡萄酒的酿造在这里得以实现，主要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野生欧亚混种葡萄藤的出现；充足的谷物储备使这些酿酒的民族全年都无须为柴米之事发愁；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人类发明了陶器，为人们酿酒、储

酒、饮酒提供了便捷的器具。

葡萄酒实际上就是发酵的葡萄汁。葡萄皮上有天然酵母菌，它们把葡萄汁中的糖分转化成酒精。如果把葡萄或葡萄汁保存在陶罐里，时间一长，自然会酿出葡萄酒来。扎格罗斯山区一个新石器时代村落旧址里出土了一个陶罐，罐里有红色的渣子，这个陶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400年，是迄今为止可以说明古人用陶器酿制葡萄酒的最古老的实物证明。《圣经》里诺亚的故事也暗示：这个地区很可能是葡萄酒的发源地。据说在逃脱洪水之灾后，诺亚在阿勒山附近的山坡上种下了第一株葡萄藤。

葡萄酒的知识从这里向四方蔓延，向西传至古希腊和安纳托利亚（现在的土耳其），向南穿越整个黎凡特地区（包括现在的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最后到达埃及。大约在公元前3150年，埃及历史上最早的君主之一蝎子王一世逝世，随其陪葬的物品包括700罐从南部黎凡特地区进口来的昂贵的葡萄酒。当时，黎凡特地区是重要的葡萄酒产地。多年以后，埃及法老们也开始钟情于葡萄酒，于是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建立了自己的葡萄园。到公元前3000年，埃及本土已经开始生产葡萄酒，但由于埃及的气候不适合葡萄酒的大规模生产，因此他们的产量很有限。

与啤酒经历的情形相似，在埃及，葡萄酒最初也仅供上流社会饮用。埃及的墓室里频频出现描绘人们畅饮葡萄酒的饮酒图，这些画面往往给人们一种错觉，让人误以为葡萄酒是埃及社会广为流行的东西；其实不然。事实上，当时只有那些喝得起葡萄酒的有钱人才造得起这样排场阔绰的墓室，而普通老百姓喝的都是啤酒。

相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公元前2500年，克里特岛^[1]上已经出现了葡萄的种植（或许，当时古希腊大陆上也已经出现了葡萄的种植）。葡萄藤并非希腊本土植物，而是由境外传入古希腊的，这一点在后来的古希腊神话中有所体现。根据神话记载，诸神饮用的是甘美的玉液（可能是蜂蜜酒）。后来，神将葡萄酒引入尘世，供凡人饮用。此后，人们把葡萄藤与橄榄树、小麦、大麦种在一起，而且让葡萄藤攀附在橄榄树或无花果树上。不论是在迈锡尼文化^[2]、克里特文化中，还是在古希腊，长久以来，葡萄酒都是上流社会的饮品。在奴隶及低级教士的口粮配给单上，没有葡萄酒这一项。能喝到葡萄酒是地位的象征。

亚述纳齐尔帕和他的儿子撒曼尼瑟三世统治时期发生了重要的转折。葡萄酒由一种社会地位

的标志逐渐发展成为社交饮品和宗教饮品，并在近东及地中海地区广泛地流传开来。葡萄酒在这一阶段的传播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第一，由于葡萄酒产量的提高，人们开始把葡萄酒作为出口商品进行海上贸易，而葡萄酒也因此更广大的地理范围内得以传播。大陆上几个超级帝国的建立也对葡萄酒的传播起了推动作用。因为运输葡萄酒的队伍需要穿越的国境线少了，需要交纳的义务税和通行税也随之减少，这样远距离运输葡萄酒的费用降低了，葡萄酒的价格也随之下降。就这一点而言，像亚述国王那样势力范围覆盖葡萄酒产地的君主真是占足了便宜。第二，由于价格的下降，葡萄酒开始进入更广泛的社会阶层。这一点清晰地体现在亚述王宫的贡品记录明细单上。在亚述纳齐尔帕和他的儿子撒曼尼瑟统治时期，葡萄酒被视作上等贡品，与黄金、白银、牛马及其他珍贵物件齐名。但两个世纪后，葡萄酒就从贡品明细单上消失了。因为那时葡萄酒已经是如此广泛饮用的饮品（至少在当时的亚述国是这样），它不再是人们心目中的异国珍物，因此，不适合继续作贡品。

尼姆德出土的几块楔形文字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85年。据石碑记载：当时，亚述王宫中能够享受到葡萄酒配给的人已达6 000人之多。每天每10个人可分得1卡（古代计量单位，1卡大约相

当于1升)葡萄酒。用现代中等大小的酒杯计算,每人每天可以喝到大约1杯葡萄酒。技艺娴熟的工匠能得到更多葡萄酒,平均每6人平分1卡。但在王宫里,上至达官显贵,下至牧童、助厨,每个人都能喝到一份葡萄酒。

对葡萄酒的热情逐渐向南蔓延,渗透到了不能生产葡萄酒的美索不达米亚。葡萄酒贸易也随着这股风潮扩展到两河流域。葡萄酒量多且易变质,因此很难通过陆路运输。远距离贸易都是乘竹筏或木船沿河进行的。大约在公元前430年,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游访这一地区时,曾描述过那些沿河运货去巴比伦的船只,并特别提到:“船上的主要货物是葡萄酒。”他还解释道:由于船是凭借水力顺流而下,让它们沿原路逆流而返是十分困难的。因此,船一旦到达河流下游,卸下货物,它的使命便结束了;人们把它拆掉,当作一堆废木料低价出售,而这堆木料换来的钱还不及船价的1/10。于是,这项运输成本便计入了葡萄酒的价格中。

虽然葡萄酒在美索不达米亚社会很受欢迎,但当地却很少有人买得起。葡萄酒令人望而生畏的价格在那波尼德的豪言壮语中有所体现(那波尼德是新巴比伦帝国的最后一位君王。公元前539年,波斯人打败了新巴比伦帝国)。他曾自

豪地说：这种来自山间的“优质啤酒”（那波尼德对葡萄酒的称呼），我的王国虽然不能生产，但在我的统治下却变得如此充裕，一罐18斯拉（大约是18升）的进口葡萄酒只需1谢克尔（古犹太人用的银币）就能买到。当时，1谢克尔就是一个月的最低工资。因此，只有那些家财万贯的人才能把葡萄酒作为日常饮品。而在普通百姓中间，另一种替代性饮品流行起来，就是枣椰酒，一种由发酵过的枣椰果汁制成的酒精饮料。当时，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广泛种植着枣椰树，由此而来的枣椰酒的价格仅仅略高于啤酒。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元年的这段岁月当中，连钟爱啤酒的美索不达米亚人也纷纷移情于葡萄酒。就这样，啤酒被时光从“文明饮品之冠”的宝座上赶了下来，葡萄酒的时代开始了。

西方思想的摇篮

当代西方思想的缘起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的古希腊思想家为现代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科学及法律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们治学方法的新颖之处在于通过对立的双方相互辩论来探求真理。他们认为，评价一套理论优劣的最好方法就

是用另一套与之对立的理论来验其真伪。这种方法体现在政治领域，便形成了民主制，即政策对立的双方通过唇枪舌剑来一决胜负；体现在哲学领域，便形成了对世界本原问题的理性对话与讨论；体现在科学领域，它促进了竞相诠释自然现象的各个理论体系的建立；体现在法律领域，它引导人们最终建立起互相监督的法律体系（还有一种深得古希腊人喜爱的制度化竞争——体育运动）。直到今天，这种对立竞争的方法支撑着现代西方人的生活方式——现代西方的政治、经济、科学及法律体系都根植于有序的竞争。

东方和西方世界的区分也源自古希腊。古希腊并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而是一些城邦、殖民地及村落的松散集合。这些地区终年战乱纷繁，频频易主。我们暂且抛开这些动荡不谈。早在公元前18世纪就已出现了对希腊语人群和非希腊语外族人群的区分。古希腊人称异乡人的语言是“野蛮语”，因为这些语言在他们耳中简直就如同婴儿发出的咿咿呀呀声一般令人费解。而在这些“野蛮民族”中，对古希腊构成最大威胁的是东方的波斯人。当时，波斯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广袤的疆域包含了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及小亚细亚（现在的土耳其）。最初，古希腊的两个主要城邦——雅典和斯巴达联合起来，共同击退了波斯人。但后来，这两个城邦为争夺权力互相争

斗，而波斯人则在其间周旋，忽而站在斯巴达一边，忽而为雅典出谋划策。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把古希腊人民团结起来，最终击败了波斯人。古希腊人将波斯人视作对立面，他们认为自己与东方人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事实是他们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古希腊人对文明的狂热追逐及其自恃的“高人一等”在其对葡萄酒的迷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当时，同乐会是人们议事集会的主要场所，而葡萄酒则是这类酒会上的正式饮品。觥筹交错间，酒客们唇枪舌剑，针锋相对而又不乏诙谐幽默，对立的双方都试图在言辞、诗情及智慧等方面占得上风。同时，同乐会的庄重气氛和文化氛围也时刻使古希腊人忆起他们的“优越”——古希腊人喝葡萄酒，这是多么文明的风俗啊——相比之下，那些野蛮人喝的都是低俗的啤酒；即使有少数人喝葡萄酒，他们喝的方式也不及古希腊人这般高贵。

用修昔底德（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作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位作家）的话来说，“直到学会了种植橄榄树和葡萄藤以后，地中海人才从野蛮人群中崭露头角”。据某传说记载，为了摆脱嗜饮啤酒的美索不达米亚人，酒神狄奥尼索斯逃往古希腊。古希腊文化中有一个相

对客观，但依然厚此薄彼的说法：有些地方不能种植葡萄，狄奥尼索斯是为了这些地区的人民才创造了啤酒。在古希腊，每一个人都能喝到狄奥尼索斯赐予的葡萄酒。正如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在其作品《女酒神信徒》中的描述：“不论是对富人还是穷人，酒神都赐予了葡萄酒之悦，这使他们百痛皆消。”

古希腊的气候和地形为葡萄的生长提供了理想的自然条件，因此，古希腊葡萄酒产量丰富，价格低廉，大部分人都消费得起。公元前7世纪，葡萄的种植在希腊迅速兴起，最初是在阿卡迪亚和斯巴达，随后蔓延至阿迪卡（雅典周边地区）。古希腊是世界上第一个进行大规模商业化葡萄种植的民族，他们的栽培技术有条有理，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科学的。古希腊人对葡萄栽培技术的文字记载始于公元前8世纪赫西奥德^[3]的著作《劳作与时日》。该书向人们介绍了修剪枝叶、收获果实、葡萄榨汁的最佳时节和方法。后来，古希腊酒商对葡萄榨汁的方法加以改进，同时摒弃了树上架藤的方法，转而将藤一列列地架在棚子或木桩上。这样，单位空间里能容纳的葡萄藤数量增加了，葡萄的产量提高了，收获葡萄也更方便了。

渐渐地，谷物的种植为葡萄及橄榄树的种植所取代；葡萄酒由农民自产自用的劳动产品逐渐发展成一种独立的商品；葡萄酒的生产也由满足本地人日常需求的作坊生产转为大规模的商业化生产。当时，一个农民在单位面积土地上种植葡萄的经济效益比种植谷物高20倍，难怪农民们纷纷弃谷物种葡萄。在阿迪卡地区，这种转变是如此巨大，以至于阿迪卡人为了维持内部谷物供给平衡，不得不从别处进口谷物。渐渐地，葡萄酒成了古希腊主要的出口商品，通过海上贸易最终兑换成其他商品。葡萄酒就是财富，到公元前6世纪，拥有葡萄园的多少成为划分希腊有产阶级的标尺：底层有产者拥有的葡萄园不足7英亩，向上三层拥有的葡萄园面积分别约为：10英亩、15英亩、25英亩。

在一些偏远的古希腊岛屿上也有人生产葡萄酒，如希俄斯、萨索斯、莱斯沃斯及现在的土耳其西岸地区；这些产自岛屿的葡萄酒风味独特，誉满四海。与葡萄酒相关的图案也曾出现在古希腊的钱币上：希俄斯的钱币上刻有极具地方特色的酒罐；色雷斯城酒罐的把手处及钱币的两面均刻有酒神狄奥尼索斯斜靠着毛驴的画面。葡萄酒在当时社会的经济地位由此可见一斑。葡萄酒贸易的重要经济地位使葡萄园成为各个城邦大兴战事、劫掠破坏的主要对象。关于这一点，我们可

以在古人对（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记述中加以考证。公元前424年，斯巴达军队在葡萄收获前夕到达马其顿的葡萄酒产地阿肯色城。当时，马其顿是雅典的盟友；但阿肯色人害怕斯巴达军队会破坏他们即将收获的葡萄园，同时也被斯巴达首领布拉希德的三寸巧舌所动摇，于是，他们进行了投票，最终决定倒戈。就这样，葡萄园保住了，他们顺利地收获了果实。

在古希腊，葡萄酒越来越普及——甚至连奴隶都在喝葡萄酒——能否喝到葡萄酒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喝的是哪一种葡萄酒。古希腊曾经一度是世界上葡萄酒饮用最为广泛的国家，葡萄酒勾勒了那段时期古希腊社会的等级制度。古希腊的葡萄酒迷们对本土及进口的各类葡萄酒作了精细的划分。各种风味的葡萄酒逐渐树立起了自己的品牌，而相应的各个产地也开始采用不同形状的酒罐来盛装不同种类的葡萄酒。这样，偏爱某种葡萄酒的顾客便可确知自己买到的是正品。阿切斯图亚特（公元前4世纪居住在西西里的希腊美食家）就偏爱产于莱斯沃斯的葡萄酒。据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期间的希腊喜剧显示：产于希俄斯和萨索斯的葡萄酒尤为闻名。

与葡萄酒发源地的居民不同，古希腊人关注

的是葡萄酒贮藏年限的长短，而非其酿造年份。或许是因为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贮藏方法对葡萄酒质量的影响远比酿酒年份大得多，古希腊人很少比较酿酒年份，他们注重的是葡萄酒储藏年份的长短。年份越长，葡萄酒越好。陈年葡萄酒往往是地位的象征。公元前8世纪的古希腊诗人荷马在其著作《奥德赛》中描绘了神秘的英雄奥德修斯，他有一间屋子，里面有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华美服饰，墙角还堆放着数坛醇正甘美的陈酿葡萄酒。

对古希腊人而言，饮用葡萄酒是文明和优雅的代名词。一个人饮用葡萄酒的种类及年份暗示了他的文化程度。古希腊人偏爱葡萄酒胜于啤酒，偏爱上等葡萄酒胜于普通葡萄酒，偏爱陈年葡萄酒胜于新酿葡萄酒。当然还有一点比对葡萄酒的选择更重要，那就是饮酒的仪态和方式，因为这一点更体现了一个人的内在修养。正如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诗人埃斯库罗斯所说：“铜器是外貌的镜子，葡萄酒是思想的镜子。”

像古希腊人那样饮酒

就葡萄酒的饮用方式而言，古希腊与其他民

族的最大差别在于：古希腊人饮用的是掺水的葡萄酒。当时最高级别的社交集会就是一种以掺水葡萄酒为主饮的酒会，或称“交际酒会”。这是只允许男性参加的贵族仪式，地点一般设在一间特别的“男用房间”里——这种为酒会专门独辟一室的做法也强调了规则不凡的酒会与日常生活的区别。屋内的墙壁上通常装饰着与饮酒相关的壁画或器具；有时一套房子中只有这间“男用房间”铺有石板，且石板铺作四周高中央低的坡状，以使屋子便于打扫。“男用房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其他房子都围绕它来建造。

酒会上，男人们坐在一种特别的长椅上，胳膊搭在靠垫上——这是公元前8世纪由近东传入古希腊的流行坐姿。通常，参加酒会的人数约为十几人，至多不会超过30人。女人不能与男人同席而坐，但女侍从、女舞者及女乐手还是可以出现在交际酒会上的。酒会开始时，先上菜，但并不上饮品。宴席过后，侍从们撤下菜，然后端出葡萄酒。雅典人有三祭酒的传统：一祭众神，二祭先辈中的英雄志士，三祭众神之神宙斯。有时酒会上会安排一个年轻女子吹长笛，大家随着笛声唱起圣歌，人们献出花环或葡萄藤；有时人们还用香水来增添现场气氛。仪式过后，人们才开始饮酒。

他们将葡萄酒放在“调酒器”（一种瓮状的双耳广口大容器）内，然后将水由一个三角容器内导入掺和器中。兑入水量的多少决定于人们的酒量。通常，水与葡萄酒的比例约为2比1，5比2，3比1，4比1。比例为1比1的酒水混合物被视作“烈性葡萄酒”。有时为了便于保存，人们在海上运输前先将葡萄酒蒸馏，使之成为高浓度葡萄酒。这种葡萄酒需掺入8到20倍的水方能饮用。在炎热的时节里，也有人将葡萄酒放入井水中或在葡萄酒中掺入雪，制成“冰镇葡萄酒”。而这些雪是人们在冬季收集起来，放在地窖里用稻草包好保存下来的，其间的艰难自不必说。当然，也只有那些有钱人才能以这样奢侈的方式喝酒。

在古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的眼中，不论你喝的酒有多高级，喝不掺水的葡萄酒就是野蛮的行为。他们认为，只有酒神狄奥尼索斯才能消受不掺水的葡萄酒。在神话传说中，狄奥尼索斯从一种形状特别的瓮中取酒饮用，这暗示了其中并未掺水。相对而言，凡夫俗子只能喝这种烈性已被水稀释的酒水混合物。若饮用未掺水的葡萄酒，凡人的性情可能变得十分暴戾甚至疯狂。狄奥尼索斯说：这样的事情曾在斯巴达王克里昂米尼的身上发生过。当时，克里昂米尼受北海北部地区的游牧民族赛西安人的影响，染上了饮用未掺水的葡萄酒的习惯。雅典哲学家柏拉图曾特别提到

赛西安人及其邻邦色雷斯人^[4]，说他们的饮酒方式不可理解，没有修养：“赛西安人和色雷斯人，不论男女，都喝未掺水的葡萄酒；他们还把葡萄酒浇在衣服上，并将这种行为视作令人愉悦且倍感荣耀的习俗。”马其顿人也曾因嗜饮未掺水的葡萄酒而恶名昭著。亚历山大大帝及其父菲利浦二世都曾经是四海皆知的酒徒。亚历山大在一次交际酒会上喝得烂醉如泥，失手杀死了他的朋友克里特斯。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于一种神秘的疾病。据说，过度饮用葡萄酒加速了他病情的恶化。这个说法是否确凿，我们还难以确知；因为“适度饮酒是德行，过度饮酒是堕落”的观念广泛见于各类古代典籍中，让我们难辨真伪。



古希腊交际酒会上的酒客。坐在长椅上的人用浅碗畅饮稀释的葡萄酒，笛手在奏乐，奴隶从公用的“调酒器”中为酒客们添酒。

水使葡萄酒成为安全的饮品，葡萄酒也使水成为安全的饮品。葡萄酒中不含病原体，在发酵过程中还能产生一种天然的抗菌素。古希腊人深知饮用受污染水的严重后果，但他们起初并没有意识到葡萄酒能够杀菌，只知道喝水最好喝泉水、井水或蓄水池里积留下来的雨水。据观察，用葡萄酒清洗伤口比用清水更能预防感染。这一现象也表明：葡萄酒具有杀菌清洁的功效。

古希腊人认为，喝不掺水的葡萄酒是粗鄙的行为，但不喝葡萄酒也同样粗鄙；酒水混合的饮

酒方式是他们区分过度饮酒的野蛮人与滴酒不沾的粗鄙人的标准。对此，古罗马时代的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曾有这样的描述：“醉汉蛮横而粗鲁……另一方面，绝对戒酒主义者又让人觉得难以相处，看小孩的工作比主持酒会更适合他们。”究竟该怎样对待葡萄酒才不枉费酒神狄奥尼索斯赠予人间的玉液（葡萄酒）呢？古希腊人心目中的理想答案既不是拒之于千里之外，也不是过度嗜酒，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不温不火的态度。为了求得这种效果，“交际酒会主持人”应运而生。这类主持人或由房主来担当，或通过投票或掷骰子的方式在与会者中选出。“节制适度”是交际酒会成功的关键：主持人的职责是恰当地把握与会者饮酒的度，使他们的精神状态介于清醒与宿醉之间。这样，他们才能放下心头的顾虑，尽情地畅所欲言；同时，又不至于像野蛮人那样醉后要酒疯，乱作一团。

古希腊人通常是把葡萄酒倒在一种带有双耳的浅酒杯里（称作基里克斯陶杯）饮用；有时，他们也用一种更大更深的双耳大酒杯或角状杯来盛酒。而酒会侍从的手里都握有一个酒壶，他们在交际酒会主人的指挥下将酒从“调酒器”倒入酒杯中。一罐葡萄酒斟尽，再换一罐新的来。

酒器外观装饰精美，上面常画有人们想象中

狄奥尼索斯的样子。随着葡萄酒文化的发展，酒器上的装饰图案也越发华美。装饰陶制酒器的传统工艺是“黑色图案”技术（一种将图案用黑色表现的工艺；陶器在上火以前，先将图案的细节部分用雕刻的线条凸显出来）。这种工艺起源于公元前7世纪的古希腊城邦科林斯，随后迅速传至雅典。自公元前6世纪起，“黑色图案”工艺逐渐为“红色图案”工艺（图案处用陶土天然的红色来表现，细节处用黑色表现，其余部分上色）所取代。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看到许多古希腊时期遗留下来的用这两种工艺制成的陶器，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酒器。这诸多的陶制酒器往往让人们误以为古希腊人都用陶器喝酒。其实，古希腊的富人们并不用陶器喝酒，而是用金银酒器。陶器之所以保留至今是因为它们经常充当陪葬品。

古希腊人坚持要为酒会设定一系列正式的礼仪和规矩——恰当的酒具，规范的家具，正式的着装——以此来体现酒客的品位。但酒会上的实际情形又是怎样的呢？答案不一而足。因为不同的交际酒会就像不同人的生活一般，千姿百态，各有千秋，同时也从不同角度折射了古希腊社会。有些交际酒会雇用了乐手和舞者进行正式的表演；有些交际酒会上，酒客们即兴发挥，吟诗作曲，巧舌雄辩，竞显才情；有些交际酒会是探讨哲学和文学的正式场合，这类交际酒会允许年

轻人参加，以提高他们的文化涵养。但也不是所有的交际酒会都这般庄严正式。当时有一种游戏格外流行。游戏中，人们将杯中的最后几滴葡萄酒弹向一个具体的目标，如某个人或一个圆盘状的铜靶。有时，酒客们甚至将目标锁定在水盆里浮在水面上的杯子，试图以滴酒为箭，将杯子击沉。人们对这种游戏是如此狂热，一些人为玩此游戏甚至去修建一种圆形房间专供娱乐。

许多年轻人都把精力放在如何提高玩游戏的技术上，而荒废了在狩猎和战争中颇具实际意义的掷标枪运动，这使传统主义者甚为担忧。

根据观点和立场的不同，酒客们分成几个组，他们一边喝酒，一边与对手唇枪舌剑，以此来表现对自己一方的忠诚。随着一罐罐葡萄酒下肚，酒会的气氛也愈加热烈。最终，酒会抑或升级为纵酒狂欢宴，抑或演变成一场暴力事件。有时酒会过后还会举行一个展现气势的仪式。仪式中，同一组的成员如夜间狂欢般在大街上招摇而过，以此来显示自己团队的力量和团结。这种仪式有时可以带来正面的宣传，有时则导致暴力或恶意破坏等负面行为——关键看酒客们当时处在怎样的精神状态中。正如尤伯罗斯剧本中的一个片断所述：“为那些明理人，我只准备3罐酒：饮下第1罐是为了健康，饮下第2罐是为了爱和快

乐，饮下第3罐则是为了呼呼大睡。3罐酒下肚后，明智的人便打道回府。而第4罐以后的酒不再属于我的管辖——第4罐让人举止低俗，第5罐让人大吵大嚷，第6罐让人言行粗鲁互相谩骂，第7罐让人大打出手，第8罐让人打破家具，第9罐让人意志消沉，第10罐让人失去理智、精神癫狂。”

举办交际酒会的初衷是为了追求各种生活乐趣，文化乐趣也好，社交乐趣也好，性爱乐趣也好，都是对生活有积极意义的追求，能释放人们内心的各种不良情绪，安抚人们心中过于激烈的情感。为了防止这种酒水混合物使酒客们失去理智，人们还制定了一系列饮酒规则。交际酒会既包含了古希腊文化中至优的成分，又包含了其中的至劣成分。古希腊哲学家常将清水视作善，将葡萄酒视作恶。于是，人们在交际酒会上饮用的酒水混合物就成了哲学家们引喻万物的绝佳象征物，微观上暗喻了作为个体的人，宏观上影射了整个社会。就这样，交际酒会折射了柏拉图等哲学家对古希腊社会的看法。

饮酒的哲学

哲学是对智慧的追索，还有什么地方比酒会更适合探求真理？酒会上，葡萄酒可以让人百无忌。不论是令人愉快的还是令人不快的，你都可以畅所欲言。公元前3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埃拉托塞尼曾断言：“酒能揭露隐藏的真相。”古希腊人将交际酒会视作探索真理的绝佳场所，他们常常一边喝葡萄酒，一边就某一话题展开讨论，由此可以看出古希腊人对酒会的偏爱。史上最著名的例子要数柏拉图的《会饮篇》。根据该书的记载，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也常常参加他的交际酒会，并与众多与会者一起探讨关于爱的话题。在畅饮了一整夜之后，大家都酣然入梦，只有苏格拉底还神志清醒，毫无醉意；天一亮，他就开始照常进行白天的工作。柏拉图称他为理想的酒客：他借助葡萄酒的力量来追求真理，同时依然能够保持头脑清醒，不为酒奴役。苏格拉底还出现在另一部类似的著作中——色诺芬的《会饮篇》。该书大约写于公元前360年，作者是柏拉图的另一个学生色诺芬，书中主要描写了雅典的交际酒会。柏拉图的《会饮篇》是一部严肃的写实作品，而色诺芬的《会饮篇》则是一部轻松的虚构作品。与前者相比，后者对人物的刻画更加生动鲜活，描写的对话更具智慧性和启发性。酒会上讨论的主题依然是爱，而为讨论注入活力的是品质上好的葡萄酒。



柏拉图认为，葡萄酒为考验人的品格提供了一种良好

的方法。

当然，上面提到的纯哲学性交际酒会大多只出现在人们的文学想象中，现实生活中很少有这样的酒会。但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葡萄酒的确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起到揭示真相的作用：它能够使饮酒者吐露真性情。柏拉图反对现实酒会中人们的享乐行为；但要问“为什么我们无法适当地利用畅饮来检验人们的品格”，他又说不清楚理论上到底哪里行不通。在《法律篇》一书中，柏拉图借书中人物之口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在酒会上与一个人共饮其实是检验这个人品格的最简捷最可靠的方法。根据书中的描写，苏格拉底假设有一种能唤起人们心中恐惧的“恐惧药水”，那么我们也可以利用它将“无畏”和“勇气”注入人们心中。随着酒客们不断增加饮用量，他们也渐渐学会战胜自己的恐惧。当然（正如苏格拉底对一位讨论者所说）这种药水在现实当中是不存在的。但柏拉图将之与葡萄酒类比，认为葡萄酒是为人们注入自我控制力的理想饮品。

作为宴饮的葡萄酒用途多多。首先，葡萄酒可以检验人们的品性；其次，葡萄酒可以陶冶人们的性情。如果我们适度节制的话，还有什么比充当宴饮更能让葡萄酒物尽

其用？还有什么比葡萄酒更廉价，更纯净？试想一下，如果你想考验的人是一个脾气暴躁、粗鲁野蛮、十恶不赦的恶棍，那么采用下列哪种方法更安全：是冒着生命危险用言语试探、挑衅，还是在狄奥尼索斯的宴会上与之结伴共饮？如果你要考验的人看起来极富爱心，为了深入了解此人的灵魂，你会将妻子儿女托他照看，置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于危险中吗？……要检验一个人的品格，在酒会上与之共饮是很好的办法，这比其他任何方法都安全、省钱、快捷。

柏拉图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饮酒可以考验一个人的品性。因为酒可以使人们暂时忘却尘嚣的纷扰，唤起深藏在他们心中的某种情感——爱、骄傲、愤怒、无知、贪婪、胆怯，并使他们沉浸其中。为了使酒会正常进行，他制定了一系列规则来帮助人们有效地控制不合理的冲动，战胜内心的邪恶。他还宣称：“葡萄酒是神赐予凡人的安慰剂；它将谦逊的品格植入我们的灵魂，将健康和力量注入我们的躯体。”

酒会在政界也有所隐喻。在现代人眼中，如果在某个宴会上大家都从同一个碗中平等地取酒饮用，这个宴会就能体现民主的观念。古希腊的

酒会是民主的，但还不是现代意义的民主。当时的民主通常仅限于上层阶级，但就投票权而言，雅典的“民主”允许大约占总人口1/5的自由人行使投票权。古希腊的民主是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奴隶从事繁重的劳动，上层阶级也不会有足够的空闲参与政治活动。

柏拉图对民主持怀疑态度。一方面，民主扰乱了自然秩序。如果规定人人平等，那么一个人为什么还要服从他的父亲和师长呢？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提出：把过多的权力放在百姓手里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无政府状态——只有专制才能改变无政府状态，恢复社会秩序。根据书中的描述，苏格拉底将民主的支持者痛斥为邪恶的斟酒者，他们怂恿饥渴的人们沉迷于“自由的烈酒中”。换句话说，权力好似葡萄酒，不胜酒力的人喝多了会醉。不论是上述哪种情况，结果都是混乱的。像这样隐喻酒会的例子在《理想国》中还有很多，而且几乎所有的隐喻都是贬义。柏拉图认为，理想的社会应该由社会精英团体来领导，而这个团体的领导者应该是顶级哲学家。

简而言之，酒会反映了人性的善恶面。但柏拉图总结道，只要我们按照正确的规则行事，善总会压倒恶。事实上柏拉图曾在古希腊城外建立了自己的学园，在这里讲授哲学长达40余年，并

完成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著作，其中《会饮篇》一书将柏拉图的讲学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据某史书记载，每日讲课讨论过后，柏拉图就和学生们的们一起吃饭饮酒，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用睿智的探讨吸取新知，同时也可以增进彼此的感情”。席间，侍者根据柏拉图的指示适度上酒，以确保整个过程都处在文化陶冶的状态中。据说，与柏拉图共同进餐的人第二天都感到神清气爽。他们的进餐过程中没有乐手和舞者表演，因为柏拉图认为受过教育的人应该有能力在“有秩序地交替发言和倾听”中得到愉悦。直到今天，在进行学术交流时，我们依然以学术论坛或研讨会的形式继承着这个传统，提倡与会者在规定的范围内交替发言、各抒己见、相互讨论、取长补短。

酒罐文化

葡萄酒象征着文化。它精确地刻画了社会的阶级分化，体现了高度发展的文明成果，推动了哲学的发展，同时也点燃了享乐主义的星火。随着葡萄酒向四海传播，这些价值观也跟着传向世界各地。根据已出土的希腊葡萄酒酒罐的分布情况，考古学家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证实葡萄酒无论到哪里都深受欢迎，且古希腊风俗和价值观也

对各地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到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葡萄酒已出口海外，东至克里米亚半岛，西至法国，南达埃及，北抵多瑙河流域。在法国南海岸附近打捞的一艘古代沉船上，人们发现了10 000罐葡萄酒，总共约有250 000升，用现代的葡萄酒瓶可以装333 000瓶，可见当时葡萄酒贸易规模之巨大。在远销葡萄酒的同时，古希腊商人也将葡萄种植技术传至各地，将葡萄酒酿制技术传入西西里、意大利南部及法国南部地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葡萄种植技术很有可能就是从古希腊人或腓尼基人（生活在今天叙利亚及黎巴嫩一带的古代航海民族）那里引入的。在法国南部的一座建于公元前6世纪的凯尔特^[5]古墓中，人们发现一辆四轮马车上停放着一具贵妇人的尸骨，马车的车轮已被人卸下，扔在一旁。古墓中出土的奇珍异宝中，有一套保存完好的古希腊进口酒具，其中包括一个硕大的做工精美的“调酒器”。在其他凯尔特古墓中，人们也发现了类似的容器。古意大利也曾从古希腊进口过大量葡萄酒及酒具。当时，意大利西北部的伊特拉斯坎人^[6]狂热地效仿着古希腊酒会的风俗，以此来显示自己的修养。

诸如饮用葡萄酒等古希腊风俗被同时代的其他文化争相效仿。航船承载着古希腊葡萄酒，同

时也承载着古希腊文明，它们将一罐罐的古希腊文化带到了世界各地。就这样，葡萄酒取代了啤酒，成为最文明最高雅的饮品——当年幸亏古希腊人将葡萄酒与文化成就联系起来——直至今今天，葡萄酒依然保持着文明饮品之冠的地位。

[1] 克里特岛（Crete），位于地中海北部，是希腊的第一大岛，总面积8 300万平方公里。——编者注

[2] 迈锡尼文化和克里特文化密切相关，二者共同构成了爱琴文明。——编者注

[3] 赫西奥德，公元前8世纪末至7世纪初的古希腊诗人。——编者注

[4] 色雷斯人是巴尔干半岛最早的居民之一，主要分布在现今的保加利亚、希腊、马其顿、罗马尼亚和土耳其等国境内。——编者注

[5] 凯尔特人在古罗马时期与日耳曼人、斯拉夫人一起被古罗马人并称为蛮族，也是现今白种人的代表民族之一。——编者注

[6] 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亦译埃特鲁斯坎人，是古代意大利西北部伊特鲁里亚地区古老的民族，其居住地处于台伯河和亚努河之间。——编者注

帝国的藤蔓

沐浴、葡萄酒和性爱会销蚀我们的肉体。可是没有了它们，生活还有什么乐趣？

——《荒卷典俊》第6卷

古罗马对阵古希腊

大约在公元前250年，来自意大利中部的古罗马人取代古希腊人成为地中海流域的霸主。这期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古罗马人也像其他欧洲人一样，喜欢以效仿古希腊风俗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修养。他们借用古希腊众神及古希腊神话，采用一套改良的古希腊字母系统，模仿佛古希腊的建筑风格，连古罗马法律体系也是以古希腊法律体系为样板建立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古罗马人都曾经读过古希腊文学作品，而且会说希腊语。一些古罗马人对此不禁发出慨叹：表面上，古罗马人战胜了古希腊人；实际上，古罗马人被古希腊人的文化打败了。公元前212年，古希腊的锡拉库萨殖民地陷落，古罗马人带着工艺精美的希腊雕像凯旋。性格乖戾的古罗马人老加图将古希腊

文化视作负面影响，他说：“不是我们胜利了，是那个已经消失了的民族征服了我们。”他说得没错。

在加图等不可知论者的眼中，虚弱、纵欲、变幻无定的古希腊文化与讲求实际、简明扼要的古罗马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于是争辩道，虽然古希腊文化曾有诸多令人钦佩之处，但后来这些文化都退化了，因为古希腊人为他们辉煌的历史自豪得忘乎所以，过度沉迷于文字游戏及哲学论证。尽管他们对古希腊文化微词颇多，但谁也不能否认古希腊文化对古罗马文化的巨大贡献。这样一来，悖谬的现象出现了：随着古罗马的势力范围不断向地中海地区及海外扩张，很多古罗马人厌倦了对古希腊人的竭力效仿，但他们又根深蒂固地继承着古希腊的文化艺术遗产，并把这些文化传统发扬光大。

葡萄酒的生产和消费为沟通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价值观建立了一座桥梁，从而为解决上述悖论提供了一个途径。古罗马人为自己的出身备感自豪。他们将自己视作由卑微的农民发展成士兵和统治者的民族。每场战役胜利后，参战的士兵都会得到耕地作为奖赏。当时，农田里最常种植的是葡萄。彬彬有礼的古罗马人坚信，虽然他们也在古希腊风格的别墅里享受奢华的宴会和酒会，

但通过种植葡萄，他们依然能够找到自己的民族魂。

加图自己也承认，葡萄种植为平衡简约的古罗马价值观和繁复的古希腊价值观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种植葡萄是脚踏实地的诚实劳动，而其最终产物——葡萄酒则是文明的象征。对古罗马人而言，葡萄酒既代表着他们的起源，又代表着他们（文明发展）的现状。古罗马军队由勤劳的农民组成，其象征物是古罗马军团百人队的军衔徽章：一个由葡萄藤制成的权杖。

坛坛葡萄酒通罗马

公元前2世纪初，古希腊葡萄酒依然主宰着地中海地区的葡萄酒贸易，而且是唯一一种大规模出口意大利半岛的葡萄酒。但古罗马葡萄酒也不甘示弱，迅速跟进。南部号称“葡萄酒国度”的地区从前是古希腊的殖民地；如今，这里已是古罗马人的地盘。随着葡萄酒的生产由南向北传播，古罗马的葡萄酒产量也逐步增加。大约在公元前146年，随着古希腊城市科林斯的陷落及北非迦太基的灭亡，古罗马成为地中海的霸主，意大利半岛也随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葡萄酒产地。

在吸收和传播古希腊文化的同时，古罗马人也引入了古希腊的酿酒技术，并享用着最好的古希腊葡萄酒。起初，葡萄藤是由古希腊岛移植到意大利的。意大利酿酒者开始模仿畅销古希腊葡萄酒的制作工艺。海水风味的Cos葡萄酒就是这种模仿的结果；Coan只代表一种葡萄酒的风味，而不代表其产地，原因就在于此。葡萄酒制造商们纷纷由古希腊前住意大利，因为那里已经成为新的葡萄酒贸易中心。据古罗马作家老普林尼估算：到公元70年，古罗马境内已有80种名牌葡萄酒，其中2/3产自意大利。

葡萄酒是如此流行，光靠农业生产已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于是，胸怀大志的农民把目光投向了一种更有利可图的买卖：利用奴隶发展别墅建造产业。葡萄酒生产规模的扩大是以牺牲谷物生产为代价的。因此，古罗马开始依赖从非洲殖民地进口的谷物。随着别墅建造产业的不断扩张，一些农民卖掉土地，搬往城市居住。就这样，他们由农民转变成城市居民。公元前300年，古罗马的人口约为10万人；到公元元年，古罗马人口已达100万之多——古罗马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与此同时，随着葡萄酒的生产在古罗马中心地区不断密集化，葡萄酒的消费量也在不断增加。无论是在古罗马帝国境内还是境外，人们纷纷饮用葡萄酒，并传承着其他各

种古罗马风俗。富有的不列颠人（古代居住在不列颠的一部分凯尔特人）也摒弃了啤酒和蜂蜜酒，向从遥远的爱琴海地区进口的葡萄酒投以青睐的目光。当时，意大利葡萄酒远销至印度北部及尼罗河南部。在公元1世纪的百年当中，为了满足市场需要，西班牙及古罗马南部省区高卢也开始加快生产步伐，提高葡萄酒产量。但意大利葡萄酒依然是人们心中最好的葡萄酒。人们通过水路将葡萄酒从地中海的一端运往另一端。通常，葡萄酒是船上的主要货物，被放在船上的冷藏室里储藏，每艘船每次可载2 000~3 000罐。有些船除了葡萄酒还运载其他货物：奴隶、坚果、玻璃器皿，香水及其他奢侈品。有些酒商的船只运载自己生产的葡萄酒。在一些古代船只的残骸中，人们发现酒罐与船锚上都刻着酒商的名字。装载葡萄酒的酒罐通常是一次性的。葡萄酒被人们消费掉以后，酒罐就被碾碎、销毁。在马赛、雅典、亚历山大、古罗马等地中海港口的废墟中，人们发现了数以万计的酒罐柄，柄上的印记表明了罐子的产地、内容物品等信息。对这些罐柄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我们就能绘制出当年葡萄酒贸易的航海路线，了解古罗马政治对葡萄酒贸易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古罗马一间巨大的仓库里有一个高达150英尺^[1]的废物堆。人们在其中发现了许多酒罐柄，大部分源自公元2世

纪的西班牙。当时，意大利葡萄酒产量神秘锐减，原因不详（有可能是因为瘟疫），而西班牙则乘机大力拓展葡萄酒贸易。公元3世纪初，随着塞维鲁^[2]的上台（公元193年），北非葡萄酒开始雄霸天下。由于古罗马人和西班牙人支持塞维鲁的对手克劳蒂斯，塞维鲁便在自己的家乡雷普西斯马格那（现在的黎波里）大力提倡并投资生产葡萄酒。此后，他一直都对家乡的葡萄酒情有独钟。

最好的葡萄酒大部分都运往古罗马。货船在古罗马西南几英里^[3]处的奥斯蒂亚港靠岸。一群码头工人熟练地将笨重的大酒罐从船上搬起来，穿过狭窄的跳板，把酒送到岸上。跳板的旁边站着潜水员，他们负责捞起不慎掉进水中的酒罐。卸货完毕后，人们将葡萄酒从大酒罐中倒出来，分装在小容器里，然后沿着台伯河运往古罗马城。到达古罗马以后，搬运工人先把葡萄酒搬进阴暗的批发仓库地窖，然后将酒从小容器转入大坛子里，放在地下冷藏。零售商贩们都到这个码头仓库进货。他们用手推车推着葡萄酒，沿着古罗马城狭长的街巷，一路叫卖。公元2世纪初的古罗马讽刺作家尤维那曾描写过自己对古罗马喧闹街市的印象：

前方的路被堵截了。

我们忙着赶路，心急如焚。前面的人流愈加密集，后面的人潮愈加汹涌，直戳着我们的脊背；胳膊肘推搡着你，棒子打在你身上，莫名飞来的棍子或酒罐砸在你的头上；我的一只脚陷在泥里，被来自四面八方的脚不停地践踏着，一个士兵的鞋钉子刺进我的脚。

穿越喧闹的街市，一坛坛葡萄酒进入各个商铺。古罗马的大户人家派奴隶带着空坛子去买葡萄酒，或安排人定期送酒。酒贩们推着小车挨家挨户地叫卖。就这样，从古罗马帝国边陲省份运来的葡萄酒到达了古罗马市民的餐桌，被他们喝下肚。

每个人都能喝？

通常情况下，选择何种葡萄酒算不得什么重要的事，但对马库斯·安东尼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他是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演说家。公元前87年，马库斯发现自己在政治斗争中站错了队。老将加伊马斯在掌握大权之后就开始大肆迫害其

对手苏拉的同党。于是，马库斯就躲到了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朋友那里避难。他以为没人会想到来这样的穷苦人家搜人。可那位朋友却无意间泄漏了他的行踪。为了用与他身份相称的葡萄酒款待他，朋友竟愚蠢地派人去附近的酒铺买酒。仆人尝了尝铺里的酒，觉得不够高级，就问老板有没有昂贵的上品葡萄酒。老板很奇怪，问其原因，仆人便将个中缘由道出。老板听罢，赶忙去向加伊马斯报告。加伊马斯闻讯立刻派人诛杀马库斯。但当士兵们闯入马库斯的房间后却不忍杀死他，马库斯演说的巨大震撼力由此可见一斑。后来，指挥官走进房间，看到眼前的情势气得破口大骂，痛斥士兵们都是懦夫，然后抽出剑亲手砍了马库斯的头。

和先辈古希腊人一样，古罗马人也将葡萄酒视作广泛饮用的日常饮品。无论是恺撒还是社会底层的奴隶，人人都可以喝到葡萄酒。但古罗马人将古希腊风格的鉴赏力推向了新的高度。藏匿马库斯的那个房主绝不会想到要用自己饮用的普通葡萄酒来招待他。葡萄酒成了社会阶级的象征，标志着饮酒者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如果想知道古罗马社会的贫富差距有多悬殊，看看最富者与最穷者的酒杯里盛的是何种葡萄酒便可知晓。对于古罗马的富人们来说，学会辨别各种极品葡萄酒是他们重要的必修课，因为这能体现出他们

足够富有，喝得起最好的葡萄酒，而且对葡萄酒有所研究，能够准确地分辨葡萄酒的不同种类。

世人公认的最好的葡萄酒是产自意大利坎帕尼亚地区的费乐年白葡萄酒（**Falernian**）——这个名字后来成为奢侈品的代名词。直到今天，人们还对它记忆犹新。费乐年葡萄酒的原材料是有讲究的，只有费乐年山（位于现在的那不勒斯以南）的山坡上采下的葡萄才能用来酿这种葡萄酒。酿制**Caucine Falernian**葡萄酒要用生长在山巅的葡萄；被人们誉为极品费乐年的葡萄酒要用山腰的葡萄酿制（由于这个山坡是苏拉的儿子**Faustus**的产业，故称此酒为**Faustian Falernian**）；生长在较低山坡上的葡萄酿制的葡萄酒统称为费乐年葡萄酒。极品费乐年葡萄酒呈白色，通常都是10年以上的陈酿酒；如果封存的年头足够多，酒就会由白色变成金黄色，这时的费乐年葡萄酒可谓是极品中的极品。由于这种葡萄酒是限量生产的多年陈酿葡萄酒，其价格也高得令人瞠目结舌，因此只有上流人物才喝得起。据传，费乐年葡萄酒有着神圣的起源：一天，云游四方的酒神巴克斯（古罗马版的希腊酒神狄奥尼索斯）化作凡人之身来到了费乐年山。夜幕降临时，他遇到了一个农民。当时，农民并没有认出他是酒神。见他无处可去，这个善良的农民就留他在自家的寒舍过夜。后来，酒神为了报答这位农民，便在

费乐年山的山坡上撒满了葡萄种子，并将农民家的牛奶全都变成了葡萄酒。

至今，世界上最著名的费乐年佳酿酒是公元前121年以当年的执政官欧皮米乌斯的名字命名的欧皮米恩费乐年酒。公元前1世纪，恺撒大帝饮用的就是这种欧皮米恩费乐年酒；公元39年，卡利古拉皇帝也品尝到了160年的欧皮米恩费乐年陈酿酒。公元1世纪的古罗马诗人马提雅尔称费乐年酒为“不朽的佳酿”，虽然这时的人们早已喝不到真正的费乐年酒。

其他各种高级古罗马葡萄酒也都名扬四海，如Caecuban、Surrentine、Setine等。夏季，人们常常从山上采雪，放在葡萄酒里解暑。老普林尼等古罗马作家对这种冰镇葡萄酒的做法深恶痛绝，他抱怨这种做法违背了自然规律，再一次证明了时代的退化。一方面，传统主义者号召人们回归旧时古罗马的简约风格；另一方面，人们也担心餐饮方面过度的铺张浪费会引起穷人的公愤。

出于上面的考虑，政府颁布了无数“节约法令”来遏制古罗马富人们的奢侈行为。当时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出台新的法令，可是这些法令很少有人遵守。公元前161年颁布的一项法令中明确地规定了每人每天可以花费在食品及娱乐方面

的最大金额；后来，一些法令又详细规定了婚礼和葬礼中哪些食物可以入宴，哪些食物严禁入宴。某些条款中还规定：人们不许穿丝绸礼服；黄金花瓶只允许在宗教仪式中使用；餐厅一定要有透明的窗户，以便政府督察们随时检查用餐的人是否违规。到了朱利叶斯·恺撒的统治时期，督察们经常在大街上闲逛；有时，他们还突然闯入别人的宴席，没收违禁食品。当时，餐馆的菜单都必须提交政府官员审阅。

古罗马最富有的人喝着最好的葡萄酒；财力次之的人饮用的葡萄酒等而下之；以此类推。就这样，葡萄酒精确地描绘了古罗马社会的等级划分。古罗马的宴会上，侍从会根据每位宾客不同的社会地位奉上不同的葡萄酒。古罗马的“盛筵”与古希腊的“交际酒会”有许多不同之处。理论上讲，古希腊的交际酒会是人人平等的论坛——与会者一边谈论哲学和人生的乐趣，一边从公共的容器中取酒饮用；而古罗马盛筵非但没有让人们在微醺之间忘却社会的等级分化，反而凸显了这种分化。

古罗马人也学着古希腊人的样子以掺水的“文明方式”饮用葡萄酒。但与会者们很少使用公共的“调酒器”；大多数时候他们都在自己的杯中将酒水混合。古希腊酒会没有座次高低之分；

而古罗马宴会则将座次与不同的社会地位联系起来，体现了建立在仆人和主人基础上的古罗马阶级制度。仆人依赖于主人，下层的主人依赖于上一层主人，以此类推。仆人听从主人的差遣，而主人也相应地给予仆人一些经济报酬。仆人们经常陪同主人参加每天清晨举行的“论坛”，而陪同人员的多少也体现了主人的权势。如果主人邀请仆人参加“圣筵”，那么仆人面前所摆放的菜肴和酒一定不如其他宾客的高级，而且仆人常常都是宴会上众人取乐的笑柄。公元1世纪末，老普林尼曾在自己的作品中描述过宴会：主人和他的朋友饮用上等葡萄酒，其他宾客饮用中等葡萄酒，自由人（从前的奴隶）饮用下等葡萄酒。



古罗马宴会上，酒客们在饮用葡萄酒。

粗劣廉价的葡萄酒中常掺有各种添加剂，有的用作防腐剂，有的用作香精掩盖酒水腐坏的味道。古希腊人用盐水或少量海水充当防腐剂。古罗马人也借用了这种防腐方法；但有时他们也采用封瓶口的沥青来充当防腐剂。公元1世纪的古罗马作家科路美拉在一部农学著作中曾提到：“如果用量得当，这类添加剂非但不会影响葡萄酒的味道，甚至还能改善酒的口感。”按照他的配方，将干白葡萄酒与葫芦巴^[4]及海水混合发酵，将得到一种略带果味、清冽甘美的酒（与现代的干樱桃酒类似）。蜂蜜酒是葡萄酒与蜂蜜的混合物，公元1世纪初台比留统治时期，这种饮品作为开胃酒风靡一时。Rosatum也是一种类似的蜂蜜酒，其中添加了玫瑰味的香料。劣质葡萄酒中也经常掺有药草、花蜜等添加剂来掩盖其色味的不足。一些古罗马人甚至在旅途中随身携带香料，以改善劣质葡萄酒的味道。现代人或许会对古人在葡萄酒中放入添加剂的做法嗤之以鼻；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人也常用橡果作增味剂，这和古人的做法本质上区别不大。

与含有添加剂的葡萄酒相比，等而次之的是“勃萨卡”——水与变酸葡萄酒的混合物——这

种酒通常在优质葡萄酒紧缺的时期（如长年战乱）发给士兵饮用；另一方面，这也是古罗马军队的一种简易净水技术。传说，基督受难时，一个古罗马士兵曾交给基督一块浸了葡萄酒的海绵，这葡萄酒很可能就是“勃萨卡”。在古罗马，等级最低的葡萄酒是“劳拉”——分发给奴隶饮用的酒——这种酒是用果皮、种子及叶柄浸泡而得的汁水制成，带有些许酒味和涩味，基本算不上是葡萄酒。从最低等的“劳拉”（Lora）到传奇的“费乐年”，每一种葡萄酒都代表了一个社会阶层。

葡萄酒与医药

公元170年，古罗马的皇家酒窖里举办了一个品酒会，这是历史上规模最盛大的品酒会之一。当时的罗马是“文明世界”的中心，而这个皇家酒窖中珍藏着历代帝王从世界各地搜罗来的传世佳酿。阴暗潮湿的地窖打开了，几缕阳光照进来，马可·奥勒留^[5]的御用医生盖仑沿着台阶走进地窖，身负一项特殊的使命：寻找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

盖仑出生于佩加蒙城（古罗马帝国东部一个

希腊语城市，现在土耳其城市贝尔加马）。年轻的时候，他在亚历山大学习医药，后来在埃及学习非洲疗法和印第安疗法。盖仑继承了希波克拉底的早期理论，认为人有四种体液：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而疾病则是四种体液失衡的结果。过多的体液会淤积在人体的某个部位，形成某种质；例如，过多的黑胆汁郁积在脾里，会使人忧郁、失眠、烦躁易怒。通过一些疗法，可以使体液恢复平衡，比如放血。不同的食物也会对体液产生不同的影响：据说，冰冷潮湿的食物使人产生黏液；干燥热辣的食物使人产生黄胆汁。盖仑在其鸿篇巨制中将这种理论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系统方法。在其后的一千多年里，他的系统方法对世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西方医学的先导。直到19世纪，人们才建立了更加行之有效的医学系统理论。

盖仑对葡萄酒的兴趣源于他的职业经历。作为一名年轻的医生，他在给角斗士治疗伤口时，曾用葡萄酒给伤口消毒——这是当时普遍采用的疗法。和其他食物一样，葡萄酒也有调节体液的作用。盖仑常常为皇帝开出葡萄酒或以葡萄酒为药引的药方。在体液理论的框架下，葡萄酒被视作燥热之物，易生黄胆汁、减少体内黏液。这就意味着体热病人应该避之，体寒病人应该饮之。盖仑认为，越好的葡萄酒，药效越显著。他曾在

书中写道：“要尽可能地使用最好的葡萄酒。”由于当时医治的对象是皇帝，盖仑希望能够用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入药。于是，他在酒窖看门人的陪同下逐个打开酒罐，然后又逐个封好；最后，他径直走向了费乐年。

盖仑曾写道：“既然来自世界各地的好酒都齐集于此，那我定要选出极品之冠。所以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我仔细察看了每一罐费乐年上的标记，然后将那些20年以上的费乐年逐一品尝。我一罐接一罐地仔细搜寻着，直到我找到了一罐毫无苦味的葡萄酒。一罐不失甘甜的古酒才是极品中的极品。”盖仑没有记录他最终选择的那罐最适合医治皇帝的费乐年酒产于哪个年代，但他坚信没有任何一种酒比它更适合给马可·奥勒留治病。葡萄酒应是他日常服用的解毒药，能够起到预防疾病、清除体内毒素甚至解毒的功效。

实际上，在公元前1世纪，本都国王密特拉达蒂斯早已开启用葡萄酒治病的先河。为了寻找最有效的解毒药，他做了一系列实验，让十几个囚犯分别吞下不同的致命毒药。最后，他发明了一种用41种药配制的解毒药，每日服用一次。这种药的味道着实令人作呕（其中的一味药便是切成丁的毒蛇），但却使密特拉达蒂斯摆脱了被人下毒的顾虑。后来他的儿子谋反篡位。据说，密

特拉达蒂斯被逼到一座塔楼里，企图服毒自尽。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发现无论什么毒都毒不死自己。最后，他只好让护卫用剑刺死自己。

盖仑对密特拉达蒂斯的药方作了改进。他配制了解毒秘方——一种普遍应用的解毒剂，万灵药——其中包含71种药：蜥蜴、罂粟汁、辣椒、香料、杜松子、姜、毒芹子、葡萄干、茴香、茴香子、甘草等等。很难想象在吞下这样的混合物后马可·奥勒留还有心情品味费乐年酒；但在出色的医生指导下，他做到了，他用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将这令人作呕的混合物一口服下。

为什么基督教徒喝葡萄酒而伊斯兰教徒不喝？

公元180年，马可·奥勒留逝世，不是因为被人下了毒，而是死于疾病。在他生命的最后7天里，他只服用解毒秘方和费乐年葡萄酒。在他统治下的最后几年里，国家正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稳定、兴旺的时期；马可·奥勒留统治的结束标志着古罗马黄金时代的结束。此后的几个古罗马皇帝都很短命，为了抵御来自四面八方的野蛮人的侵袭，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一个是无疾而终。公元

395年，古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在弥留之际，将古罗马帝国分割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分别交给两个儿子统治，以使古罗马更容易防守。但是没过多久西罗马帝国就瓦解了。公元410年，日耳曼部落西哥特消灭了古罗马帝国，并在高卢西部及今天的西班牙一带建立了一个新的王国。公元455年，古罗马又遭到了汪达尔人的劫掠。此后古罗马一直战事不断，直到西罗马帝国最终分解成几个小国家，这片土地才算平息。

北方部落入侵古罗马后一定会用他们饮用啤酒的野蛮风俗来取代饮用葡萄酒的文明文化，这是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几个世纪以来总结出的经验。虽然北欧的气候不适合种植葡萄，且北欧人皆因嗜饮啤酒而恶名昭著，但他们占领古罗马之后，并未对葡萄酒有丝毫的禁止。当然，北欧部落的入侵的确从很多方面改变了古罗马人的生活：贸易被中断了，一些地区无法买到葡萄酒，早已被古罗马人同化了的的不列颠人在古罗马帝国的坍塌声中仿佛又回到了啤酒的时代。但随着新的统治者继位，古罗马的基督教与日耳曼传统也有互相融合的现象。经历了古希腊、古罗马历代的王朝变迁，地中海地区至今依然根深蒂固地保留着饮用葡萄酒的风俗，这说明了当时的确存在文化的传承。公元5~7世纪起草的法令中明文规

定了破坏葡萄园要受到惩罚——看不出他们有丝毫野蛮人的痕迹。

饮用葡萄酒的文化得以保留下来还应归功于另一个重要的因素：葡萄酒与基督教的联系。从公元元年到公元10世纪的1 000年里，基督教的兴起把葡萄酒推向了基督教的至高象征。根据《圣经》的记述，基督创造的第一个奇迹，就是在加利利海附近举行的一次婚礼上将6坛水变为葡萄酒。基督曾讲述过几个关于葡萄酒的寓言。在对信徒传教时，他也常常将自己比作一株葡萄藤：“我是一株葡萄藤，你们是我的枝叶。”在最后的晚餐中，基督为他的信徒们奉上葡萄酒。这个故事使葡萄酒成为圣餐仪式的主角。圣餐仪式是基督教的重要仪式。在圣餐仪式中，面包和葡萄酒分别代表基督的肉体和血液。还有许多神话传说将古希腊酒神和古罗马酒神与酿酒及死而复生联系在一起。和基督教教徒一样，酒神的信徒们也将饮用葡萄酒视作一种“圣餐”。这两种信仰既有许多相似之处，又存在很大的差异。基督教仪式与朝拜酒神的仪式不同：前者只要求信徒喝少量的葡萄酒，而后者则要求信徒大量甚至过度饮酒。

有人说，古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黑暗时代里，基督教教堂举行的圣餐仪式对于葡萄酒有大

量的需求。于是人们不得不将葡萄酒的生产保持下去——这对葡萄酒文化的传承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葡萄酒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上面的说法未免有些夸大其词，因为实际上圣餐仪式对葡萄酒的需求量很小。到公元1100年，人们只有在祭祀的时候才用高脚杯饮用葡萄酒，一般的宗教集会上只吃圣餐面包。隶属于教堂或寺院的葡萄园生产的葡萄酒大多用于日常的宗教仪式。圣本笃会^[6]的僧侣每天可以喝到一品脱^[7]葡萄酒；有些教堂还依靠出售葡萄酒来维持日常开销。

尽管葡萄酒文化在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保存得相对完好，但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昔日古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臣民改信了伊斯兰教，饮用葡萄酒的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伊斯兰教的创始人——先知穆罕默德出生于公元570年。40岁时，穆罕默德感到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在召唤着他，引导他成为先知，真主降示他《可兰经》。由于麦加是一座依靠阿拉伯宗教而繁荣的城市，麦加人排斥宣扬新教义的穆罕默德。于是，他便逃往麦地那，并在那里发展了伊斯兰教，使伊斯兰教的势力不断壮大。到公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时，伊斯兰教已经主宰了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信仰。一个世纪以后，穆罕默德的追随者又征服

了整个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叙利亚、埃及、非洲北海岸诸国及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伊斯兰教徒的义务包括：经常祈祷、施舍和戒酒。

伊斯兰教禁酒也可能是文化力量碰撞的结果。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王权从地中海人的手里转到了阿拉伯沙漠部落。为了显示自己比其他人优越，这些沙漠人用骆驼取代了四轮马车，用靠垫取代了桌子和椅子，他们制定葡萄酒禁例，拒绝接受传统的西方文明定义。葡萄酒在基督教信仰中的重要角色也使它注定成为伊斯兰教的禁物。甚至在配药时，葡萄酒也是不能碰的。经过几番讨论，伊斯兰教决定将禁令的范围扩大到所有酒精饮品。于是，伊斯兰教传到哪里，禁酒令就跟到哪里。

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严格执行了禁酒令，有些地方对于饮酒的管束并不是那么严格。在阿布·努瓦斯及其他一些阿拉伯诗人的诗作中都曾出现过人们欢畅饮酒的场面；而且尽管当时酿酒是违法的，但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依然有人生产葡萄酒。

公元732年，发生在法国中部的图尔斯战役终止了伊斯兰教进军欧洲的步伐。当时，阿拉伯

人被法兰克王国最具威信和英雄魅力的王子查尔斯·马特尔打败了。这场战役是世界历史的一大转折点，也是阿拉伯人在欧洲释放影响力的一个高峰。公元800年，马特尔的孙子查理曼被加冕为古罗马皇帝。欧洲文化复兴大融合的时代由此开始。

饮品之尊

著名学者阿尔昆是查尔斯曼的顾问。公元9世纪初，他在访问英格兰期间给一位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中慨叹道：“我真不幸啊！……我们酒囊中的葡萄酒已经喝完了，苦涩的啤酒在腹中泛滥。我们没有葡萄酒了，所以请代我喝个痛快吧，高兴地度过每一天。”阿尔昆的抱怨说明葡萄酒在英国很稀缺。当时，葡萄酒在北欧的其他国家也都是稀罕物。在这些不能生产只能进口葡萄酒的地方，啤酒和蜂蜜酒成了人们的主饮。北欧人喝啤酒，南欧人喝葡萄酒。这种差异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公元500年前后，历经了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陶冶之后，欧洲的饮酒格局基本固定下来。

在欧洲南部，昔日古罗马帝国的疆土之内，

人们至今还保持着用餐时适量饮用葡萄酒的风俗。在欧洲北部，昔日古罗马帝国疆界之外的地区，喝啤酒的风俗依然广为流传，而且他们常常单喝酒，无须下酒菜。今天，世界上主要的葡萄酒生产国是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而主要的葡萄酒消费群也在法国、意大利及卢森堡，这些地区平均每人每年大约能喝掉55升葡萄酒。相对而言，消费啤酒最多的地区正是那些昔日被古罗马人视作野蛮的国家：德国、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捷克共和国、不列颠及爱尔兰。

古希腊和古罗马对于葡萄酒的态度是建立在早期的近东传统的基础上的。他们的这种态度也保存了下来并且传遍世界各地。不论人们饮用何种酒，葡萄酒总是他们心目中最具文化内涵和文明意义的饮品。在一些国家里，登得国宴及政治峰会的大雅之堂的饮品是葡萄酒而非啤酒。这表明葡萄酒依然代表着权力、地位和财富。葡萄酒让我们领略到了风雅的极致，也让我们了解了古罗马社会的阶级分化状况。鉴赏各地葡萄酒的风俗始于希腊，将葡萄酒的种类与人们的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的风俗始于古希腊，盛于古罗马。在现代都市的郊外，一场宴会再现了古希腊交际酒会和古罗马盛筵的场景：与会者正就某一个话题热烈讨论——政治、经济、事业发展、房价等等——而葡萄酒则为讨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交际酒

会的气氛略显正式，吃什么食物、场地如何布置等等，都有各自的讲究。喝哪种葡萄酒由主持人来决定，被选中的葡萄酒既要体现会议的重要性，又要符合宾客及主人的身份。如果古罗马人穿越时光隧道，看到了这样的画面，一定会一眼认出这个场景。

[1] 1英尺=0.3048米。——编者注

[2] 塞维鲁（145~211），出生于罗马帝国阿非利加行省大莱普提斯，死于不列颠。罗马帝国皇帝，塞维鲁王朝开创者，公元193年4月14日成为罗马皇帝，在位至公元211年逝世。——编者注

[3] 1英里约等于1.6千米。——编者注

[4] 胡芦巴，豆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全株有香气，花期4~6月，果斯7~8月。——编者注

[5] 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罗马帝国王贤帝时代的最后一个皇帝，161年至180年在位。有以希腊文写成的著作《沉思录》传世。——编者注

[6] 圣本笃会是天文教的一个隐修会，是在529年由意大利人圣本笃在意大利中部卡西洛山所创，遵循中世幻初流行于意大利和高卢的隐修活动。——编者注

[7] 品脱，容量单位，1英制品脱=0.568升。——编者注

殖民时期的烈酒

Spirits in the Colonial Period

烈酒与远航

人们用水槽对葡萄酒进行蒸馏，能得到一种玫瑰色的液体。

——《关于香水和蒸馏法的化学书》，
阿布·尤瑟夫·铿迪，阿拉伯科学家、哲学家
（约801~873年）

阿拉伯人的礼物

在公元第一个千年之初，西欧最伟大且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不是罗马、拜占庭或伦敦，而是位于今天西班牙南部的科尔多瓦（当时是阿拉伯人统治的安达鲁西亚国的首府）。那里有美丽的公园、豪华的宫殿、宽阔的道路、油灯照耀的明亮大街，还有700座清真寺、300家公共浴室以及覆盖全市的地下排水系统。或许在一切成就中最让人称道的是它的公共图书馆，该馆建于公元970年，馆内藏书近50万册，当时欧洲其他国家的图书馆无一能与之相提并论。这座图书馆尽管是最大的，却也只是全城70座图书馆中的一个而已。

科尔多瓦曾是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中心之一。当时的阿拉伯世界幅员辽阔，其鼎盛时期的疆土从法国一直延伸到中亚帕尔米山脉，并远至印度湾。在大部分欧洲国家遗失了希腊文化之时，身在科尔多瓦、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的阿拉伯学者们建立起了一个源于希腊、印度、波斯文明的知识体系。在前人的基础上，他们在天文、数学、医药、哲学等方面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他们发展了星盘、代数和现代的数字系统，并开创性地使用草药作为麻醉剂。他们在指南针（从中国引进）和航海地图的基础上设计了新的航海技术。在众多的成就中，有一样尤其值得一提，那就是他们改进并推广了一项后来用于酿酒的技术——蒸馏。

蒸馏这项技术自古就有，它通过对液体进行汽化再冷凝，从而分离和净化出液体中的内含成分。简单的蒸馏设备早在公元前4000年就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出现了。根据后来的楔形文字记载，该装置最初是用来生产香水的。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对这种技术也不陌生，亚里士多德就曾提到：煮沸的盐水冷凝后就不再有咸味了。然而，该技术还是到了后来（源于阿拉伯世界）才广泛应用于制酒。对此，8世纪的阿拉伯学者哈扬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被后人视为化学奠基人之一。他对蒸馏装置进行了改进，并和其他的阿

拉伯炼金术士一起对酒以及其他物质进行蒸馏以备实验之用。

葡萄酒经蒸馏后其酒精含量更高，因为酒精的沸点是 78°C ，比水的沸点 100°C 更低。如果对葡萄酒进行加热，酒精会在沸腾之前就开始逐渐蒸发。由于酒精的沸点低，这些气体里所含的酒精比例就大于水分。把这些富含酒精的气体抽出并冷凝后，就会产生一种比葡萄酒酒精含量高得多的饮料。然而，由于水分和杂质在 100°C 以下也会蒸发，所以经蒸馏得到的还不是纯酒精，但是，人们可以通过反复蒸馏来不断地增加酒精含量（这种方法也称为精馏）。

蒸馏技术是阿拉伯人继承和发扬先人智慧的体现，他们还把这些先人的智慧传到了拉丁世界，重新激起西欧人研究的精神。*alembic*这个词表示一种蒸馏器具，它体现了阿拉伯文明与古文明的结合。该词是从阿拉伯语*al-ambiq*中演变过来的，又借鉴了希腊语中的*ambix*一词（意为蒸馏用的特殊容器）。同样，现代词汇*alcohol*（酒精，酒）一词就体现了蒸馏酒深厚的阿拉伯渊源。该词是从*al-koh'l*（一种纯锑粉）一词中演变过来的。*al-koh'l*是一种用于装饰眼皮的化妆品，通常被炼金术士们用作指一些高度纯净的物质，包括液体。因此，经蒸馏后的葡萄酒后来在英语

中被称为“葡萄酒烈酒”。

自从炼丹房出现之后，这种经蒸馏而得的新饮品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并最终在探险时代取得了饮品的主宰地位。随着欧洲海上探险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殖民地和帝国，蒸馏为航行提供了烈酒，并且还有很多其他用途。这些饮品成为相当重要的经济物品，以至于对它的税收和控制成了政治上的大事，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历史进程。生活节俭的阿拉伯人并不把它当作日常饮品，而是当成一种炼金物质或是药物来使用。只有当蒸馏技术传播到信仰基督教的欧洲时，蒸馏酒才被广泛饮用。



实验室里的蒸馏设备。烈酒的酿造过程一开始是一种仅为少数人掌握的炼丹术。

神奇的疗效

138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纳瓦尔王国查理二世的病榻前围满了御医。查理二世是地处今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小王国的统治者，他有个外号叫“恶棍查理”，因为在他统治的早期，他异常残忍地镇压了一次叛乱。他最热衷的事情就是对他的岳父（法国国王）耍阴谋诡计。在一夜放荡的生活后，他患上了高烧和麻痹症。御医们决定给他开一副据说有神奇疗效的药物，而且药物的配制经历了一个近乎神秘的过程——蒸馏。

第一个尝试这种新过程的欧洲人是12世纪的意大利炼丹士迈克尔·塞勒纳斯。他是从阿拉伯语课文中学到这项技术的，他写道：一份高浓度的纯葡萄酒兑三份盐，置于普通容器中进行蒸馏然后会产生一种遇火则燃的液体。很明显，这种技术在当时仅为少数几个人知道，因为他句子中的几个关键词，比如葡萄酒、盐，都是用密码代替的。由于蒸馏酒可以燃烧，因此也被称作“aqua ardens”，意为“燃烧的水”。

当然，燃烧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当喝下蒸馏酒后，喉咙里会有一种灼热感。然而那些试着喝过少量“燃烧的水”的人发现，刚喝下这种被告之是草药的东西时会有种不舒服的感觉，但随之而来的是浑身的舒畅。一直以来，葡萄酒都被广泛地当作药物使用，因此，人们自然认为高浓度的纯葡萄酒应当会有更好的疗效。到13世纪末，随着大学和医学院在欧洲大地上的繁荣兴旺，许多拉丁医学论文都把蒸馏酒称作“一种新的神奇药物”，“aqua vitae”（烈性酒、白兰地）或是“生命之水”。

阿纳尔德是蒸馏酒医疗效果的坚定信念者，他是法国蒙彼利埃（法国南部城市）医学院的教授。大约在1300年左右，他做出了对葡萄酒的蒸馏说明。他写道：在经过三四次的反复蒸馏后，我们终于看到珍贵的“生命之水”滴滴而至，“生命之水”的每一滴中都包含了葡萄酒的精华。“生命之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称号，因为它的确是不朽之水，能延年益寿，让你青春永驻。

从某种意义上讲，“生命之水”确实是非常神奇的。因为蒸馏酒比任何自然发酵而成的酒所含的酒精浓度都要高。即使是最厉害的酵母也不能酿出酒精含量超过15%的酒，因此，“15度”就成为发酵酒精饮品的临界值。然而，蒸馏使得炼丹

士超越了这个维持了千万年的界限。阿纳尔德的学生雷蒙德·罗利宣称，“生命之水”是人类的一个新发现。古人之所以不知道这种饮品是因为那时的人类还不像现代人那样意志消沉，因此也就不需要用酒精来激发斗志。这两个人都活过了70岁，这个岁数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由此或许可以再次证明“生命之水”延年益寿的功效。

这种神奇的新药既可以内服也可以外敷，“生命之水”的推崇者们相信它还有助于美容养颜，改善记忆力，治疗大脑、神经和关节疾病；可以激活心脏，减轻牙疼，治疗失明、言语缺陷和瘫痪，甚至还可以防止瘟疫，总之，它被看作是一种万能药，这也就是“恶棍查理”的御医们决定用它来给国王治病的原因。借着烛光，他们把皇帝用一床浸透了“生命之水”的床单裹起来，希望能通过这种神奇的液体来治愈他的麻痹症。但是治疗意外地变成了一场灾难：一个马虎的佣人不小心打掉了手上的蜡烛并烧着了床单，于是国王立即被火焰吞没了。据说，他的臣民们都认为他的悲惨结局是上帝的裁决，因为他生前过于胡作非为，就在他死前不久，还下命令要加重赋税。

到了15世纪，随着蒸馏术的传播，“生命之水”开始从药水变成了酒。这一转变得益于约翰

内斯·古腾堡在15世纪30年代完成的一项新发明——现代印刷术（尽管活字印刷术在数世纪以前就已经在中国出现了，但它对于欧洲人而言还是一件新事物）。印刷术在欧洲出现以后，奥地利医生迈克·帕夫·冯·施里克编写了第一本关于蒸馏术的书，该书于1478年在奥格斯堡出版并受到了极大欢迎，到1500年，该书已经印刷了14次。施里克在书中宣称：每天早上喝半勺“生命之水”可以预防病痛，如果让垂死的人喝一点，他就有力气再说几句话。

但对于很多人而言，烈酒的魅力不在于它的药用功能，而在于它能让人轻易醉倒。蒸馏饮品在寒冷的北欧尤为受人欢迎，因为那里的葡萄酒既少又贵。掌握了蒸馏技术以后，他们就可以通过对用当地的原料酿造的啤酒进行蒸馏以获得烈性酒。在凯尔特语中，“生命之水”被称为“uisge beatha”，该词后来就演变成现代词汇“whiskey”（威士忌）。这种新的饮料很快就成为爱尔兰人生活的一部分。据一位历史学家记载：1405年，一位爱尔兰部落首领之子理查德·麦克雷奈尔因过量饮用“生命之水”而导致死亡，作者写道，“可怜的理查德喝得太多了，终于让‘生命之水’变成了‘死亡之水’”。

在欧洲其他地方，“生命之水”被称为“烧

酒”，译成德语是“**branntwein**”，译成英语是“白兰地酒”或“白兰地”。随着蒸馏术的不断普及，人们开始在自家酿造蒸馏酒，并在节日里进行销售。很快这一做法变得非常普遍，却也引发了不少问题。于是在1496年，德国纽伦堡市明确禁止酿造和出售蒸馏酒。当地的一位医生也指出，“鉴于如今大家都养成了喝烈酒的习惯，我觉得有必要提醒大家控制好自已的酒量；假如大家想保持自己谦谦君子形象的话，饮酒时请量力而行”。

烈酒、蔗糖和奴隶

蒸馏饮品的出现正值欧洲探险家为开辟世界海洋线路而各显神通之时，他们绕过了非洲最南端并到达了东方，向西横跨大西洋并首次与新世界建立了联系。葡萄牙人是这次航海热潮的发动者，他们的探险家到达了非洲西海岸，发现并殖民占领了附近的大西洋岛屿，这也为发现美洲大陆奠定了基础。上述航海活动都是由葡萄牙亨利王子（又称航海者亨利）出资组织的。尽管亨利被称为“航海者”，但他一生中只出航过3次，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葡萄牙国内，而这3次航行都是执行军事任务，最远仅至北非。在这3次远征中，他都担任了舰队的统帅。第一次他就向人

们证明了自己是一个相当杰出的统帅；第二次行动失败；第三次他又领导舰队出色地完成任务。此外，在萨格里什的基地中，他还策划了野心勃勃的葡萄牙航海探险计划。亨利王子出资组织了多次远航并对每次航行的报告、发现、绘制的地图进行了比较。同时，他还鼓励船长们利用先进的航海技术，比如指南针、三角法和星盘等。指南针和蒸馏一样，都是由阿拉伯人带到欧洲的。当时，葡萄牙、西班牙及其他探险者远航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能找到另一条通往印度的航道以打破阿拉伯在香料贸易上的垄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最终的成功部分得益于阿拉伯人所提供的技术。

后来探险者们发现：马德拉岛、亚述尔群岛和加那利群岛等大西洋岛屿是生产蔗糖的理想地方（蔗糖的生产也源于阿拉伯），但种植甘蔗需要大量的水和劳动力。阿拉伯人在西侵的时候掌握了灌溉技术并学会了制作省力设备用于加工甘蔗，其中包括水螺旋和水力磨坊，前者是波斯人发明的引水设施。即便这样，阿拉伯人生产蔗糖主要还是依靠从东非贩卖过来的奴隶。欧洲人在十字军东征时掠去了阿拉伯人不少的蔗糖种植园，但他们缺乏种植蔗糖的经验和生产蔗糖的劳力（后者尤为缺乏）。于是，在15世纪40年代，葡萄牙开始从他们在非洲西海岸的贸易港口贩运

黑奴。最初，他们通过绑架来保证“货源”。但很快，他们便与非洲贸易者达成共识，即以欧洲商品交换黑奴。

基督教的教义禁止基督徒相互奴役。部分由于这个原因，自罗马时代以来，欧洲很长时间内没有大规模的奴隶交易。后来，为摆脱宗教的干涉，欧洲人绞尽脑汁寻找各种借口。他们宣称买卖奴隶是为了把他们从“错误”的伊斯兰教中拯救出来并帮助他们皈依基督。接着又有一些神学者推出了另一种说法，他们认为非洲黑人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因此可以被奴役。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非洲黑人是“汗”（ham）的子孙，因此对他们的奴役是得到《圣经》支持的。这种阴险的理论一开始并不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然而，大西洋岛屿远离欧洲大陆，因此在那里使用奴隶的确很容易掩人耳目。到了1500年，马德拉岛靠着几个磨坊和2 000个奴隶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蔗糖出口地。

1492年，欧洲的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此后使用奴隶进行蔗糖生产的方法得到了普遍的推广。哥伦布的本意是为欧洲寻找一条向西通往印度的航道，结果他发现了加勒比海海域的诸岛屿。虽然这里没有黄金、香料以及丝绸让他带回去献给资助他的西班牙王室，但根据他对蔗糖生

产的丰富经验，他很有把握地宣称这些地方非常适合种植甘蔗。1493年，他第二次前往新大陆，并带回了加那利群岛上的甘蔗。此后，加勒比海岛屿上的西班牙领地和处于葡萄牙统治下的南美大陆（即现在的巴西）迅速推广甘蔗种植。一开始，殖民者企图奴役当地的民众进行种植，但由于当地居民大量死于传染自欧洲的疾病，因此他们只好从非洲进口奴隶。在前后400年左右的时间里，大概有1 100万奴隶从非洲运往新大陆，这个数字远远没有体现出奴隶贸易的真实规模，因为有近一半在非洲内陆被捕的奴隶死于运往港口的途中。蒸馏饮品在这些罪恶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17世纪，当英国、法国和荷兰在加勒比海地区建立了甘蔗种植园时，更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

非洲的奴隶贩子们用奴隶与欧洲人交换丝织品、贝壳、金属碗杯及铜板，但最受欢迎的还是高浓度的酒精饮品。不同地区的非洲人早在很久以前就开始饮用酒精饮品，包括棕榈酒、蜂蜜酒及各种啤酒。但借用当时一位贸易者的话说，非洲各地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都非常喜欢从欧洲引进的烈酒。奴隶贸易早期，葡萄牙占据了贸易的主导地位。因此非洲奴隶贩子们习惯了喝葡萄牙的高浓度烈酒。1510年，葡萄牙旅行者瓦伦蒂·弗尔南德斯把塞内加尔地区的沃洛夫人描写

成“从我们的酒中获取快乐的醉鬼”。

葡萄酒是一种合适的货币形式，然而欧洲的奴隶贸易者很快就意识到白兰地比葡萄酒更加合适，因为白兰地的酒精浓度高于葡萄酒，所以装运白兰地可以让有限的船舱装运更多的酒精。另外，由于酒精还可以起到防腐剂的作用，所以白兰地在运输过程中就不会像葡萄酒那样容易变质。非洲人之所以钟爱蒸馏酒是因为蒸馏酒比他们自己用谷物酿造的啤酒和棕榈酒更纯更“辣”，于是饮用进口烈酒就成了奴隶贩子们显示身份的标志。一般来说，在与奴隶贩子们进行交换时，他们认为用丝织品包装的商品最为珍贵，而烈酒特别是白兰地最能显示身份地位。

很快，欧洲人就习惯了在与非洲奴隶贩子进行交易之前先送给他们许多被称之为“dashee”和“bizey”的烈酒。为了顺利进行贸易，欧洲人和非洲人用一种由葡萄牙语演变过来的混杂语进行交流，法国的一位贸易者对这种语言进行了转录，比如“qua qua”表示亚麻制品；“singome miombo”意为“给我一些烈酒”。约翰·阿特金斯是一位英国海军军医，他记载了奴隶贸易的历史。根据他的记载，非洲的奴隶贩子“从来不会干着嘴唇谈生意”。荷兰奴隶贩子威廉·博斯曼介绍经验时说，奴隶船的船长每天都要给当地的首

领和重要的奴隶贩子送一些白兰地。他还曾告诫道，如果不首先送足够的“dashee”酒给维达的非洲人，他们是不会和你做生意的。“想在这里做生意的人，就必须先让当地的人高兴”，他这样写道。

白兰地还从其他方面推动了奴隶贸易的进程。据资料记载，欧洲人需要雇用船工把货品来回运送，他们每天付给船工们一瓶白兰地作为预付报酬，如果有工作就再多给2~4瓶。每逢星期天还会多给1瓶作为奖赏。同样，那些把关押在岸上的奴隶护送出港口的卫兵们的酬劳也是用白兰地来支付的。后来，人们又利用蔗糖加工过程中的废料制出了一种新的酒精饮品，这就是朗姆酒。正是这种朗姆酒的出现，烈酒、蔗糖和奴隶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第一种全球性饮品

1647年9月的一天，名叫理查德·利根的英国人在“阿卡贝利斯”号船的甲板上第一次看见了加勒比海的巴巴多斯岛。他在航海日志中写道，“我们看到了这个令人神往的岛屿，越靠近它我们就越能感受到它的美丽”。然而，当利根

和他的同伴们登陆时，他们发现事实与看到的并不一样，那里正闹瘟疫，这使得利根他们改变了原来只待几天的计划。他们在那里足足待了3年，在那3年中，利根对岛屿上的动植物、民俗和蔗糖种植园的工作进行了详细的记录。

1627年，第一批英国人抵达巴巴多斯岛，他们发现那里已经荒无人烟。定居下来以后，他们开始种植烟草，因为烟草种植在当时的英国很普遍，而且北美新殖民地弗吉尼亚的农民们也证明了烟草种植收益颇丰。但是后来，利根发现巴巴多斯岛的烟草“是全世界种得最差的烟草”。于是他们放弃了烟草种植，转而从巴西买进甘蔗、相关设备并引进技术，准备进行蔗糖生产。利根待在岛上的那几年，甘蔗成了全岛最重要的作物。另外，由于制糖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奴隶的劳动，所以岛上就有了很多的奴隶。事实让利根明白了什么叫利用宗教来维护奴隶制的逻辑。有一次，当利根向一个黑奴说明指南针的原理和功用时，这个黑奴向利根表达了皈依基督教的愿望，原因是“他认为只要成为基督教徒他就能具有一切他想知道的知识”。利根向这个奴隶的主人转达这一愿望，但奴隶主告诉他奴隶是不能皈依基督教的，“因为根据英格兰的法律，我们是不能奴役基督徒的”。所以如果要想让一个奴隶皈依基督教就首先得给他自由，但要想让岛上的奴隶获得

自由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因为这样会让收益丰厚的蔗糖业陷于瘫痪。此后10年，巴巴多斯的蔗糖贸易独占鳌头，从而使岛上的糖业生产商们跻身于新世界最富裕的人群之列。

巴巴多斯岛上的种植园主不仅从巴西得到了甘蔗和设备，还学到了如何对制糖过程中的副产品进行发酵、蒸馏，从而制出高浓度的酒精饮品。葡萄牙人称这种饮品为甘蔗白兰地，它是由甘蔗汁煮沸时溢出的泡沫制成的，也可以直接用甘蔗汁酿制。这一工艺在巴巴多斯岛上得到进一步改进，因为岛上的人能够利用糖蜜（提炼蔗糖时产生的黑色浓糖浆）来酿制甘蔗白兰地。此举大大降低了白兰地的成本，同时也不会影响蔗糖的产出。这样一来，巴巴多斯的种植园主就能够既产糖又酿酒了。据利根的记载，这种蔗糖酒“叫作‘驱魔酒’，它劲头很足，但味道不怎么好，人们往往喜欢大量饮用甚至过量饮用，以至于经常有人醉倒在地”。进口的葡萄酒和啤酒价格昂贵，而且在从欧洲运往岛上的过程中很容易变质，但“驱魔酒”在当地就能大量生产，所以当地人逐渐离不开它了。利根所说的“驱魔酒”还出售给当地的种植园主。虽然他们自己不酿制，但因为价格便宜，他们也喜欢大量饮用这种酒。“驱魔酒”也卖给过往船只，并运往国外，这让喜欢它的船员们一路上过足了酒瘾。

“驱魔酒”这个名字是在利根离开小岛后取的。1651年，一位到巴巴多斯岛来的旅行者发现当地人最钟爱的酒叫作“朗姆酒”（驱魔酒的别名），这种酒是经过对甘蔗汁进行蒸馏而成的，含有高浓度的酒精。“朗姆”一词源于英格兰南部的俚语，意思是“争吵和骚乱”。之所以为它选了这个名字是因为当人们过量饮用后往往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朗姆酒原来叫作“Rumbullion”后来简称为“rum”。它很快就被引进到加勒比海的周围地区，接着又打入加勒比海以外的市场。对于新到的奴隶，奴隶主往往会给他们喝些朗姆酒以检查奴隶的身体状况或以此约束桀骜不驯的奴隶。他们还让奴隶们对朗姆酒产生依赖性，这样一方面有利于他们发号施令，另一方面也能帮助奴隶们驱走疲劳。朗姆酒还被用作奖赏，当奴隶们逮到老鼠或者完成了比较辛苦的工作后，他们往往会额外得到一些朗姆酒作为奖赏。据一些关于种植园方面的书记载，“一般而言，奴隶们每年能得到2~3加仑^[1]的朗姆酒（有时可达到13加仑），这些酒他们可以自己喝，也可以用来交换食物”。由此，朗姆酒就成为管理社会事务的重要工具。据利根记载，朗姆酒还可以用作药物。当

奴隶们感到不舒服时，医生只要给他们每人一杯朗姆酒就可立即见效，酒到病除。

朗姆酒也很受水手们的欢迎，1655年以后，加勒比海上的英国皇家海军舰队就用朗姆酒代替啤酒作为兵士的日常配额。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朗姆酒成为海军将士远航的首选饮品。兵士们原来每人可带1加仑啤酒，现在改成半品脱的朗姆酒。这样做对海军的纪律和工作效率带来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于是，舰队司令爱德华·弗农发布了一条命令：兵士们的半品脱朗姆酒必须兑上两品脱的水。朗姆酒的稀释对酒的消费没有多大影响，但这样做让士兵们把原本淡而无味的水喝得津津有味。更重要的是，弗农想到了把糖和酸橙汁加入稀释后的朗姆酒以增添口感，因此就发明了最初的鸡尾酒。这种酒以他的名字命名。弗农有个绰号叫“old grogram”（一种丝或丝毛交织的粗松斜纹布），因为他总是穿一件用这种布料制成的防水斗篷。因此他发明的这种新饮料就叫作“grog”（掺水的烈酒）。

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加水后的朗姆酒酒劲比先前相差甚远。另外，看到朗姆酒兑了水以后，水手们都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19世纪之前，人们还没有发明液体比重计，所以要精确地测出酒精浓度是很困难的。负责士兵们朗姆酒配

额的海军军需官利用皇家兵器厂发明的“拇指规则”来事先测出没有稀释的朗姆酒的度数。他们用朗姆酒和一些火药粉及少许水混合，然后用一个放大镜聚拢阳光用以加热，如果火药粉没有燃烧，则表示混合物酒精度数不够，因此需要再增加一点朗姆酒。只有当火药粉恰好达到着火点并燃烧时，混合物的酒精度数（48度）才是最恰当的。如果混合物的酒精度数过高的话，就会发生爆炸。当军需官不在的时候，水手们也可以自己进行调制。

用掺水烈酒代替啤酒对英国在海上建立霸权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当时很多水手死于坏血病，今天我们知道这种病的病因是缺乏维生素C，患者会不断消瘦直到死亡。18世纪，人们发现柠檬和酸橙汁能很好地预防坏血病。1795年，军方规定掺水烈酒中必须加入柠檬和酸橙汁，此举大大减少了坏血病的发病率。啤酒不含维生素C，用掺水烈酒代替以后，英国皇家海军整体上比以前更加健康。法国海军也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的配额不是啤酒而是3/4升葡萄酒（相当于现代的一瓶）。在长途远航中，配额就由3/16升白兰地酒代替。葡萄酒内含少量维生素C而白兰地酒则根本不含维生素C，结果法国海军降低了对坏血病的抵抗力。一名英国海军军医认为，正是因为有效地预防了坏血病，英国皇家海军才

能屡建战功，并于1805年在特拉法尔加角彻底击败法国和西班牙舰队（英国水兵也由此被称作“limeys”。该词派生自“lime”，即酸橙汁，因为水手在航海时必须坚持喝酸橙汁，以补充维生素C，预防坏血病）。

以上所说的事情都是发生在朗姆酒发明之后。朗姆酒最初被用作货币，从而结束了烈酒、奴隶和蔗糖之间的物物交换。人们用朗姆酒购买奴隶，又用奴隶来生产蔗糖，糖蜜又可以用来酿造朗姆酒以买进更多的奴隶，如此循环反复以至无穷。1679年，当法国旅行家让·伯特在非洲西海岸旅行时，他发现“事情与以往大大不一样了，我以前出国时总要带上大量的法国白兰地，现在人们不像以前那样对白兰地情有独钟了，他们转而喜欢朗姆酒和一些其他烈酒了”。1721年，一位英国贸易商报道说，在非洲的奴隶海岸，朗姆酒变成了“最主要的贸易品”，甚至可以交换黄金。朗姆酒替代了白兰地作为船员和士兵的工资。白兰地有助于蔗糖和奴隶的跨大西洋贸易；而朗姆酒则促成了这两者的产销一条龙，从而使所获利润更加丰厚。

啤酒通常是自产自销，葡萄酒也只能在特定的地方产销。朗姆酒与它们不一样，它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人力、物力及技术共同协作的成果，也

是几种具有历史推动作用的物质的共同结晶。蔗糖源自玻利尼西亚，由阿拉伯人带到欧洲，再由哥伦布带到美洲利用非洲奴隶进行种植生产。从糖蜜中可以蒸馏出朗姆酒，这种酒既给新大陆的欧洲殖民者们饮用又给奴隶们饮用。它的出现归功于开拓时代的巧取豪夺，也归功于欧洲人血腥的奴隶贸易。朗姆酒既体现了第一个全球化时代中的人类成就，也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

[1] 容量单位，1加仑（美）=3.785 412升。——编者注

帮助美国建国的饮品

新英格兰用法属岛屿上生产出的廉价糖蜜制造朗姆酒，这是它财富的主要来源——新英格兰为马里兰州和卡罗来纳州购买奴隶时是用朗姆酒来支付英国商人的。

——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1856~1924)

美国人最爱的饮品

16世纪末，英国打算在北美洲建立殖民地，然而这一切本是由一个错误的判断而起。当时英国人占领的殖民地是位于北纬34度到38度之间的弗吉尼亚（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终生未嫁的伊丽莎白一世）。由于这一地区与欧洲地中海地区处于同一纬度，很多人都误以为这两个地区的气候很相似。因此，英国认为美洲殖民地一旦建立起来，就能够提供橄榄油、水果等地中海的特产，从而减轻英国对欧洲大陆进口物资的依赖。当时人们估计美洲殖民地可以提供如下产品：“法国和西班牙的葡萄酒、水果和盐，波斯和意大利的

丝绸”，还有大量的木材。这样一来，英国就可以摆脱从斯堪的纳维亚进口木材的状况。殖民者和其英国国内的支持者们还希望能找到金属、矿藏和珠宝。总之，英国人希望美国是个应有尽有的聚宝盆，能即刻为他们带来利润。

然而事实不像想象中那么好。北美的气候远比想象的要恶劣，根本不适于地中海植物及甘蔗、香蕉等其他英国需进口的农产品的生长。他们在这里也没找到任何金属、矿藏和珠宝，就连生产丝织品的努力也遭遇失败。1607年，英国人在北美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性殖民地，此后几十年中，生活在那里的殖民者遇到了诸多始料不及的困难。他们忍受着食物的匮乏和疾病。同时，由于侵占了当地人的土地，他们还和土生土长的印第安人发生冲突，陷入了长期的战争。

在这样的困境下，保证可靠的烈酒供应显得尤为重要。1607年，共有三艘船运送第一批永久移民来到弗吉尼亚，其中的两艘卸载后返回英国。新殖民地詹姆斯镇的居民托马斯·斯塔利抱怨道：“这儿没有酒馆，没有啤酒屋，甚至连一个散心的地方都没有。”那年冬天，英国派出第一艘供给船给他们送去了一些啤酒，尽管船员们在途中已经把啤酒喝掉了大半。后来运去的啤酒通常不是不符合标准，就是在途中变了质。1613

年，一位西班牙的观察员报告说，那里的300名定居者除了水没别的东西可喝，“这样的生活完全背离了英国人的天性，所有人都希望回去，如果他们可以自由选择的话，他们也许早就回去了”。到了1620年，情况还是没有改观，而定居者的人数却增至3 000。另一位观察员注意到，“他们最大的抱怨就是没有好的饮料”——言下之意就是不想光喝水。

同年，啤酒供应的短缺状况成为英国选择建立第二个殖民地地点的决定性因素。这个殖民地是由清教徒建立的。1620年，“五月花号”从英国出发，朝哈德逊河进发。但后来，他们却在偏北部的科德角上岸。恶劣的天气让他们不能继续向南航行，因此船长只好让所有人都下船上岸。威廉·布拉德福德是清教领袖（后来成为该殖民地的州长），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没有时间多考虑，因为我们的食物所剩无几，尤其是啤酒，马上就要见底了”。水手们想方设法为返程准备足够的啤酒，因为他们相信，在海中航行必须要喝啤酒才能预防坏血病。后来，啤酒喝完了，清教徒们不得不和弗吉尼亚的殖民定居者一样只喝清水了。一位叫威廉·伍德的定居者说：“这儿有世界上最好的水，但如果有好啤酒放在我面前的话，我肯定会像其他人一样选择啤酒；但是如果啤酒不好的话，我相信所有的人还是都会选择喝

水。”当第三个英国殖民地在马萨诸塞州建立时，前往该州的定居者带足了啤酒。1628年，“阿尔培拉”号船载着大批供应品开往马萨诸塞州，其中包括42吨啤酒，清教殖民者的著名领袖约翰·温思罗普也随船同行。

由于气候恶劣，用于酿造啤酒的欧洲谷物很难在这些殖民地生长。为了摆脱对英国进口啤酒的依赖，定居者们试着用玉米、云杉嫩尖梢、枫树汁、南瓜、苹果皮等材料酿制啤酒。当时的一首歌充分体现了他们酿酒材料的多样性：“哦，我们用南瓜、防风草和胡桃屑酿造出甘甜的美酒，滋润我们的嘴唇。”看到远在南方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者喝的是葡萄酒，他们也试着开始引进欧洲的葡萄。但由于气候恶劣，恶疾肆虐，加上他们大多来自北欧，缺乏葡萄酒酿造经验，最终未取得成功。后来，他们又试图用本地葡萄酿酒，但酿出的酒根本无法入口。最终，弗吉尼亚的殖民者决定放弃酿酒，专心发展烟草种植业，并从欧洲进口发芽大麦（专门用于酿制啤酒）、葡萄酒和白兰地等物资。

17世纪下半叶，朗姆酒的传入改变了美洲殖民地的生活状况。朗姆酒比白兰地便宜得多，因为它的原料不再是昂贵的葡萄酒而是生产蔗糖所剩余的糖蜜，加上朗姆酒可以在美洲本地酿造，

不必船运穿过大西洋，所以又省去了昂贵的运费。朗姆酒不仅比白兰地便宜，而且其度数更高，因此它很快就成为北美殖民者最喜爱的饮品。它能缓解劳累、舒筋活血，是人们在寒冷冬天里的液态小暖气，还减少了殖民者对欧洲进口饮品的依赖。穷人们只喝单纯的朗姆酒，富人也饮朗姆酒，只不过他们的酒里要加上蔗糖、水、柠檬汁和香料并用一个精雕细琢的碗来盛装，他们喝的这种朗姆酒叫潘趣酒（这种酒有点像英国海军喝的掺水烈酒，它们都是现代鸡尾酒的前身）。

殖民者们在签订合同、出售农场、购买商品或打赢官司时都要喝朗姆酒。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任何人在协议签订之前要想退出的话，必须交出半桶啤酒或1加仑朗姆酒作为赔偿。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种便宜且酒精度高的饮品。1686年，波士顿的牧师英克里斯·马瑟就曾抱怨说，“最近几年，我们中的很多人开始喜欢一种名叫朗姆酒的饮料，这真是一件不太让人愉快的事，因为无论是穷人还是恶棍都可以只花一两个便士就喝得烂醉如泥”。

到17世纪下半叶，朗姆酒已经为美国工业的繁荣打下了基础，因为新英格兰的商人（主要是在塞伦、纽波特、梅德福德和波士顿）不再直接

进口朗姆酒，而是进口糖蜜自己进行蒸馏。他们酿出的朗姆酒虽没有西印度群岛所产的酒质量高，但价格却更低廉，这一点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很有吸引力。因此，朗姆酒成了新英格兰利润最丰厚的商品。用那时一位观察家的话说，“波士顿人从进口的糖蜜中‘蒸馏’出大量的朗姆酒，它的数量之多，价格之便宜，的确让人惊奇（每加仑的价格不到两先令）；而它的知名度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因其产量大、价格低，而非质量好”。朗姆酒的价格在有的地方甚至低到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可以买够一个星期的饮用量。

朗姆酒与革命

新英格兰酿制蒸馏酒的人发现，朗姆酒不仅可以卖给当地人，在奴隶贩子中也有很大的市场。对他们而言，如果要用酒充当货币来交换非洲西海岸的奴隶，那么朗姆酒是他们的首选。纽波特的酿酒者还专门为奴隶交易酿造了一种度数更高的朗姆酒。由于其酒精浓度更高，人们将之视作一种浓缩的财富。然而，蒸蒸日上的朗姆酒酿造业并没有为英属岛屿上的蔗糖生产者及其在伦敦的资助者带来什么好处。这是因为新英格兰的糖蜜是从法属岛屿进口的，法国为保护法国国

内的白兰地生产工业，在自己的殖民岛上严禁进行朗姆酒的生产，因此法国的蔗糖生产商很乐意把糖蜜以低价卖给新英格兰人。英国蔗糖生产商又在此时恰好被法国人挤出了欧洲蔗糖市场。新英格兰人于是不得不购买法国人的糖蜜，这对他们而言无疑是痛上加痛。于是，英国蔗糖生产者呼吁政府出面干预。1733年，在伦敦通过了一部新税法，即《糖蜜税法》。

该税法规定，如果北美殖民地从其他国家的（实指法国）殖民地或种植园进口糖蜜，英国要对它征收每加仑6便士的关税。此税法旨在让新英格兰的酿酒者购买英国殖民地的糖蜜，因为英国糖蜜出口到美洲就可以不征此类关税。然而，英属岛屿上生产的糖蜜根本满足不了新英格兰酿酒业的需求。此外，酿酒者认为法国的糖蜜质量更高。当时，在新英格兰，朗姆酒的出口量占到出口产品总量的80%，因此它已经成为当地经济的中流砥柱。如果这个税法强制执行下去的话，酿酒者就会被迫减少产量或者提高价格，从而严重破坏新英格兰的经济繁荣。另外，朗姆酒也已经成为北美殖民地人们最钟情的饮品。无论男女老少，平均每人每年要喝4加仑的朗姆酒，如果税法通过了，他们就不能像以前那样痛快地畅饮自己最喜欢的酒了。

因此，酿酒者几乎都对这一税法视若无睹。他们从法属岛屿走私糖蜜，向那些本身就睁只眼闭只眼的海关工作人员行贿。海关官员通常都是在英国任命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会到殖民地来，而是从工资中拿出一小部分付给当地的下层海关工作人员，让他们去负责征税。这些海关工作人员很同情当地的同胞，因此对他们身在伦敦的上司也就敷衍了事。据估计，在税法通过后的几年里，大约有5/6的朗姆酒是用走私的糖蜜酿造的。与此同时，朗姆酒厂也从1738年的8家增加到1750年的63家。朗姆酒依然推动着殖民地的经济发展，甚至可以说影响着殖民地的整个社会生活。在选举活动中，它也同样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1758年，乔治·华盛顿竞选弗吉尼亚地方议会议员时，他的竞选团在一个仅有391个选民的小县郡就分发了28加仑朗姆酒、50加仑朗姆鸡尾酒（朗姆酒加糖、柠檬酸、香料等配制的饮料）、34加仑葡萄酒、46加仑啤酒和2加仑苹果酒。

《糖蜜税法》虽然没有强制执行，但它仍然引起了殖民地人民的愤慨。对于英国政府而言，通过这项税法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它不但让殖民地整个社会习惯了走私，还削弱了英国法律在殖民地的威信。自此，殖民地的人民觉得他们有权拒绝缴纳他们认为不合理的进出口货税。

因此，对于《糖蜜税法》的大规模抵制活动为美国走向独立埋下了伏笔。

1764年，英国通过了《糖蜜税法》，进一步使美国加快了走向独立的步伐。这一年，法国和印度的战争已经结束。在这次战争中，英国军队和美国殖民者联合打败了法国（英国和法国同时在欧洲、北美和印度等地交战，因此有人把这次大战看作是第一次真正的世界大战）。英国赢得了战争，从而确定了它在北美的主导地位。但是，战后的英国也欠下了大笔的债务。英国认为自己打这次仗主要是为了北美殖民地的利益，所以殖民地人民应该出力帮助偿还债务。更何况，在战争期间，有许多殖民者继续和敌对的法国贸易，因此英国政府决定进一步加强《糖蜜税法》的力度。政府虽然把原来每加仑6便士的糖蜜税收减少到3便士，但却采取了更有效的征收措施。税务官必须亲自到殖民地区收税，不能像以前一样出钱雇人代为行事；殖民地总督必须严格执行法律，逮捕走私者；同时皇家海军被赋予了在美国周围海域征税的权力。

很明显，新税法的目的不是为了规范贸易，而是为了增加税收。因此它引起了美国人民极大的反感。新英格兰的朗姆酒商们组织了抵制英货的运动，领导人民反对新税法。很多美国人，无

论生活受不受该税法的影响都认为英国议会向他们征税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个议会不仅远在千里之外，而且议会里也根本没有美国代表。当时流行的口号是“无代表不征税”。“自由之子”等一些主张独立的人开始动员群众与英国断绝关系。这些运动组织者们经常在酒店碰头议事。一位叫约翰·亚当斯的革命领导人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他在1766年参加一次“自由之子”会议的情况，会议地点是在切斯·斯皮克曼酒厂的会计室，与会者喝朗姆鸡尾酒，抽烟斗，吃奶酪和饼干。

继《糖蜜税法》之后，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不受欢迎的税法，包括1765年的《印花税法》、1767年的《汤森税法》以及1773年的《茶税法》。这些税法的通过最终导致了1773年的波士顿茶党案——愤怒的波士顿人把三船茶叶倾入波士顿海港以示对新税法的抗议。如果说茶叶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那么朗姆酒则推动了它在1775年的最终爆发。在英、美冲突爆发之夜，保罗·里维尔从波士顿骑马赶往列克星敦，向要求独立的北美民兵示警，通知约翰·汉考克和塞缪尔·亚当斯英军部队已经逼近，半路上他停下来到梅德福的一家酒馆喝了杯朗姆棕榈酒（用朗姆酒、糖和水混合而成，再用烧热的火棍插入进行加热），而这家酒馆的主人恰好是当地的民兵首领艾萨克·霍尔。

从战争开始到结束的6年中，朗姆酒成了最受美国士兵喜爱的饮品。1780年，亨利·诺克斯将军在给乔治·华盛顿写信要求北方提供物资时，着重强调了朗姆酒的重要性，他写道：“除了猪肉、牛肉、面包和面粉以外，还有一样东西必不可少，那就是朗姆酒。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保证朗姆酒的供应。”正是因为英国要对朗姆酒和糖蜜征税才最终导致双方的决裂，所以朗姆酒披上了一层与众不同的革命色彩。1781年，英国投降，随后美利坚合众国成立。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约翰·亚当斯在多年以后给他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们必须承认，很多伟大的事件都是从小事情中发展起来的，比如糖蜜就在美国独立运动中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

开拓精神

从殖民时期到独立战争，朗姆酒一直深得美国大众的喜爱。然而美国建国后不久，许多美国国民就不再流连于朗姆酒，转而把目光投向另一种经蒸馏提炼而成的饮品。随着定居者不断由东海岸向西部迁移，他们开始喜欢上另一种蒸馏饮品——威士忌。威士忌是对发酵的谷物进行蒸馏

酿制而成的。西迁的人们之所以喜欢它，原因之一是他们中许多人都有着苏格兰或爱尔兰的血统，并有着对谷物进行蒸馏的经验。另一方面，战争使得用于酿酒的糖蜜供应紧张，而原来在海岸附近难以种植的大麦、小麦、黑麦和玉米等作物（这就是为什么早期的殖民者酿造啤酒会有很大麻烦）在内地种植起来容易得多。相反，朗姆酒的酿制离不开海岸，因为酿酒的原料之一糖蜜就需要从海路进口，如果要把糖蜜运往内地则费用过高。相比之下，威士忌则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酿制，它的原料不需要进口，因此也就不需要缴税或担心被封锁。



1794年的威士忌暴乱（逮捕威士忌酒的收税人）。

1791年，仅宾夕法尼亚西部一个地方就有五千多个罐式蒸馏器，几乎是每6个人就有一个。威士忌扮演了朗姆酒以前的角色。它代替了朗姆酒成为“浓缩财富”：一匹驮马能够驮运4蒲式耳（1蒲式耳等于8加仑）谷物，但如果把这些谷物蒸馏成威士忌的话，它就可以驮运24蒲式耳谷物。在一些乡村，威士忌被当地用作货币来交换其他生活必需品，比如，盐、糖、铁、火药和子

弹等。在出生或死亡的仪式上，人们会喝威士忌来庆祝或哀悼。每当通过了法律条文，人们也会喝威士忌以表庆贺。法院给陪审员送威士忌表示感谢。参加竞选的政客们送威士忌给选民们，以争取选票，甚至有些职员的工资也是用威士忌来发放的。

因此，正当美国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因战争而欠下的大笔国债而发愁时，他发现向蒸馏饮品征收消费税无疑是条好路子。这项税收一方面可以充实国库，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人们过量饮酒。汉密尔顿相信这一税收将“有利于农业，有利于经济，有利于社会道德，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健康”。1791年，美国通过了一条法律：从7月1日起，酿酒者必须缴纳年税，或者酿制每加仑酒上缴最少7美分的消费税，具体上缴多少要视酒的度数而定。该法案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公众的反对，特别是在西部边境。这一税收对内陆的定居者似乎尤为不公，因为根据规定，酒一出蒸馏器就要征税，这就意味着自酿自饮或用来交换物品的酒也要征税。另外，很多定居者之所以当初来到美国就是为了躲避税收和政府的干预行为，但没想到刚脱离英国政府的新联邦政府竟然没比英国政府好多少，为此他们怨声载道。

联邦政府及各州在征收威士忌消费税的问题

上产生了分歧，这也反映了双方关于权力归属问题的纠纷。总的来说，东部各州希望联邦政府的法律高于各州法律，南部和西部各州则持反对意见。似乎是为了讨好东部的联邦制拥护者，新法律中有一条规定：罪犯必须送到费城的联邦法院审判，地方法院无权审理。佐治亚州的詹姆士·杰克森在众议院呼吁，“消费税将会把大部分民众的唯一奢侈品——蒸馏酒从他们生活中剥夺”。他警告说，“如果我们听之任之的话，恐怕接下来我们连洗衣服也要交税了”。

新法律开始施行了，但很多农场主拒绝交税。于是，有人袭击收税人，偷走他们的账本并将之销毁，把他们的马鞍剁成碎片。抗争最激烈的地区是宾夕法尼亚的费耶特、阿勒格尼、威斯特摩兰和华盛顿等地，这些县郡都狂热地支持地方自治。反对消费税的农场主们开始联合起来进行有组织的抗争。他们打破那些交税者的蒸馏器，并在树上贴通知号召人们进行抗争。终于，议会在1792年和1794年分别修正了法案，减少了对乡村酿酒者的税收；并赋予地方法院司法权，让他们自己审理罪犯。然而，这样做并没有平息人们的抗争。汉密尔顿意识到再这样下去的话，联邦政府的权威将岌岌可危。于是，他派出联邦法院的执行官到宾夕法尼亚西部将传票送达给几个拒绝纳税的农场主。

1794年7月，当传票送达给一个叫威廉·米勒的农场主时，冲突升级了。米勒的一个同伴冲着联邦法院的执行官们开了一枪，所幸无人受伤。但在随后的两天里，双方发生了冲突。自称“威士忌爱好者”的暴乱队伍这时已扩展到500人，冲突中双方都有伤亡。后来，一位叫戴维·布拉德福德的律师取得了暴乱队伍的领导权，他呼吁当地人民支持他们的反抗。在他的号召下，六千多人在匹兹堡附近的布拉多克集结，大家推选布拉德福德为这支临时部队的总指挥。他们情绪高涨，在经过军事整顿和射击训练之后，他们决心脱离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一个全新的独立国家。

华盛顿总统接受了汉密尔顿的建议，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他从宾夕法尼亚东部、新泽西、弗吉尼亚和马里兰调集了13 000兵士，并让这支部队带上枪械、火炮、行李及已经征了税的威士忌翻山越岭开赴匹兹堡，向叛乱者显示军威。布拉德福德的军队得知联邦军队正在逼近，立刻军心涣散。布拉德福德逃走，他的追随者也立即作鸟兽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支开来教训“威士忌爱好者”的军队为解决征税的问题做出了很大的实际贡献，因为在行军后期他们需要更多的威士忌，于是他们用现金向宾夕法尼亚西部的酿酒商买酒，这样一来宾夕法尼亚西部的酿酒者就有

钱交税了。

大概有二十几个反抗者被带回了费城，但除了监禁几个月以外，他们没有受到什么严重的惩罚。有两个反抗者本来要被处以死刑，但总统赦免了他们。到此，征收酒税的政策也就正式宣告失败，这条法律在几年以后最终被废除了。政府用于支付镇压反抗的军队的费用高达150万美元，相当于消费税实行的10年中所收全部税收的1/3。威士忌暴乱是美国独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抗税。尽管暴乱和税法最终都失败了，但联邦政府出兵镇压充分表明了联邦法律不容忽视。因此，这件事也算是美国早期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抗税斗争失败后，有着苏格兰和爱尔兰血统的抗争者继续西行。到达新建的肯塔基州后，他们开始用玉米和黑麦酿造威士忌，并由此促进了另一种饮品的发展。这种方法源于波旁县，所以这种威士忌酒也叫波旁威士忌酒。它使用本地的玉米做原料，因此味道别具一格。

乔治·华盛顿在晚年时，自己也开办了一个威士忌酒坊。之所以产生这个念头，是因为他的农场经理——也是一个苏格兰人——告诉他，其拥有的弗农山所产的谷物如果用来酿造威士忌的话将会利润丰厚。他的酒坊在1797年开办的时候只

有两个蒸馏器，到1799年，也就是华盛顿死前不久，酒坊产量达到顶峰，蒸馏器发展到5个。那年他酿造了11 000加仑的黑麦威士忌酒，并在当地出售，赚到了7 500美元。他还将酒一桶一桶地送给亲戚和朋友。1799年10月29日，他在写给侄子的信中说道：“200桶酒已经准备好了，你尽快来取，越快越好，因为有很多人急着想要。”



乔治·华盛顿

华盛顿喜欢威士忌并且自己办了厂，相比之

下，另一名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则对威士忌持反对态度。他极力贬低威士忌，称它为“毒药”，并为此发表了著名的评论，“在葡萄酒便宜的国家里，人们往往不会喝醉；而在葡萄酒昂贵的国家里，人们只好以烈酒作为日常饮品，所以往往会变得终日醉酒不醒”。杰斐逊大力发展美国的葡萄种植，他提倡减少对进口葡萄酒的赋税，并声称只有多进口葡萄酒才是“对付威士忌毒害的唯一解药”。但是他的想法是违背民意的，葡萄酒价格比威士忌高得多，酒精含量更少。另外，威士忌对于美国人来说有一种特别的含义：它代表了美国人民独立自主、自给自足的精神。

酒瓶里的殖民主义

在整个殖民时期，不论是对欧洲殖民者，还是对被他们压迫的非洲奴隶及本土的印第安人来说，烈酒都是艰难岁月中的一种慰藉。美洲的欧洲殖民者不但利用烈酒来购买、压迫和控制奴隶，还利用印第安人对烈酒的热爱来镇压他们。

对于印第安人为什么如此喜欢烈酒，人们众说纷纭。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印第安人认为烈酒就像当地能让人产生幻觉的植物一样具有超自然

能力。而饮用者只有让自己完全喝醉才能产生这种幻觉。一位17世纪的法国研究者在介绍印第安部落时说道：“他们非常喜欢酒精浓度高的饮品，但如果手边的饮品不足以让人一醉方休，他们往往不屑一饮。”如果手边的酒不足以让一大群人全部喝醉，那么这些酒就给一小部分人喝，其他人则在一旁看着。总而言之，印第安人有“要喝必醉”的习惯，因此当看到欧洲人有时选择喝葡萄酒时，他们感到非常纳闷。对此，一位殖民者在1697年做过如下记录，“在他们看来，葡萄酒如此昂贵，而朗姆酒既便宜又容易让人醉倒，但英国人还选择购买葡萄酒，这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且不说印第安人到底为什么对烈酒如此着迷，单说欧洲人，他们着实充分利用了印第安人的这一习惯。在与印第安人进行土地和货物贸易时，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烈酒（英控区提供朗姆酒，法控区提供白兰地）。法国毛皮商人给加拿大提供了大量的白兰地，对此，一位法国的传教士大加批评：“罪恶的白兰地交易让这些地区（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变得残忍、暴躁和逆来顺受，我们在深表愤慨的同时，更要阻止这种罪恶贸易，因为它会让人变得麻木和放荡。”然而，当地的法国军队不但不阻止这种贸易，反而把保证白兰地酒的供应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因为这

些酒一部分要卖给印第安人，另一部分要留着自己喝。

在墨西哥，自从西班牙人引进了蒸馏术后，麦斯卡尔酒得到了发展。它是墨西哥人和中美洲人的日常饮料，经龙舌兰酒蒸馏而成。龙舌兰酒是阿兹台克人用一种龙舌兰属植物的汁发酵而成的，是当地一种酒精浓度较低的日常饮用酒。而上层社会人士一般喝贵族酒——巧克力酒。后来殖民者使阿兹台克人和其他的当地印第安人爱上了麦斯卡尔酒，并逐渐离不开这种高浓度烈酒。1786年，墨西哥总督认为，既然印第安人如此喜欢烈酒，而这种喜好又能很好地帮助殖民者巩固统治，那么这种以酒治人的方法也完全可以用来对付北方阿帕奇人。他建议：“这样，我们就能让他们有一种新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让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必须依靠我们。”

在火器、枪炮、疾病、瘟疫和蒸馏饮品的帮助下，老牌帝国的殖民者成了新世界的统治者。烈酒帮助殖民者对成百万的人进行奴役和驱逐，帮助他们建立新国家，并帮助他们侵略异国文化。今天，烈酒不再与奴役和剥削联系在一起，但它的另一些用途仍为人所用：由于它长时间不变质，飞机上的乘客总喜欢在行李中放上一瓶免税的烈酒；另外，为了逃避消费税，消费者总是

购买免征赋税的烈酒，这种行为不正是对朗姆酒经营者和威士忌爱好者传统的一种继承吗？

理性时代的咖啡

Coffee in the Age of Reason

伟大的提神剂

咖啡是提神的饮料，是滋补心神的营养品。与酒精饮料不同，咖啡让我们神志清醒，思维专注；它吹散了胡思乱想的愁云惨雾，用真理的灵光照亮了真实的世界。

——朱尔斯·米什莱，法国历史学家
(1798~1874)

咖啡杯边的启蒙

希腊人也难免有犯错的时候。重的物体并不会比轻的物体先落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心脏也并不是为血液加热的炉子，而是为体内的血液循环提供压力的泵。但直到17世纪初，随着天文学家和解剖学家带领人们一步步走进从前的未知世界，欧洲的思想家们才开始认真考虑向古希腊的传统哲学定论发出挑战。意大利的伽利略和英国的培根是这场革命的先驱。他们拒绝对古代经典盲目跟从，提倡实际观察和实验。1620年，培根的著作《新工具》出版问世。培根在书中提出：“通过在旧理论上嫁接或叠加新理论的

方式，我们是无法获得重大科学突破的。”“重新建立科学系统必须从根基入手——除非，我们愿意在一个永无尽头的圈子里迈着小步子打转。”培根第一个站出来，抨击希腊哲学思想。他和他的追随者们要拆除传统理论的藩篱，重建人类知识大厦，一步一个脚印地打好这座大厦的地基。一切事物都可以被挑战，没有什么是一凭空假设就能成立的。王朝复辟的宗教战争削弱了欧洲（尤其是北欧）的教会势力，为新科学体系的建立扫清了道路。欧洲人一心想要拓展海外殖民地。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新理性主义在荷兰和英格兰兴盛起来。理性主义的发展还引发了一场文化运动的疾风骤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科学革命。

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追求理性主义的精神逐渐成为西方思想的主流。随着经验主义和怀疑论不断由科学研究领域向哲学、政治、商业及宗教领域渗透，理性主义革命迎来了它的高潮——启蒙运动。在那个理性时代中，西方思想家挣脱了古代思想的束缚，开放地接受新思想，冲破了旧世界的重重枷锁，用思想革命的音符附和着大航海时代地理扩张的旋律，奏出了一首壮丽的时代交响曲。

新理性主义在欧洲蔓延开来，其代表物之一

便是“新饮品”——咖啡。咖啡能够提神醒脑，因此它逐渐成为科学家、商人及律师等群体的最爱。这些青睐咖啡的人大多是坐在办公桌前的脑力劳动者，很少有工作在户外的体力劳动者。咖啡帮助他们调节工作时钟：早上让他们惺忪的睡眠清醒过来，让他们一整天都精力充沛，直到完成一天的工作为止。如果下班后还不想休息，那么一杯咖啡可以让他们的精神再次振奋起来。那个时代，人们喝咖啡的主要场所是咖啡馆——一个安静闲适、环境幽雅的地方，它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自我完善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17世纪前，欧洲人的日常饮品不是啤酒就是葡萄酒；而咖啡的传入则给他们带来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在人类生活区，尤其是脏乱拥挤的城市，清水往往容易遭到污染；而生产啤酒和冲泡咖啡时用的都是开水，因此，饮用酒精饮品和咖啡要比饮用清水安全得多。葡萄酒和啤酒是人们生活中的主要饮料，而只有当人们想喝得酩酊大醉时才喝烈酒。酒精饮品使人精神颓靡；而咖啡则使人每天都神清气爽、精力充沛，工作效率也显著提高。咖啡和酒精逐渐被人们视作相互对立的两种饮品：一个使人清醒，一个使人迷醉；一个让人感觉灵敏，一个让人反应迟钝，忘却现实的生活。1674年，在伦敦出版的一本匿名诗集中不乏对酒精饮品的谴责之词。在此书中，葡萄酒

被斥作“阴险的葡萄送给人类的甜蜜毒药，以溺死我们的每一点理智、每一寸灵魂”；啤酒也被贬为“围攻我们大脑”的“朦胧淡味酒”；而咖啡则被赞为“有益健康的饮品”：

它驱寒养胃，让天才反应更敏捷，
把你从回忆中解脱出来，化沮丧为振
作，
让人精神振奋，又不失理智。

被酒精迷雾笼罩了几百年的西欧从此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1660年，一位英国观察家写道：“咖啡使欧洲各国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从前那些喜欢在早餐喝点儿小酒的人，现在也大多改喝咖啡了。因为酒精使他们整天昏昏沉沉，难以很好地工作；而咖啡则使他们精力充沛。咖啡也被人们喻为“解酒剂”。1671年，法国作家杜福尔写道：“咖啡让你立刻清醒起来。”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人认为咖啡能够解酒，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表面上，咖啡使醉酒的人清醒，但实际上，喝了咖啡，酒精反而更难从血液中代谢掉。

新生事物总是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咖啡

也不例外。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咖啡一无所知。因此，对17世纪的欧洲思想家们来说，饮用咖啡象征着他们对古代思想的超越。咖啡是伟大的提神剂，集中体现了现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简而言之，咖啡是理性时代的理想饮品。

咖啡的凯旋

17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咖啡成了预示伦敦政治气候的风向标。查理一世被处以绞刑，英国内战结束，清教徒克伦威尔随后登上了国王的宝座。清教徒统治时期，咖啡馆开始在英国出现。它以优雅的环境、自由闲适的气息和浓厚的文化氛围博得了大众的青睐。酒馆里往往光线昏暗，令人觉得颓靡消沉；咖啡馆则截然不同。这里光线明亮，常备有书架、镜子及典雅的家具，墙上还挂有镶着金色相框的油画，令人觉得轻松闲适。1658年，克伦威尔逝世。随后，公众的支持开始倒向君主制度。随着王朝复辟的道路逐渐被扫清，咖啡馆成了政治论战的主要场所。1660年，查尔斯二世回到英国。他的顾问威廉·考文重曾记述道：“在克伦威尔的统治时期，查尔斯的支持者们经常在咖啡馆里集会。国王的朋友在咖啡馆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能享受到更多的言论

自由。”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些咖啡馆里的“聚会”，国王也许无法复归其位。

在这段时期，伦敦逐渐发展成为欣欣向荣的世界商业中心。咖啡馆为商业对话和应酬提供了一个便捷而优雅的交流场所，因此广泛博得商人们的青睐。王朝复辟后，咖啡馆人气更旺。清教徒们在这里聚首，谋反者在这里策划阴谋，资本家们在这里思量扩大资本的战略……就这样，咖啡馆映射了伦敦社会的风云变幻。

1652年，一个叫帕卡·罗西的亚美尼亚人开设了伦敦的第一间咖啡馆。罗西是英国商人丹尼尔·爱德华的仆人。丹尼尔在游访中东时“迷上”了当地的咖啡。于是他将咖啡带回了英国，并经常邀请三五好友来品尝咖啡。为此，罗西每天都要为丹尼尔煮好几次咖啡。朋友们都对这种新饮品赞不绝口，喜欢得不得了。于是，丹尼尔决定派罗西去经销咖啡。为了给新开业的咖啡馆做宣传，罗西制作了很多传单，并派人到处分发。传单的标题是“饮用咖啡的好处”，开篇先对咖啡的起源、制作方法、相关的风俗做了简单的介绍，然后用大量篇幅来介绍和强调咖啡的药用价值，如：“治疗眼睑发炎、头痛、咳嗽、水肿、痛风、坏血病、预防孕妇流产……提神醒脑，让你精力充沛地应对一天的工作……吃晚饭时千万不

要喝咖啡，除非你想晚上睡不着，因为咖啡能让你在三四个小时内全无睡意。”正是因为这些商业性的广告词，人们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要到罗西的店里看个究竟。

罗西的生意是如此红火，以至于当地的酒馆老板们纷纷到市长那里抗议，他们的理由是：罗西不是伦敦市的自由人，因此没有权利与他们在生意上竞争。最终，罗西被赶出了英国，但经营咖啡馆的想法却留在了当地人的脑子里。17世纪50年代，咖啡馆如雨后春笋般开遍了伦敦的大街小巷。到1663年，伦敦的咖啡馆已达83家之多。虽然1666年的伦敦大火烧毁了许多咖啡馆，但大火过后，人们又新建了更多咖啡馆。到17世纪末，伦敦的咖啡馆已达上百家。据当时的官方数字统计，伦敦约有3 000家咖啡馆。但对于一个只有60万人口的城市来说，这个数字未免有些夸大其词。虽然伦敦的咖啡馆有时也出售热巧克力和茶等饮料，但主要的卖点还是咖啡，而且其内部环境和总体氛围也都是按照传统阿拉伯咖啡馆的风格设计建造的。

虽然咖啡很受大众欢迎，但对咖啡馆持反对态度的也大有人在。酒商和酒馆老板们对咖啡屋的咬牙切齿自不必说，一些医药学者和评论家也高高竖起了反对的大旗。前者认为咖啡有毒；后

者则声称咖啡馆让人们把时间都浪费在了细枝末节的小事上，而忽略了正事大业——这与阿拉伯批评家们的观点如出一辙。也有人讨厌咖啡的味道，说那闻起来简直就像是“煤烟”或“久穿不洗的老臭鞋”。

在这场争论的过程中，双方不仅唇枪舌剑，而且还发表了不少公开性文章，如“咖啡混战”（1662）、“谴责咖啡”（1672）、“守护咖啡”（1674）、“为咖啡馆辩护”（1675）等。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女性控告咖啡的请愿书”。这篇文章是由一个女性组织发布的，文中指出了过度饮用这种“令人憔悴的”液体产生的“亢奋”给她们带来了诸多“不便”。女人们抱怨道：由于喝了过多的咖啡，她们的丈夫变得“像沙漠一样‘不结果实’，这导致了家庭不和睦”。此外，由于男人们把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咖啡馆里，而咖啡馆又不允许女人进入，“人类都濒临绝种了”。

这场关于咖啡的争论愈演愈烈，后来英国当局都不得不站出来表态。其实那段时间，国王查尔斯二世也在暗自思量关闭咖啡馆的借口。和阿拉伯官员一样，查尔斯也怀疑咖啡馆里的自由言论会暗酿阴谋。他对这种事很敏感，因为当初他自己也是通过咖啡馆里的谋划登上王位的。1675年12月29日，国王颁布了“查禁咖啡馆公告”，宣

称：咖啡馆产生了这么多邪恶危险的后果……在这些地方……“产生了许多错误的、恶意诽谤的文件；这些文件传到国外，破坏了政权机构的名誉，扰乱了王国的和平与稳定。因此，现下令关闭和查封所有咖啡馆”。

这个公告一经宣布，立刻引起了公众的强烈抗议，因为此时咖啡馆已经成为伦敦社交生活、商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中心场所。不久，国王就发现，这一禁令非但不会有人遵守，而且还会有损政府的威望。于是，他又赶紧颁布了另一则公告，宣布只要咖啡商们缴纳500英镑，并发誓效忠于国王，他们就可以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出售咖啡。但没过多久，国王又觉不妥，于是又出台了新的公告：只要咖啡馆拒绝间谍和谋反者入内，就准许营业。由此可见，没人能阻挡咖啡的“征程”，甚至连国王也不能。

与伦敦的情况相似，1671年，法国的第一家咖啡馆正式开业。由于法国的葡萄酒商们担心咖啡会抢了他们的生意，他们便唆使马赛医生以有害健康为由，反对人们饮用咖啡。这些医生对世人宣称：“咖啡不过是一种不起眼的外来事物，一种由山羊和骆驼发现的长在树上的果实。它能使人热血沸腾，能导致痉挛、身体虚弱和消瘦。它会损害马赛市民的健康。”但这些指控并

没能阻止咖啡的传播，因为咖啡早已成为马赛上流社会的流行事物。到17世纪末，咖啡馆已遍布巴黎的大街小巷。当咖啡流行风吹入德国时，著名作曲家巴赫还特意写下了“咖啡大合唱”一曲，讽刺了那些企图以药用借口反对咖啡未遂的人。在荷兰，咖啡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18世纪初的一位荷兰作家写道：“在我们国家，饮用咖啡是如此普遍的习惯。要是女仆和缝纫工们早上不喝咖啡，线都穿不进针眼儿。”就这样，来自阿拉伯的饮品征服了欧洲。

咖啡帝国

18世纪之前，阿拉伯半岛一直是世界上唯一的咖啡供应地。正如一位波斯作家所说：“在麦加城的周边地区，咖啡丰收了。人们先将咖啡豆运往吉达港，再由吉达港运往苏伊士，最后用骆驼运至亚历山大。法国商人和威尼斯商人大多从亚历山大进货。但有时他们也搭荷兰人的船走水路直接从麦加进货。随着人们对咖啡的需求量不断增加，欧洲人开始担心自己会过于依赖进口产品，于是他们开始着手自己生产咖啡。阿拉伯人自然不愿意别人跟他们抢生意，于是想方设法地阻止欧洲人生产咖啡。在咖啡豆装船以前，阿拉

伯人先将咖啡豆烘熟，以防止欧洲人将它们作为种子栽培新的植株；阿拉伯人还严禁外国人进入咖啡产区。”

首先打破阿拉伯垄断的是荷兰人。17世纪，荷兰人取代了葡萄牙人成为东印度地区主要的欧洲宗主国，同时他们还获得了香料贸易的控制权，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商业大国。荷兰水手从阿拉伯的咖啡树上偷来一些枝干，带回阿姆斯特丹，并在温室中成功地培植出了咖啡树。17世纪90年代，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在爪哇（当时荷兰的一个岛屿殖民地，位于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建立了咖啡种植园。没过几年，直接运往鹿特丹的爪哇咖啡就使荷兰掌握了咖啡市场的主控权。虽然内行人认为荷兰咖啡不及阿拉伯咖啡味道纯正，但在价格方面，阿拉伯却无力与荷兰抗衡。

荷兰人成功之后，法国人也开始探索咖啡的种植。荷兰人的成功让法国人认识到：咖啡树生长所需的自然条件与产糖植物的生长条件相似，这意味着在印度东海岸枝繁叶茂的咖啡树在印度西海岸也同样能茁壮成长。法国人马蒂厄·克鲁是当时驻扎在法国岛屿马提尼克的一名海军军官。他自愿承担起将咖啡树引入法属殖民地的光荣任务。1723年，在访问巴黎的途中他秘密执行了一

项非公计划：采一些咖啡树枝带回马提尼克。当时，让蒂植物园的花房里有一株保存完好的咖啡树标本，这是1714年荷兰人送给路易十四的礼物，也是巴黎唯一的一株咖啡树。但路易十四似乎并没把咖啡当回事儿。克鲁无法亲手从这棵皇家玉树上剪下枝干，于是他便托人去采。有一位年轻的贵族小姐爱慕克鲁，克鲁便托她找皇家医生帮忙，因为皇家医生有权从任何植物上采集他认为有药用价值的部分。皇家医生得手后将这珍贵的树枝交到了克鲁的手里。克鲁小心翼翼地将它放进玻璃盒子里，双手捧着踏上了直达西印度群岛的航船。

如果克鲁的“自我吹捧”句句属实，那么这树枝在穿越大西洋的旅程中着实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事隔多年后，克鲁在自己的航海回忆录中开篇就介绍了这段经历：“在那漫长的路途中，这娇弱的枝干给我带来了无尽的麻烦，为了保护它，我挖空了心思，这些麻烦和心思是数不清也道不尽的。”每天克鲁都把他的树枝拿出舱房晒太阳，而他则陪在旁边寸步不离。一天，克鲁在陪树枝晒太阳时睡着了。当他醒来时，发现一个荷兰人把树枝上的芽掐掉了。而这个荷兰人在船靠岸马德拉岛时就已登陆了。此后不久，他们又遇上了海盗，险些全军覆没。在与海盗搏斗的过程中，装咖啡树枝的玻璃盒子被摔坏了。所以，

克鲁不得不求助船上的木匠帮他修补盒子。随后他们又遭遇了暴风雨，盒子又一次被摔坏，树枝浸在了海水里。暴风雨过后，海面平静了下来，一丝风也没有。但是，船又因无风而被迫在海上漂浮了好几天，饮用水也要定量分发。克鲁写道：“饮用水是如此缺乏，以至于一个多月以来，我都不得不与我的咖啡树枝分享我那可怜巴巴的一份水，这树枝承载着我全部的欢乐和希望。”

最终，克鲁和他珍贵的树枝一同抵达了马提尼克岛^[1]。克鲁写道：“一到家，我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小心翼翼地把我的树枝栽在花园里最适合它生长的地方……虽然它就在我的视线里，但我还是整天提心吊胆，担心有人将它从我身边夺走。最后，我像履行一项义务一样，用荆棘丛将它围住，以免有人靠近它，直到它成熟为止……在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之后，在我为它操了那么多心之后，这珍贵的植株在我眼中显得越发珍贵。”两年后，克鲁第一次从他的咖啡树上收获了咖啡豆。然后，他将一部分咖啡豆赠予友人，使他们也能种植咖啡树。克鲁还派人把咖啡树苗送到圣多明各岛和瓜德罗普岛。后来，这两个岛屿也成了咖啡产地。1730年，法国开始正式对外出口咖啡。由于咖啡产量已经远远超出本

土需求，法国人开始把多余的咖啡从马赛运往黎凡特地区（地中海东部诸国和岛屿）——在那里，法国咖啡以低廉的价格又一次击败了阿拉伯咖啡，占据了地中海东部市场。1746年，为了表彰他的突出成就，国王路易十五召见了克鲁。与他的父亲不同，路易十五对咖啡颇为热衷。同年，荷兰人将咖啡传入南美殖民地苏里南。克鲁的那颗原始植株的后代也被带到了这一地区，并在海地、古巴、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等地繁衍生长。最终，巴西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咖啡产地，而阿拉伯国家早已是望尘莫及。



在回马提尼克岛的途中，克鲁和他的咖啡枝共同分享一份水。

从也门的一种名不见经传地方的宗教饮品到风靡世界的时尚饮品，咖啡的传播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在占据了阿拉伯世界之后，咖啡又传遍欧洲，并随着欧洲国家的海外殖民地扩张传遍世界各地。作为酒精饮品的重要替代品，咖啡逐渐走上世界舞台，并深得知识分子和商人们的青睐。更具时代意义和进步意义的是人们饮用咖啡的方式——咖啡馆，既是人们饮用咖啡的场所，又为社交应酬、文化交流、商业谈判和政治对话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环境。

[1] 马提尼克岛，法国的海外大区，位于安地列斯群岛最北部，岛上自然风光优美，有火山和海滩、盛产甘蔗、棕榈树、香蕉和菠萝等植物，曾被哥伦布喻为“世界上最美的国家”。——编者注

咖啡馆网络

如果你是个追求智慧与欢乐的人，如果你喜欢打探新闻，就像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样——就像荷兰人、丹麦人、土耳其人和犹太人一样，那我向你推荐一个去处，那里的新闻无所不有，包罗万象：去咖啡馆里倾听吧——那里的消息句句属实……

上至君主大事，下到老鼠轶闻，古今多少事，皆在咖啡馆。

——托马斯·乔丹《来自咖啡馆的新闻》（1667）

咖啡驱动的网络

最新的贸易要闻，商品的价格浮动，政坛的风吹草动，新近的科学动态，乃至人们对一本新书的评价——如果一个17世纪的商人想要了解以上讯息，那么只需走进咖啡馆，便可知晓天下事。在这里，可以读到最新的时事新闻，与其他顾客闲聊，与商业伙伴洽谈生意，或加入大家的

讨论，闲话文学政治；而享受这一切，只需付一杯咖啡的钱。17世纪，欧洲咖啡馆是科学家、商人、作家及政客们交流意见、互通有无的场所。它颇似现代的网络，充满活力，信息丰富，但又不乏流言蜚语和捏造的假象；它是信息的自然通风口，大量的新闻通讯录、宣传手册、广告传单及党派间互相攻讦谩骂的言论都从这里散布出去。那个时代的一位观察家曾写道：“咖啡馆是自由交流的理想空间。在这里您可以随意阅读报章杂志，如《伦敦公报》（每星期一、四）、《每日新闻》（每星期一至六）、《邮差报》、《飞邮报》、《邮童报》（每星期二、四、六）、《英国邮报》（每星期一、三、五）以及各类副刊。”同时，这些刊物也将咖啡馆里的睿智传播到城镇和乡村。

为了迎合顾客的需求，一些咖啡馆还特意将近日货品价格、股票价格及航船时刻表贴在墙上。有的甚至还订了外国刊物供读者阅览。咖啡馆也经常进行具体的商贸活动，演员、乐手和水手们大都可以在这里觅到心仪的职位。有些咖啡馆迎合特定的消费群，有些咖啡馆承办某种特定的商业活动，而功用相似的咖啡馆通常会聚集在同一个地区。这种现象在伦敦尤为突出。在伦敦，有上百家始建于18世纪的咖啡馆。每家店门前的招牌上都刻着该店的店名和店标。服务定位

相近的咖啡馆大都集中在一起。政客们频频聚首圣·詹姆斯和威斯敏斯特地区的咖啡馆；牧师和神学家们青睐保罗大教堂附近的咖啡馆；文人墨客经常光顾考文特花园的威尔咖啡馆——30年来，诗人约翰·德赖登和他的圈内好友们就是在这里修改作品，谈论最新的诗歌剧作。皇家交易所附近的咖啡馆是商人聚集的地方，老板们通常都在固定的时间光顾这里，以便他们的助手可以找到他们。他们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办公室、会议室及交易场所。法院街的“男人”咖啡馆出售书籍。有些咖啡馆还充当拍卖场，拍卖各种货品。1709年创立的伦敦杂志《泰特勒》曾以不同咖啡馆的名字作为各类文章的主题板块。该杂志第一期这样介绍道：“‘怀特的巧克力屋’将向您介绍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威尔咖啡馆’将带您领略风雅诗人的集会；‘格雷生咖啡馆’是一个学习的园地；在‘圣·詹姆斯咖啡馆’里，您将可以了解到来自国内外的重大要闻。”

《泰特勒》的编辑理查德·斯蒂尔在杂志上将自己的通信地址写为“格雷生咖啡馆”——当时科学家们经常光顾的地方，这是咖啡馆的又一个新用途。1680年，伦敦有了廉价邮政服务设施。从那以后，将咖啡馆当作邮件收寄点的情况就变得司空见惯。每家咖啡馆都有自己的老主顾。这些老主顾们通常一天会来一两次，每次都会点一杯

咖啡，听听周围人谈论的新鲜事，然后查一下是否有自己的新邮件。19世纪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利在其著作《英国史》一书中写道：“外国人说，咖啡馆是伦敦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特色。”“咖啡馆是伦敦人的家。打听别人的住址时，人们并不问你住舰队街还是法院街，而是问你经常去‘格雷生’还是‘彩虹’。”一个人经常光顾的咖啡馆并不止一家，至于什么时候去哪家，全凭当时的心情。比如：一个商人可能周旋在一家以金融为主题的咖啡馆和一家以船运贸易为主题的咖啡馆之间。17世纪70年代，英国科学家罗伯特·胡克在他的日记中记述道，他经常光顾的咖啡馆大约有60家之多——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兴趣爱好之广。

各种流言蜚语和时事要闻被顾客们从一间咖啡馆传到另一间咖啡馆。有时，他们还雇佣专门的跑腿者，让他们把诸如战争的爆发或大人物的死讯这样的重要消息快速地传递到其他咖啡馆。通过这种咖啡驱动的网络，消息传播得很快。正如1712年《观察家》杂志所刊载的那样：“几年前，镇上有一人经常以说谎自娱。每天早上8点，他都会到查令十字咖啡馆去撒一个谎。然后，他就沿着这个谎言的传播路线走进镇上的每一家咖啡馆。晚上8点，他去见他的朋友们，并向他们讲述这一路上人们对这个谎言的反应是何其有趣——在考文特花园的威尔咖啡馆，人们对

此都信以为真；在儿童咖啡馆，人们都认为这事严重得不得了；在乔纳森咖啡馆，人们都在推测这事与股票有何关联。”

咖啡馆论坛在公众舆论和私人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它既塑造了大众观念，同时又反映了大众观念。理论上，咖啡馆是公共场所，任何人都可以进入（但女性除外，至少伦敦的咖啡馆是禁止女性入内的），但其实际的内部装饰、舒适的家具以及顾客们频频的光顾，却给人们一种温暖的家的感受。在咖啡馆里，人们也要遵守一定的规则，比如：要把社会地位之分留在咖啡馆的门外。正如当时的一首押韵诗所写：“不论是贵族绅士，还是商业人士，我们皆欢迎，在这里，大家平起平坐笑盈盈。”

1680年至1730年，伦敦是世界上咖啡消耗量最大的城市，可见当时咖啡馆在伦敦的重要性。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日记上潦草地记录着他们在咖啡馆的经历和收获：“然后，我去了咖啡馆。”这句话频频出现在英国政府要员塞缪尔·佩皮斯的日记里。他在1664年1月11日这天所写的日记，为那个时代的咖啡馆蒙上了一丝神秘而浪漫的色彩——在咖啡馆里，无论是深刻的哲理，还是繁复的生活琐事，你都可以自由地谈论；而且，你永远都无法预料下一秒会遇见谁，接下来

会听到什么，“然后，我去了咖啡馆。



17世纪末伦敦的一家咖啡馆。

佩蒂爵士和格兰特船长也在那里。于是，我们就开始畅谈音乐，探讨世界的本质，讨论回忆的艺术……以及其他我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我们谈得兴致盎然，很久没有遇到这么好的知己了。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还想认识一下希尔先生……镇上人们谈论的焦点依然是科隆奈尔·特纳，他犯了抢劫罪，大家都认为他会被处以绞刑”。

情况相似的是，胡克的日记也记述了他的咖啡馆生活：在咖啡馆里，他与朋友进行学术讨论，与建筑商及乐器商们洽谈生意。有时，他甚至还把这里当作实验室，集中进行科学实验。他在1674年2月的一篇日记中记述了他和朋友在盖拉维咖啡馆所谈论的话题——盖拉维是他当时最喜欢去的咖啡馆——据说，印度商人都有一种习惯：他们的脚能像手一样灵巧地握住东西，比如高大的棕榈树，还有那“鲜美无比的大菠萝”，对于那时的英国人来说，菠萝还是一种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异域水果。

咖啡馆是自我教育的中心场所，是文学和哲学思考的精神领地，是商业创新的发源地；有时，它甚至还是政治变革的温床。但不管怎么

说，它们是绝好的信息源——在咖啡馆里，什么样的刊物都能看到，什么样的消息都能听到。人们口口相传，把信息从一家咖啡馆传到另一家咖啡馆。总体说来，欧洲的咖啡馆充当的是理性时代的因特网的角色。

创新与思考

西欧的第一家咖啡馆并不是开在繁华的商业区，而是开在大学城牛津。这家咖啡馆是1650年一个叫雅各布的黎巴嫩人开设的，比帕卡·罗西开设的第一家伦敦咖啡馆早两年。虽然咖啡与学术的联系早已被现代人视作是理所应当——在学术会议和研讨会的间歇时间里，人们饮用的通常都是咖啡——但在最初，这种联系是颇具争议的。在牛津，当咖啡开始风靡，咖啡馆开始增多的时候，牛津大学的校方却极力遏制它们的传播，因为他们担心咖啡馆会让学生们变得懒散、懈怠，不再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上。当时，许多人都斥责人们对咖啡的热情，当时的编年史作者安东尼·伍德就是其中之一。他自问自答：“为什么学问的吸引力正在下降，现在很少有大学生愿意研究它们了呢？答案是咖啡馆，现在他们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泡在那里。”

但实际上，上述说法大错特错。因为咖啡馆正逐渐发展成为学生们进行学术讨论的集会地，尤其是那些对科学发展过程有着浓厚兴趣的学生。那时，他们把科学发展过程称作“自然哲学”。咖啡非但没有阻碍文化活动，反而对文化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千真万确的。咖啡馆有时也被人们称作“便士大学”，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走进来和大家交谈，而你只需为此支付一两个便士——不过是一杯咖啡的价钱。正如当时的一支小曲所唱的：“像这样伟大的大学，我觉得真是史无前例；只需花一便士，你便可置身其中，成为一名学者。”

有很多年轻人在牛津求学期间迷上了咖啡馆讨论的形式。英国建筑家、科学家克里斯托弗·雷恩就是其中的一位。除了作为享誉世界的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设计者而名垂青史以外，雷恩还是一位顶尖的科学家。他是不列颠的先锋科学机构英国皇家学会（始于1660年）的创始人之一。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胡克、佩皮斯、埃德蒙·哈利等。通常在学会的例会结束后，他们都会转战咖啡馆，继续讨论。如1674年5月7日，胡克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在皇家学会的会议上演示了天文四边形理论的改良方案，随后又在盖拉维咖啡馆对天文学家约翰·弗拉姆斯蒂德演示了一遍。第二年，弗拉姆斯蒂德就被查尔斯二世任命为第一任

皇家天文学家。与学会会议的严肃氛围相比，咖啡馆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更为轻松的环境，这种环境更适于讨论、思考和沟通。

胡克的日记中举例说明了在咖啡馆的讨论中大家是如何交流的。一次，胡克和雷恩在“男人咖啡馆”碰头，他们就弹簧的特性互相交换了意见。“我们谈论了很多关于弹簧运动演示实验的问题。他告诉我他的一个关于晴雨计的想法，我告诉他我的另一个想法……我向他讲述我的哲学弹簧秤……他为我解释他的机械杆秤。”另一次，胡克和朋友在圣·顿斯坦咖啡馆交流药物疗法的配方。这些讨论使科学家们得以验证一些不成熟的理论和想法。但胡克因在讨论中常常妄自吹嘘、咄咄逼人和夸大其词而恶名在外。一天，在盖拉维咖啡馆与胡克争论过后，弗拉姆斯蒂德便愤愤地抱怨道：他“早就发现自己天生就有游刃有余地反驳别人的本事，连想都没想，他就用未经证实的推论来反击你”。而胡克则称：“他的谣言真让我忍无可忍，他总试图说服别人，让大家都以为我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只有他才懂。”

但胡克在咖啡馆的夸夸其谈的确是不明智的，后来出版的《科学的革命》一书就是因此而起。1684年1月的一个晚上，胡克、哈利和雷恩三人又在争论不休。他们谈着谈着就谈到了引力

理论。这是令当时的科学家绞尽脑汁、思考了很久了一个题目。哈利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发问：“行星轨道的椭圆形是否与引力变化一致？”胡克紧接着就接过话来：“就是那样，反比—平方定律（引力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足以说明行星的运动规律了。”他还说他已经用数学方法证明了这一点。但雷恩却怎么也不相信他的话，因为他自己也试过用数学方法证明，但并没有得出胡克所说的结果。后来，哈利回忆道：雷恩提出“要给胡克和我两个月的时间来向他证明这一点，如果谁证出来了，他才心服口服，并且送给这个人一本价值40先令的书。”但哈利和胡克都没能证出来，因此，那份奖赏也就一直未能兑现。

几个月后，哈利来到牛津大学拜访了另一位学界同僚，艾萨克·牛顿。一想起在咖啡馆与胡克和雷恩进行的那场争论，哈利便问牛顿同样的问题：反比—平方定律是否能解释行星轨道的椭圆现象？和胡克的反应一样，牛顿也称自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当哈利要求他拿出实际证据时，牛顿当场并没能证明出来。哈利离开后，牛顿依然对这个问题念念不忘，他开始埋头钻研。11月，牛顿派人给哈利送去一张纸，上面详细论证了反比—平方定律确实能解释行星轨道的椭圆现象。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张纸不过是一场

重大变革的序曲。哈利的问题让牛顿找到了动力。他开始着手整理自己多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并将它们集结成册，出版发行，这就是科学发展史上最伟大的一部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出版于1687年。牛顿在书中详细阐述了万有引力定律是如何解释万物运动的，从落地的苹果，到行星的轨迹，万物皆如此（当然在今天看来，书中的理论并不一定都正确）。通过这本书，牛顿最终推翻了古希腊人毫无根据的揣度，为物理学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牛顿用理理解读了宇宙，为科学的发展带来了历史性的变革。直到今天，牛顿依然被人们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

胡克则坚持说：几年前他和牛顿通信时，早已将反比—平方定律的想法告知了牛顿。1686年，《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一卷提交给英国皇家学会。随后，胡克就在一次咖啡馆讨论中大肆宣扬，说当年是他给了牛顿灵感，但在场的科学同僚都没把他的当一回事。因为，在咖啡馆里提出假说是一回事，用实验推理证明假说的正确性又是另外一回事，二者之间虽只有一步之遥，但却是天壤之别。也许这个想法的确是胡克最先想到的，但他并没有将他的想法整理出来，提交给皇家学会。而且大家都知道胡克向来喜欢标榜自己，说什么都是自己最先想到的（尽管很

多时候的确是他先想到的)。哈利在给牛顿的信中写道：“会议结束后，胡克先生就来到了咖啡馆。他竭力争辩说那是他的创意，是他给了你最初的提示。但我发现没人相信他的话。大家都认为你才算是这个理论的创始人。”虽然胡克提出抗议，但咖啡馆自有公断。直到今天，牛顿依然是世人公认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创始人。

17世纪末期，通过伦敦咖啡馆传播科学知识的方式已经面貌一新，变得更加系统化。1698年，圣保罗大教堂附近的海事咖啡馆举行了一系列数学学术讲座。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术讲座都选择咖啡馆作为集会地。詹姆斯·霍奇森从前是弗拉姆斯蒂德的助手。在望远镜、显微镜、棱镜及液压机等先进设备的帮助下，霍奇森后来成为伦敦最著名的科普学者之一。他对人们许诺：他的有关自然哲学的讲座会为人们打下一个“最坚实、最可信的知识基础”。讲座中，他还会亲自演示推导气体的性质、光的性质及一些最新的天文学领域和微观领域的发现。霍奇森私下也会教授一些课程，而且他还出版了一本航海方面的书。与前类似，针线大街上的天鹅咖啡馆是数学和天文学讲座的集会地。南沃克大街上有一个家庭咖啡馆，这个家庭的成员既教授数学，出版航海方面的书籍，又出售科学仪器。在一个出现日食的日子里，海事咖啡馆和纽扣咖啡馆还特意联

手，同时举办了两场别开生面的天文学讲座。

这些咖啡馆讲座既满足了人们对科学知识的诉求，又为商家带来了不少经济效益。商人和水手们发现，科学能够推动航海事业的进步，继而推动商业的发展；而科学家们也急于向世人证明：他们发现的那些自然的奥秘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正如1703年一位英国数学家所观察到的那样，“数学成了焦点，商人、水手、木匠及测地员纷纷把注意力投向它”。企业家和科学家携手合作，在航海业、矿物开采业及制造业共同探索新发现，创造新发明；他们开拓创新的成果为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而使科学研究和商业发展和谐统一的地方正是咖啡馆。

勇于创新和实践的咖啡馆精神也感染了金融界。在投资业、保险业和合资经营方面，不断有新的理念涌现出来。虽然咖啡馆中策划的事业并不都是一帆风顺，但成功的例子也有不少，最为著名的案例发生在17世纪80年代爱德华·劳埃德在伦敦开设的咖啡馆。这家咖啡馆后来成为船长、船主及商人们的集会地，他们纷纷到这里来打听航海方面的信息或来参加船只和货品的拍卖会。于是，劳埃德便开始对这方面的信息进行搜集和整理。他还雇用了一些外国人组成一个信息网，定期以业务通讯的形式向他汇报国外的消息，然

后他将这些手写的报告进行整理，印制成册，寄送给客户。劳埃德的咖啡馆是船主和保险商的天然交易场所。一些保险商们开始在这里租固定的位子作摊位。到1771年，在这里租固定位子的商家已达79家之多，他们组织建立了“劳埃德商会”。这个商会后来发展成了今天世界上一流的保险市场——伦敦劳合社。

咖啡馆也充当过证券市场。起初，证券交易和其他货品交易都是在皇家交易所进行的。但随着注册公司的逐渐增多，贸易活动也增多了。于是，政府通过了一项法案，强行限制证券经纪人的数量和证券交易活动。为此，证券经纪人联合罢工，以示抗议。他们放弃了交易，转战附近的咖啡馆，其中一家便是乔纳森咖啡馆。1695年，一家经纪公司的广告语写道：“约翰在乔纳森咖啡馆进行交易，票券如愿收放，诸事皆顺利。”

随着贸易量的增加，咖啡馆贸易非正式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那些有不良付款记录的经纪人被乔纳森咖啡馆拒之门外；虽然这并不能阻止他们去别处交易，但至少也意味着他们在商业上已经一败涂地。拖欠贷款者的名单被公布在一块黑板上，以防止几个月后他们又混迹其中。然而，问题依然存在。为了彻底解决问题，1762年150名经纪人共同组成了一个团体，他们与乔纳

森咖啡馆的老板达成协议：为了回馈客户们对咖啡馆的支持，咖啡馆主决定允许客户们使用咖啡馆的附属建筑，并授予他们驱逐不诚实的经纪人的权利。但后来一个被驱逐的经纪人辩驳道：咖啡馆是公共场所，任何人都有权利进入。于是，他们的协议也只好不了了之。1773年，一伙交易商从乔纳森咖啡馆撤台，一同迁往一座新楼，他们称这座新楼为“新乔纳森”。但这个名字启用不久，《绅士杂志》就报道说：“不应该称它为‘新乔纳森’，而应称它为‘证券交易大楼’。”——这便是后来的伦敦证交所。

这段时期，关于金融行业的创新理念层出不穷，如股份公司、股份买卖、保险业的发展、政府债券的发行，等等。这些创新和尝试推动着英国的金融业不断向前发展。最终，伦敦取代了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这段历史就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金融革命”。金融革命的起因主要有两点：扩张海外殖民地要消耗大量财力用于军用开支，这迫切要求金融业募集钱款；咖啡馆浓厚的文化氛围和它所提倡的自由精神也为金融业创新理念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可谓是金融界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书中提出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概念。亚当·斯密认为，政府鼓励贸易、促进发展的最好方法就是采取不干涉政策。

该书的大部分篇章都是在“不列颠咖啡馆”中完成的。当时，这家咖啡馆是苏格兰知识分子的集会地，斯密也经常光顾这里，并将这里作为他的通信地址。在咖啡馆写《国富论》一书时，斯密还经常将部分篇章拿给在场的同行阅读，并请他们予以批评指正。就这样，伦敦的咖啡馆成了铸就科学革命和金融革命的大熔炉。两大革命塑造了现代世界，而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伦敦的咖啡馆功不可没。

咖啡杯边的革命

在英国进行金融革命的同时，法国也在酝酿另一场革命。18世纪，启蒙思想开始在一些法国思想家的脑海里萌芽，如伏尔泰。伏尔泰是法国哲学家、讽刺作家，他曾将新科学理性主义传播到社会学和政治领域。1726年，他因一句玩笑话得罪了一位贵族，被关进巴黎的巴士底狱，后来被驱逐到英国。在英国避难期间，他苦心钻研牛顿的科学理性主义和哲学家约翰·洛克的经验主义。就像牛顿以“力学三大定律”重建物理学大厦一样，为了重建政治哲学大厦，洛克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洛克认为，人生来平等，人性本善，人人都有权利追求幸福。任何人都无权干涉

别人的生活，损害别人的健康，妨碍别人的自由或侵犯别人的财产。在这些激进思想的激励下，伏尔泰回到法国，将自己的思想诉诸笔端，集结成册，这就是《哲学通信》。该书以讽喻的笔调、犀利的言辞，大肆批评法国的政府体制。结果，出版不久就遭禁了。

遭到同样命运的还有丹尼斯·狄德罗和让·达朗贝尔编辑的《百科全书》（第一卷出版于1751年）。为该书撰文的作者包括了当时法国最著名的思想家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斯鸠。这几位思想家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的思想都深受洛克的影响。看了此书撰稿作者的名单，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人们把这本书看作启蒙思想的权威概述。该书提倡一种建立在科学宿命论基础上的理性独立的世界观，痛斥对教会权力和法律的滥用，因此激怒了宗教势力。不久，教会就成功地说服了政府，对这本书下了禁令。尽管如此，狄德罗依然平静地继续着自己的工作，并于1772年最终完成了这本著作。接着，他就秘密地将这本书的28卷一卷不少地送到了发行商的手中。

和在伦敦的情形相似，巴黎的咖啡馆也是知识分子的集会地，而且逐渐发展成启蒙思想的中心策源地。事实上，《百科全书》的编撰是狄德罗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完成的。这家咖啡馆叫

作摄政咖啡馆，狄德罗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办公室。他在回忆录中记述道，妻子每天早上给他9个硬币来支付他喝一天咖啡的费用。然而，法国与英国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咖啡馆的属性。在伦敦，咖啡馆是无拘无束、自由谈论政治的空间，有人甚至把咖啡馆当作政治党派的大本营。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曾经说他坚信，“接近任何达官显贵都不如从咖啡馆政客那里得到的消息来得真实”。创立于1659的“米勒咖啡馆”就是一个叫作“业余议会”的讨论小组定期聚会的地方。

佩皮斯发现：“这家咖啡馆里进行的辩论是他所听到的或希望听到的最具原创性、最具智慧、最具热情的言论，连议会都对此望尘莫及。”“辩论过后，他们就用一个‘木制的神谕箱’——或称‘投票箱’（当时，投票箱还是个新鲜事物）——进行投票。”难怪游访伦敦的法国人普雷沃斯特称：“伦敦的咖啡馆是英国自由权的席位；在那里，任何刊物，无论是支持政府还是反对政府，你都有权阅读。”

巴黎的咖啡馆则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咖啡馆遍布巴黎的大街小巷。到1750年时，已有600多家，而且每家咖啡馆都与某个行业或领域相关。普各伯咖啡馆和巴那斯咖啡馆是诗人和哲学家集会的地方，这里的常客包括卢梭、狄德罗

及美国科学家、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普各伯咖啡馆，伏尔泰有自己喜欢的座位。据说，他一天能喝下12杯咖啡。英国咖啡馆聚集了演员；亚历山大咖啡馆聚集了音乐家；军人咖啡馆聚集了军官；而盲人咖啡馆除了出售咖啡以外，还充当妓院。与贵族们经常光顾的沙龙不同，法国的咖啡馆对所有人开放，包括女人。据18世纪的一篇文章记述，“穿着体面的男男女女都可以进入咖啡馆。他们当中有形形色色的人：镇上来的男人、卖弄风情的女人、乡下佬、记者、法官、党派人士、酒鬼、赌徒、食客、寻求爱情或商业契机的探险者、年轻文人——总之，不可胜数，什么来路的都有。”表面上看来，启蒙思想家们所崇尚的平等社会似乎在咖啡馆里实现了。但实际上，信息的流通是很不自由的，任何口头或书面的信息传播都在政府的严格监控下。在对媒体内容的严格限制和独裁专断的资本主义体制下，法国的信息源远比英国和荷兰少得多。在这样的压制下，法国出现了一种手写的巴黎闲话通讯。这种通讯录由十几个抄写员抄写而成，然后被寄送到巴黎内外的读者手里（由于不是印刷品，无须经政府批准）。自由媒体的缺失意味着和咖啡馆的闲言碎语挤在一张纸上的诗歌也会成为巴黎人重要的新闻来源。此外，咖啡馆的顾客们还要谨言慎行，因为，咖啡馆里到处都暗藏着政府的耳

目。如果有人说一句反政府的话，那么他很可能被关进巴士底狱。巴士底狱的档案馆里存有上百份关于咖啡馆不良言论的报告。18世纪20年代的一份报告中有如下的记述：“在富瓦咖啡馆，一个人说国王有一个情妇，名叫贡朵，她是个美丽的女人，是诺阿耶公爵的侄女。”1749年的一份报告写道：“让·路易斯·勒克莱尔在普各伯咖啡馆说，从来没有这么差劲的国王，连法院和政务要员都能摆布他，这真让人觉得恶心。”

虽然启蒙运动推动了文化进步，但陈旧的体制严重地阻碍了法国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发展。这种悖论在法国的咖啡馆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贵族和牧师只占总人口的2%，却占有社会的大部分财富，而且这些人又无须缴税，于是纳税的重担就落在了其余人的肩上。这自然引起了多数人的不满，尤其是贫苦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们恨透了将各种权力和特权牢牢握在手中的贵族势力。在咖啡馆里，激进的新思想与严酷的社会现实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由于在独立战争中支持美国，法国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与此同时，咖啡馆逐渐成为革命种子萌发的中心地带。据可靠记载：1789年7月的一天，“咖啡馆里人满为患，门口和窗前都被人堵得水泄不通，大家都竖起耳朵，全神贯注地听一位演说家的演讲。演说家站在桌子（或凳子）上，情绪激昂地慷慨陈

词；听众们如饥似渴地倾听着每一个句子，每当提到用武装暴力反对政府时，现场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如果不是亲历，你很难想象其场面的热烈和震撼”。

在公众的激昂情绪平静之后，社会知名人士齐聚一堂，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解决金融危机的办法。但由于参加会议的主要是牧师、贵族和地方行政官，这次会议并没能为金融危机开出现实的处方。于是，国王路易十六召集议会——这是150多年来，国王第一次召集议会。但凡尔赛会议也没能解决实际问题。国王一气之下，解除了他的金融大臣雅克·内克尔的职务，并开始召集军队。1789年7月12日下午在富瓦咖啡馆，一个叫卡米尔·德穆兰的年轻律师最终点燃了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人们聚集在皇家宫殿附近的花园，抗议国王把雅克·内克尔解职。在当时，雅克·内克尔是政府部门唯一一个为民众所信赖的大臣。革命者在一旁极力煽风点火，让群众觉得军队很快就要来镇压他们。德穆兰斜倚在咖啡馆外的一张桌子旁，挥动着手枪，对着人群高呼：“拿起武器，市民们！拿起武器！”他的呼声响彻四方。霎那间，巴黎陷入了一片混乱。两天后，义愤填膺的群众攻占了巴士底狱。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随后发现：“那些整日聚集在普各伯咖啡馆的人们用敏锐的洞察力在他们饮用的黑色饮料深处看

见了革命年代的光明。”一切都从这里（咖啡馆）开始。



1789年7月12日，德穆兰在富瓦咖啡馆外演讲。

理性饮品

今天，饮用咖啡及其他咖啡因饮品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当年咖啡的引入带给世人的影响是多么巨大，世界上第一间咖啡馆带给人们多少新奇，这一个个历史片断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与这些杰出的历史“先辈们”相比，现代的咖啡馆黯然失色。但在这沧桑剧变的数百年

间，依然有些东西始终未变。人们依然是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商讨要事，互相交流，开拓创新。从邻里聚会到学术会议和商务会议，咖啡始终都伴随着我们，它促进了人们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又免除了酒精饮料所带来的不必要的困扰。



18世纪晚期巴黎的一间咖啡馆。

如今，最能体现咖啡馆文化精髓的场所，其一是网络咖啡吧和无线网络的集中使用区，这些地方为信息的交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二是咖啡连锁店，特别是这些场所被来来往往的上班族当作办公和聚会的地点时。作为当代咖啡文化中心的西雅图不但是星巴克咖啡连锁店的故乡，而

且也是世界上一些最大的软件公司和网络公司的所在地，这一事实难道不令人惊讶吗？将咖啡与创新、理性及网络联系在一起——再加上一层革命色彩——这是一段悠长的历史。

茶与日不落帝国

Tea and the British Empire

茶之帝国

吾宁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

——中国古语

感谢上帝！没有茶，世界将暗淡无光，
毫无生气。

——悉尼·史密斯，英国作家
(1771~1845)

征服世界之饮

由于英国迅速扩张，建立了庞大的海外殖民地，1773年帝国官员乔治·麦卡特尼爵士发表了著名的论断，将大不列颠王国描述为“日不落帝国”。在其鼎盛时期，英国占有全世界1/5的土地和1/4的人口。从18世纪中叶起，虽然因美国独立而失掉了在北美的殖民地，英国势力范围仍急剧膨胀，控制了印度和加拿大，并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建立了新的殖民地，替代荷兰成为欧洲与东

方海上贸易的霸主。成为世界第一个超级大国以后，英国创造性地采用了新的生产设备。工人们集中在机器轰鸣的大工厂里，由蒸汽机带动的设备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运转，节省了大量劳动力，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些创举，我们今天称之为“工业革命”。

此时，一种新的饮料（至少对欧洲人是全新的）将殖民扩张与工业革命连在了一起，并与英国人结下不解之缘。时至今日，每每提及这种饮品，都不由让人想起大英帝国。它，就是茶叶。茶叶帮助欧洲扩大了对东方的贸易。巨额的利润驱使英国在印度建立了东印度公司。这是一个名义上的贸易机构，实际上却逐渐成为英国控制东方的殖民政府。起初，茶是一种贵族饮品，后来逐渐为工人阶层所接受，成为机械化工厂里工人的必备饮品。大英帝国又叫日不落帝国，由于世界各地都有她的殖民地，可以说无论何时都有她的国民在喝茶。

在不列颠王国，上流社会有风雅的下午饮茶习惯；工人阶层也有吃茶点的休息时间。饮茶完美地契合了英国作为文明国度及工业强国的形象。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典型的英国人饮品，最初是要花高价花大力气从中国（一个对欧洲来说懂得种茶和制茶过程的民族，一个位于地

球另一端的神秘而辽阔的国度）进口的。在广东码头，英国商人将一箱箱茶叶装船运走。尽管如此，茶还是成了英国文化的一个核心部分，茶哺育了辽阔的中华大地后，又征服了许多新的领土：先是英国，之后遍及世界，成为除水之外地球上最为普遍的饮品。可以说，茶的故事就是关于殖民化、工业化和称霸世界的故事。

茶文化的兴起

传说中国上古的第二帝王神农氏泡了第一杯茶，发明了农耕和草药（据说他前面的第一位皇帝发明了火、烹调和音乐）。一天，神农氏在用野生茶枝烧水时，突然吹过的一阵风，把茶枝上的叶子吹到水坛里，结果他发现泡了茶树叶子的水清香润脾，回味无穷。随后，他写了一篇旨在介绍多种草药用途的医学文献《神农本草经》，认为泡过茶叶的水能“润津止渴，提神醒脑”。事实上，茶并非是如此古老的中国饮品，关于神农氏的这段故事应该是后人编进去的。最早的《神农本草经》版本（成书于公元25年~220年的东汉）当中没有提到茶，有关茶的文字是在公元7世纪才加进去的。茶，学名叫*Camellia sinensis*，是由生长在喜马拉雅东部丛林（今中印

边境)的一种常绿灌木的干叶、花蕾、花瓣沕泡而成。早在史前时期,人们就已注意到咀嚼茶叶可以提神醒脑,千百年来还用嫩茶叶汁涂擦伤口促进愈合。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煮茶时放入葱、姜等做药膳;泰国北部游牧民族将茶叶蒸或煮熟,攢成球,然后就着盐、蒜、动植物油、鱼干吃。所以说,茶的药用和食用历史比其饮用历史更长。

究竟茶叶在何时又是如何传入中国的,尚是个未解之谜,但茶叶的传入似乎与佛教徒有关。佛教是公元前6世纪由乔达摩·悉达多在印度创立的宗教。佛教徒和道教徒都认为茶有助于打坐参禅,能使人身心合一,提神醒脑并解除疲劳(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这是咖啡因作用的结果)。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的道教创始人老子认为,茶是延年益寿的必备佳品。

中国对茶最早的明确记载是在公元前1世纪,也就是传说神农氏发现茶叶2600年后。早期的茶仅用于药饮和宗教用途,直到此时,茶才成了一种家庭饮品。当时有本名叫《童约》(王褒著)的书,详细描述了如何选茶、泡茶和斟茶。到公元4世纪,饮茶风靡中原,采集野生茶叶已不能满足需求,人们开始栽培茶树。到了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唐朝(公元618年~907年),茶已

经遍及大江南北，成为全国性饮品。

唐朝时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国力最强、人口最多的国家。全国人口在公元630至755年期间增长两倍，超过了5 000万，都城长安（今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约有200万人口。大唐对外开放，积极吸收先进思想，多民族文化水乳交融，长安成了当时的文化中心。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中国与印度、日本和朝鲜的交流空前繁荣。中国对外出口丝绸、茶叶、纸张和瓷器。土耳其、波斯的服装、发式和马球运动则传到了中国，此外还有印度的食物，中亚的乐器、舞蹈、羊皮袋装葡萄酒等。同时，在这样一个活跃的、多元化的大都市环境下，中国的雕刻、绘画和诗词都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唐代的经济繁荣、人口剧增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饮茶习俗的盛行，因为茶叶具有很强的抗菌消炎的功效。现代研究发现，茶叶中的单宁酸能杀死引发霍乱、伤寒、痢疾等疾病的细菌。所以，即便泡茶的水没有煮沸，饮茶也比以前饮用的由大米或小米酿成的米酒更加安全。此外，茶用干叶一沏即成，简单方便快捷，不像米酒那样容易变质。其实，茶就是一道简单有效的净水工艺，轻易间即可大大减少因污水感染疾病的概

率，降低婴儿死亡率，延长人的平均寿命。



中国的茶叶加工图。将茶树叶加工成茶程序烦琐复杂，整个过程完全由手工完成。

茶叶还产生了更直接的经济影响。公元7世纪，随着茶叶贸易在规模和价值上的增长，福建茶商每次交易都需大量钱款，很不方便，于是首先发明并使用纸币。而做成砖形的茶本身也用作流通货币。由于茶不仅轻而且不占空间，一旦需要还可食用，因而非常适合做货币。纸币有个缺点，就是离都城越远价值就越低；而茶叶越是偏远价格就越高。所以直到现代，中亚一些地区还在使用砖茶作为货币。

公元780年，历史上首次征收茶税；同年，道家著名诗人陆羽出版了《茶经》，这些都充分反映了饮茶在唐代的兴盛。受茶商之托，陆羽详细描述了茶的栽培、加工、煮泡、品饮之法。他撰写了大量有关茶叶的书籍，凡与茶相关，事无巨细，无一遗漏。这其中包括各种茶叶的功效，何种水最适合沏茶（“拣乳泉、石池慢流者上”，“井水下”）。甚至列出烧水的步骤，水要煮至“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三沸不可用，谓之“水老不可食也”。据说陆羽的识水能力非常强，他能够品出水的来源，甚至能说出取水的河段。陆羽最大的贡献就是将仅用于止渴的饮茶变为文化和修养的象征。能品茶、会评茶，尤其会识别茶叶的人非常受人尊敬。烹茶是一种荣誉，主人要亲自做。一个人会因不善茶道而羞耻。“斗茶”、“茶会”在宫廷里面十分盛行。在“斗茶”、“茶会”上，皇帝要饮用用专门的泉水沏泡的极品茶，后来发展成每年向皇帝进献“贡茶”的礼俗。

茶始于唐而兴于宋（公元960~1279年）。但到了13世纪蒙古人入主中原后，皇室及官员中的饮茶之风逐渐衰落。蒙古人本是游牧民族，以在广袤的草原上牧羊放马为生，他们在成吉思汗及子孙的领导下，建立起历史上版图最大的连片帝

国。它东起朝鲜，西到匈牙利，南至越南，覆盖大片亚欧大陆的版图。蒙古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它的传统饮品是马奶酒，该酒由马奶在皮囊里搅拌发酵、将乳糖转化成酒精而成。难怪当时已在中国朝廷生活多年的威尼斯商人、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根本没写茶叶，只提到当时流行给朝廷进献“贡茶”（但他提到了马奶酒，并将其描述为“颜色乳白，味同红酒，甘醇可口，营养丰富”）。元朝的统治者依然延续着自己的传统，对中原的饮品兴趣索然。据说蒙古东部的统治者忽必烈让人在他中国式寝宫的庭院里专门种植草原上的草，他还只喝用白马的奶特制的马奶酒。

忽必烈的哥哥蒙哥可汗为彰显蒙古族文化内涵和多元化，在蒙古帝国首都哈刺和林建了一个银制的喷泉，四个喷头分别喷出来自中原的米酒、波斯的葡萄酒、北亚欧的蜂蜜酒以及蒙古的马奶酒，唯独没有茶。可惜这个喷泉所代表的称霸四方的蒙古帝国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历史兴替的规律，公元14世纪被明朝（公元1368~1644年）所取代。茶作为增加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的饮品，重又博得大众的热爱。烹茶、饮茶程序也变得越来越细致，由陆羽早年所倡导的至精至细原则得以贯彻实行。在宗教渊源方面，可以说茶是作为一种轻身（身体）爽神（精神）的养生佳品

而出现的。

饮茶始于中国，但饮茶礼仪却在日本得以发扬光大。早在公元6世纪，日本人就开始饮茶，但直到1191年才有一个名叫弁丹（丹尔圣一）的和尚把中国种茶、采茶、制茶、烹茶方面的最新知识引入日本。他还专门写了一本介绍茶叶对身体各种益处的书。当时日本的幕府将军源实朝染病卧床，弁丹用自己种植的茶为他理疗，效果甚佳。于是这位将军成了一位饮茶的忠实信徒，朝上朝下、宫内宫外，他全力推广茶饮。到公元14世纪，饮茶在日本社会各阶层都十分流行。由于日本气候非常适宜茶树生长，举国上下普遍开始种茶，即使很小的庭院，也会种上几丛，以备不时之需。

日本茶道是一套精致、神秘、奇异的艺术。观赏一整套茶道仪式需要一个多小时，从中可以透视品茶的情趣、茶艺的博深。通过茶叶的品质、泡茶用水、冲泡方法、茶具的选用、品茗环境、场所陈设、敬茶礼节等来感受这门雅俗共赏的生活艺术。茶道的每个程序都很讲究：需用长柄竹勺将泡茶之水由一特制的陶罐转至另一茶盅（公道杯），用特殊的茶匙拨取定量茶叶，用搅拌匙轻搅。陶罐、茶匙要由方丝帕擦拭，茶盅盖要有茶座来托放等等。主人应按规定的程序和细

节，按部就班地操作，物归其位。若主人亲拢燃柴、于室外花园内施此茶道礼仪，则可谓最高境界。

日本17世纪的茶道巨匠千利休大师说：“若茶味道欠佳，茶具品位不高，或者茶树、假山之位置、茶园之布局有失水准，倒不如回家自斟自饮。”千利休大师对茶道进行了改革和简化，认为茶道的根本精神就是“和、敬、清、寂”四字，认为饮茶时彼此不可以谈论世俗的话题，这与欧洲宴会约定俗成的风格有某种相似之处。日本茶道是茶文化的巅峰，它从南亚的饮品身上汲取灵感，饱满地注入文化与宗教影响，并融合了几百年延续下来的风俗礼仪，最终成就了一方文化。

茶叶传入欧洲

16世纪初，第一批欧洲商船抵达中国的港口。那时，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世界上最强盛、最伟大的民族：她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比任何欧洲文明都更古老、经久不衰。她自信这个神圣的国度处在世界的中心，文化艺术成就无人能及，其他种族都是野蛮人，是“洋鬼子”，就算他们一心效仿，最终还是东施效颦、谬以千里。欧

洲有的技术中国都有，甚至更先进，欧洲船只上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还都是中国的发明。葡萄牙航海家绕过马来半岛的马六甲海峡，本想在东方发上一笔，结果遇见自给自足、什么也不缺的中国，碰了一鼻子灰，才不得不改变主意。

葡萄牙人后来同意向中国皇帝上缴贡品来获取贸易权，并与中国保持了数年零星的贸易联系。其实中国人对欧洲产品并没有兴趣，他们只乐意拿丝绸、瓷器换金银。最终在1557年，中国朝廷允许葡萄牙人在广州湾的澳门建立商埠，承运进出口的一切货物。这样中国政府不但可以征收关税，而且因为排除了其他欧洲国家与中国的直接贸易，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中国与外国的接触，当荷兰人16世纪末到达东印度时，需要通过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才能买到中国的产品。

欧洲人16世纪50年代开始注意到茶，但早期的欧洲商人并未将茶叶运往欧洲。葡萄牙水手最初可能将少量茶叶以个人名义带回到里斯本，直到1610年荷兰船队才首次把茶叶当作商品运到欧洲，茶叶这时还很稀罕。到17世纪30年代，茶叶从荷兰传入法国，到50年代传入英国。早期到达欧洲的是中国人自己一直饮用的绿茶，到明朝时人们将绿茶的“杀青”改成了“晒青”，将嫩茶树叶隔夜氧化，使成茶品质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制成

了红茶。不过，红茶的来龙去脉至今仍不清楚。诸多原因使得红茶逐渐主导了对欧洲的出口市场，加之当时中国人都喝绿茶，很少有人喝红茶，所以他们认为生产出来的红茶只适合给外国人饮用。有趣的是，如同不了解茶叶的来源一样，欧洲人错误地将红茶和绿茶当作两种完全不同的茶叶。

虽然茶比咖啡早几年引入欧洲，但由于十分昂贵，整个17世纪期间，茶对欧洲人的生活影响没有咖啡深刻。最初茶被荷兰人视为一种奢侈的药用饮品，但从17世纪30年代起，许多人开始争论它对健康到底有多大帮助。起初是丹麦国王的一位德国籍外科医生西蒙·鲍利反对饮茶（以及另两种新潮的热饮咖啡和可可）。他于1635年发表了一本小册子，承认茶叶确实有一些药效，但远不及其危害来得多。他认为，从中国运来的茶叶在漫长的运输过程中已经毒化，这样就“加速了饮茶者，尤其是超过40岁的饮者的死亡”。鲍利不无自豪地夸耀，自己“在倾尽全力阻止从中国向欧洲进口茶叶的疯狂之举”。

一位荷兰医生尼古拉斯·迪尔克斯却持有截然相反的意见，即茶叶万能论。他在1641年说：“这种植物简直无与伦比。那些坚持饮茶的人都能身体健康、无病无疾，活至高龄。”另一

位荷兰医生庞德戈博士更加热衷于提倡人人饮茶。在一本书中他建议人们每天要喝数杯茶，“我建议我们国家的所有人都饮茶！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天都喝茶，如果有条件最好每小时都喝。最初可以一天喝10杯，（然后）逐渐增加——以胃的承受力为限”。有人病了，他建议病人每天至少喝50杯茶，多多益善，上限是200杯。鉴于他对促进茶叶销售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他褒奖有加，不过很有可能是公司先让他写这本书。尽管如此，他并不赞同当时所流行的饮茶加糖的做法（当时一些医学权威认为食糖有害身体健康）。

欧洲人的另一个饮茶习惯就是加奶。早在1660年，一个英国的茶叶广告就宣称在茶的诸多药效中，奶茶（茶添加牛奶和水后）“具有增强胃肠功能，减少能量消耗，大大减轻肠绞痛症状”之功效。1650~1700年间，饮茶在法国封建贵族阶层风靡一时。他们将牛奶与茶水兑饮，不但味道香醇，还可降低茶水温度，以免饮者烫伤，保护陶瓷茶具。遗憾的是茶很快就被咖啡和可可取代，失宠于法国。最终，还是英国，而不是法国或荷兰成为最热爱饮茶的欧洲国家，并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

英国人的饮茶情结

毫不夸张地说，18世纪初的英国几乎没有人喝茶，可到了18世纪末几乎全国上下人人皆在饮茶。1699年，英国官方的茶叶进口量大约是6吨，一个世纪之后就达11 000吨，每磅茶叶的价钱降到了100年前的1/20。这个数字在1784年茶叶进口税大幅下调之前，如果算上走私茶的话，大概还得再翻上一番。另一个因素就是普遍掺假，从进口的茶叶开封到最终售出，商家在每个环节上几乎都有掺假行为：他们在茶叶里掺上经化学着色剂伪装的柳树叶、锯末、花瓣，还有更荒唐的，据记载有一次竟掺入了羊粪。所以，实际消耗量比进口量要多出很多。一方面，经过数月漫长的海上运输，红茶比绿茶更容易保鲜；另一方面，基于掺假的原因，红茶越来越受欢迎，因为许多做假绿茶的化学药剂有毒，而假红茶即使掺假也还相对安全。于是红茶开始取代口味清淡、苦味较轻的绿茶，红茶加上糖和奶，品起来则更加齿颊留香。

不管当时走私茶和掺假茶的比例有多大，到18世纪末，英国上下无论贫富贵贱几乎每人每天都可以喝上一两杯茶。有人在1757年注意到，“夏日里，经常可以在里奇蒙的某个胡同看

到乞丐端着杯子在喝茶，修路工人在喝茶，赶灰渣车的车夫在喝茶，还可以看到晒干草的工人在买茶”。怎样解释英国人如此钟爱饮茶呢？原因有多个，且相互关联。

1662年，查理二世与葡萄牙国王约翰四世的女儿凯瑟琳公主结婚。凯瑟琳的嫁妆包括了丹吉尔和孟买的贸易站，即与葡萄牙的海外贸易权，这就意味着他们有机会买到茶叶，从而赚取更多的黄金。凯瑟琳酷爱饮茶，她将用小杯啜饮的习惯带到了英国皇室（据史料记载，那杯子“不到顶针那么大”），迅速成为贵族间流行的一种时尚，饮茶之风席卷英国朝廷。1663年，诗人埃德蒙德·瓦勒为凯瑟琳写了一首生日诗“茶之颂”，高度赞颂了她对英国的两大贡献：茶以及在东印度进行贸易的机会。

最尊贵的王后，最好的草药
属于我们这个勇敢的民族
我们赞颂您打开的那扇大门
通向太阳升起的帝国
那里有珍贵的种植
茶乃缪斯之友

去浮清躁，给灵魂以宁静

心灵以慰藉

向吾辈之王后陛下致敬！

饮茶在英国盛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东印度公司。它垄断了从东印度到英国的商品进口权，尽管它起初没有直接从中国进口货物的权力，但该公司的账目显示，17世纪60年代它通过荷兰开始进口少量的“好茶”，进贡国王来博取国王的欢心。查理国王很喜欢茶和其他的贡品，逐渐给予东印度公司越来越大的权力，包括确认领土权、货币发行权、保有军队权、营建联盟权、对外宣战或求和的权力，以及司法豁免权等。在18世纪，一个普通的贸易公司竟逐步发展成为英国在东方的代言人，成为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商业组织。正如苏格兰经济学家、作家威廉·普莱费尔1799年所写：“东印度公司从一个有限的商业小团体摇身变成了东方的仲裁人。”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公司的培育和壮大，并获利于茶叶市场。



布拉甘扎的凯瑟琳，查理二世之妻，将饮茶习俗带入英国宫廷。

从17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东印度公司伦敦总部的董事们就以茶作为会议饮品。当时，茶叶是由船长和其他官员利用船上允许的私人空间夹带入境的。茶是一种理想的走私货，稀有而珍贵；1吨茶所能获取的利润抵得上数年的工资，而一个船长私运10来吨货并不稀奇。私运茶叶可能刺激了最初的茶叶消费，但1686年公司怕影响到自身微薄但仍在攀升的利润，一纸禁令中止了个人茶叶交易。

1669年，东印度公司首次以公司名义从东印度（爪哇万丹，即今印度尼西亚）进口了一批茶叶。此后，茶叶才逐渐在较大范围内开始供应。起初公司从亚洲进口的主要是辣椒，其次是低廉的纺织品，茶叶只是附带的商品用作搭配。由于英国不生产茶叶，所以茶叶进口也就不会冒犯国内商家的利益，国内厂商都极力反对进口纺织品，要求公司多进口茶叶。茶叶的零售价格由于供货不稳定变化很大，最昂贵时在1660年是每磅6~10英镑，到1700年降到了4英镑左右，质量较差的也要1英镑。不过，那时一个贫民家庭的年收入也才20英镑，所以喝茶对很多人来说仍很奢侈，暂不能普及。到17世纪末，受到廉价咖啡的冲击，茶叶价格才有所下滑，但一杯茶的价格仍是一杯咖啡的5倍。

18世纪初，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建立了贸易站，可以直接从中国进口茶叶，于是英国茶叶进口量直线攀升，价格一路下跌，为茶叶走近更广大的民众创造了必要条件。1718年，茶叶取代丝绸成为英国从中国进口的支柱商品；仅1721年一年进口量就达到5 000吨。1744年一位英国作家写道：“加强与东印度的贸易交流，最明显的效果就是茶叶价格空前走低，低到连最拮据的劳动者都买得起。”茶叶进口量最大的时候曾占到公司贸易总额的60%，茶税占到政府收入的10%左右。对茶叶贸易的控制使东印度公司在政治上能够有很大的影响力，使政府颁布的法令有利于公司的利益：政府曾禁止从欧洲其他国家进口茶叶，降低茶叶关税以增加茶叶销量，扩大国内市场。茶叶掺假一经发现，会予以重罚。尽管如此，茶叶走私掺假现象相当普遍，这恰恰说明国内茶叶市场的巨大需求。此外，到1784年，在一系列战争均以失败告终后，一直以来挡在英国与亚洲贸易之间的荷兰，其所属的东印度公司于1795年破产。这样一来，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完全掌握了全球的茶叶贸易。

凯瑟琳公主给茶叶以名分，东印度公司给茶叶以入场券，而新的茶饮之法（包括家庭和公共场合）使茶叶成了社交的一部分。1717年，伦敦一家咖啡店的老板托马斯·唐宁在他的咖啡店旁开

了一家茶叶专卖店，专门向妇女出售茶叶。妇女不能去咖啡店买茶，那里是唯有男人才可以去的地方。可她们又不想让仆人去买昂贵的茶叶和其他日用品，因为这样等于把一大笔钱交给下人（从茶罐有盖上锁、由女主人保管钥匙可以看出，当时茶叶相当昂贵）。在唐宁的店里，妇女不但可以买到时尚流行的茶叶，还可像在家里一样立即一饱口福。有人曾说：“雍容的女士们拥向唐宁的茶店，只为花很少费用就可用小杯品尝这种令人愉悦的饮品。”唐宁还会根据女顾客的嗜好特别调配茶的口味。

熟谙茶饮之道，在家营造出文雅的饮茶环境能体现出个人的内涵与品位。英国精致的茶会与中国的茶宴、日本的茶道堪称异曲同工；当初的运茶之船又从中国运来了大量瓷器，使英国人可以手持瓷杯一品茶叶之妙。许多作家出书讲解如何煮茶，如何为不同身份的客人敬茶，饮茶食品如何搭配，以及客人又该如何感谢主人的盛情款待等等。茶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饮品，它成了一种新兴的午后餐。

饮茶在英国的另一个创新是伦敦大大小小的茶园。第一个茶园沃克斯豪尔于1732年开业：里面有彩灯点缀的甬道、四处可见的乐队、做各种表演的艺人，还有卖食品（主要是可以就茶吃的

黄油面包)的小摊。之后大小茶园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茶园的引人之处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高雅场所，也是接触异性的好地方。根据《绅士杂志》上刊登文章的讲述，在白管屋茶园，有男士“不小心”踩到了年轻女士的裙摆，于是主动邀请女士喝茶赔礼道歉；在另一家帕台农茶园，女士则先手出击，要求中意的男士请她喝茶。相比之下，咖啡馆在社会上的地位每况愈下。过去被咖啡馆排斥在外的女士们，现在对茶园尤其青睐。越来越多高档的咖啡馆主动转型，成为私人的男士俱乐部或商业机构。剩下那些档次低的，大多转向卖酒勉强支撑，与酒馆的差别越来越小。正如丹尼尔·笛福所写，这些机构“就是啤酒酒店，唯一不同的是咖啡馆里面的空气好些”。



1750年左右的一次英国茶会。文雅的饮茶礼仪成为内涵与品位的象征。

对于穷人来说，茶逐渐成为一种买得起的奢侈品和必需品，他们也许会在沏茶的时候做点儿手脚，少放茶叶多加水，重复沏泡叶子，但无论如何，最后是每个人都有了茶喝。18世纪中叶，佣人的工资中还会附加有特殊的茶叶补贴。1755年，一位游访英伦的意大利人曾说：“就连一般的女佣每天都要喝两次茶。”虽然茶叶漂洋过海，来自世界另一端，它却最终成了除水之外最低廉的饮品。19世纪初一个苏格兰人说：“我真为我们的商业和金融制度感到骄傲，从世界东方运来的茶叶与西印度群岛运来的糖遇到一起，竟然形成了一种比啤酒更便宜的饮品。”而且用热茶配凉食，感觉就像在吃热乎乎的一顿饭。有些人诋毁穷人喝茶，说穷人不该东施效颦，模仿富人，他们应该将钱花在更有营养的食物上。一位立法委员甚至建议禁止年收入在50英镑以下的人买茶。但正如18世纪的一位作家所言，事实是：“一旦穷人没有了茶喝，那么他们就只能喝清水、吃面包了。喝茶不是他们贫困的原因，而是极度贫困的必然结果。”凯瑟琳公主的饮品现在已经成为他们最后的选择。

在英国社会的上上下下，人人皆在饮茶。时尚、商业和社会风俗的变化在英国人对茶叶的认可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一点在18世纪末之前就有许多外国人已经注意到了。1784年，一位访问英国的法国人说：“喝茶在整个英国相当普遍……最卑微的农民也和富人一样一天喝两次茶，茶叶在此的消费量真是大得惊人。”一个瑞典游客发现，“若水是英国人生命的第一大组成成分，茶则屈居第二。所有阶层的人都喝茶。清晨，如果你漫步伦敦街头，就会看见车夫和工人围坐在一张张露天空支起的小桌旁，享用那醇香的饮品。”茶叶从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个国度款款而来，以其独特的口味和顽强的生命力扎根并生长在新的帝国。每当英国人举杯啜饮，感悟茶境，唇齿留香之时，就会想起他们日不落帝国曾是多么辽阔和强大。茶的兴起伴随着英国成为世界强国，并为英国经济腾飞和殖民扩张奠定了基础。

茶之魔力

“人们认可茶叶，如同认可一个真理。尽管鼓足勇气品尝的人认为醇香可口，但茶叶出现时有人怀疑，茶叶入市时有人抵制，茶叶风靡时有人诅咒；然而，真金不怕火炼，酒香不怕巷子深，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岁月的历练，最后赢得民众的欢呼、贵族的认可，取得了应有的地位。”

——艾萨克·蒂斯雷利，英国评论家、
历史学家（1766~1848）

1771年，英国发明家理查德·阿克赖特在德比郡的克罗姆福德动工兴建一片大型建筑物。阿克赖特是全家13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开始时收集人的头发，用秘方染色做成假发，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初露锋芒。首次涉足商海的成功经历给了阿克赖特更大的勇气和信心。1767年，他研制出了“细纺机”。这种机器是用于对纺线进行编织的。与珍妮纺纱机不同，它不需要技术工人手工操作，任何人都可以操作这种靠动力驱动的机器。在钟表师约翰·凯的帮助下，阿克赖特萌发了

许多设计思想，并在凯的帮助下制造了生产模型，于1768年建立起自己的第一家纺织厂，其动力是依靠马来驱动的。不久，两位富商对他的工厂很感兴趣，投资让他在克罗姆福德的一条河边建起了一家规模大得多的工厂，厂里的细纺机均由水轮驱动。阿克赖特在这个全英第一家现代工厂里，率先使用了全新的生产方法，该生产方法的巨大成功，使他成为英国工业化革命（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先驱。

工业革命最先在纺织业展开，之后迅速波及
其他领域。这其中不但有技术创新的因素，还有组织创新的因素。首先是准确、不知疲倦的机器取代了熟练工人，而这些机器需要新的动力能源，如水力和蒸汽等。这种需要对建于水轮和蒸汽机等动力源旁边的工厂十分有利。其次，熟谙某一生产环节的工人取代了能够胜任整个流程任务的工人。机器和人同室工作就意味着整个生产过程都受到了严格监控。再次，实行轮班制确保了在最大程度上使用这些价格不菲的机器设备。此外，为保证工人能按时上班，阿克赖特还在工厂附近建了工人宿舍。所有这些都对生产效率的提高产生了巨大影响。阿克赖特工厂的每个工人能完成50个手工纺纱工的工作量，加之纺织品生产的其他过程，如粗梳、梳棉以及最终的纺织，全都实现了自动化，纺织品产量因此直线攀升。

到18世纪末，英国所生产的纺织品量大价低，国内销售已有盈余，开始出口印度，挤垮了印度发展中的传统纺织业。

正如17世纪时，职员、商人和知识分子青睐咖啡，18世纪新兴工厂里的工人对饮茶情有独钟，也正是茶这种饮品，最适合新工厂里的工作性质和时间安排，在诸多方面促进了工业化大生产。作为福利，工厂主开始为其雇工提供茶点休息时间。茶不会像农民所喝的啤酒那样麻醉神经。恰恰相反，它含有咖啡因，能提神醒脑，使人思路清晰。茶使工人在长时间单调重复的工作中保持清醒，集中精力操作高速运转的设备。手工纺纱工或者织布工疲劳的时候可以休息，但操作机器的工人身不由己，绝不能忙里偷闲。他们必须像机器上的零件一样不停地工作，而茶正是保证工厂顺利运转的润滑剂。

茶叶的另一大优点就是其天然的抗菌性能，即使沏茶的水没有煮沸，它也能大大降低水生疾病的流行。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伦敦的痢疾病例开始下降。到1796年，有人说痢疾和其他由饮用水所引起的疾病“真是越来越少，在伦敦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些疾病了”。19世纪初，医生和统计学家一致认为，饮茶的风靡很可能改善了不列颠民族的健康状况。有了茶叶抗菌的保证，大量

工人可以安心地涌向诸如米德兰那样的工业城市，在工厂附近扎堆居住，而不用担心疾病蔓延的发生。由于茶叶中所含的抗菌素单宁酸极易溶于母乳，所以婴儿也受益匪浅，死亡率大大降低，为工业革命积蓄了庞大的劳动力后备军。

饮茶刺激了国内对陶器的需求，带动了制陶业的发展，使其成为空前繁荣的新兴工业，从而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拥有名贵“茶具”的人，不论身份高低，都备受尊敬。1828年，有人这样写道，“机械化纺纱厂的织布工”住着“整洁、干净的房子，独门独院。他们衣着整洁、体面，男人兜里揣着怀表，女人则穿着最能体现风韵的裙装……屋子里面家具精美，有桃花心木的座钟，有产自斯塔福德的漂亮茶具，搭配着托盘、糖夹、小银匙等”。斯塔福德郡最有名的茶具生产商是乔赛亚·韦奇伍德，他生产的瓷器茶具手感好，质量上乘，甚至可以与中国的陶器相媲美。因此，英国从中国进口的陶器数量逐年下降，最终在1791年停止进口。

韦奇伍德是大批量生产瓷器的先驱。他率先使用蒸汽机来研磨材料，并应用印花机的技术。在他的工厂里，已经没有整个生产过程从头干到尾的手工工人，每个人都只负责生产的一个环节，并且十分熟练，产品从一道工序不停地流向

下一道工序。新的劳动分工使韦奇伍德能够使用最优秀的设计者来设计茶具，但不需要这些设计者同时也是制陶专家。韦奇伍德还首先使用名人效应为他的产品做广告：将夏洛特王后（乔治三世之妻）钦点的“全套茶具”命名为“王后御用陶器”，在获得王后准许后将同样的产品卖给大众。他还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举办特殊的茶具展览，展出他专门为俄国女皇凯瑟琳二世设计的茶具等。同时茶叶营销步骤进一步复杂化。理查德·唐宁（托马斯·唐宁的儿子）等许多茶叶经销商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唐宁在1787年设计了一个特别的标志，贴在茶店的门上、茶叶的包装上。现在看来，这算得上是世界上最早的连续使用的商标。茶叶及相关商品的营销策略，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奠定了基础。

其他西方国家几乎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去追赶英国工业革命的步伐。英国能成为工业革命的发祥地原因很多：它热衷科学研究的传统、教徒式的工作态度、不同寻常的宗教包容、丰富的煤炭供应、高效的公路、水路运输网，还有资本家随时可以得到来自国家的资金支持等等。当然，英国人对茶的青睐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茶可以帮助新兴的工业城市免受疾病之灾，可以让长时间工作的工人们免受饥渴之扰。在人与机器同室工作并以蒸汽机作为动力的工厂，茶是能给

工人带来激情和动力的饮品。

茶壶里的政策

英属东印度公司是英国的茶叶进口商，它的政治影响力十分广泛。其全盛时期所创造的利税和所管辖的人口比英国政府还要多，它进口茶叶所缴纳的税赋高达政府年收入的10%。所有这些方面使东印度公司能对英国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政策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不少身居高位的政府要员与公司私交甚密，公司里的不少职员拿钱买议员的职位。支持东印度公司的人还不时与对西印度群岛感兴趣的官员合作。此外，茶的消费还刺激了对西印度群岛的蔗糖的需求。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公司的政策往往能够左右政府的政策。

美国独立是茶叶政策起作用的最好例子。18世纪70年代初，英国及其在北美殖民地的茶叶走私活动猖獗。走私的茶叶在英国广有市场，因为它不交进口税，价格比官茶要低。美国殖民地的居民一向反对向英国政府缴纳任何形式的税收（在参与了法国与印度的战争之后，英国欠下了大量的债务，为筹钱还债，英国向美国规定了许

多税收，茶叶税是经人们抗税斗争取得胜利以后所保留的最后一种税收形式）。因此，为逃避伦敦政府收缴茶叶进口税，他们转而从荷兰走私茶叶。猖獗的走私活动抑制了官茶的销售，东印度公司进口的茶叶大量积压，伦敦库房里堆积了近万吨茶叶。但不管公司进口的茶叶销售情况如何，它都要缴纳进口税，所以到最后拖欠政府税款高达100多万英镑。于是像以往一样，公司要求政府出台向其利益倾斜的政策。

1773年，《茶叶税法》正式出台，规定政府借给东印度公司140万英镑贷款以偿还其拖欠的债务，公司有权直接从中国向美国进口茶叶。这意味着东印度公司无须再向英国政府缴纳进口税，只需向美国缴纳相对较少的每磅货物3便士的关税，并由该公司驻美国的代理来缴纳。这些代理享有公司茶叶专营权，使其雄踞茶叶销售的垄断地位。这项法令不但赋予了政府向殖民者征税的权力，而且更低的税率也使走私的茶叶在价格上失去了优势，逐渐切断了走私者的财路。可公司官员却辩称，此举最终会让茶叶价格总体下滑，所以殖民地的居民还是会心存感激的。

遗憾的是，这是一招错棋。美国殖民地的居民，尤其是在新英格兰的居民从法属西印度殖民地购买糖蜜酿制朗姆酒，从荷兰走私茶叶出售，

靠做规避伦敦干预的贸易发家。他们做事的基本原则是抵制英货，拒缴英税，更愤恨英国政府准许东印度公司垄断茶叶销售。他们对于英国政府下一步可能要采取的措施忧心忡忡。1773年12月，费城出版的一张传单上写道，“东印度公司的背后有一个腐败专横、阴险狡诈的政府撑腰，他只要踏上这块乐土，就想方设法成为你们的主人。东印度公司本身就是活生生的独裁者、抢劫犯、血腥和压迫的代名词……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暴富，才能成为全球最有势力的贸易商”。许多英国商人也有同感：政府再次为了自身利益让东印度公司主宰了政府的决策。

当税法正式生效，东印度公司的茶船开进美国的时候，殖民地的居民试图阻止卸货。1773年12月16日，一群打扮成莫霍克印第安人的抗议者（其中很多是做茶叶走私贸易的商人，他们怕被新税法断绝财源）登上东印度公司泊在波士顿港的3艘货船，短短3个小时之内将船上的342箱茶叶全部倒入了波士顿港。之后，相似的“倾茶事件”在其他港口相继爆发。1774年3月，英国政府做出反应，要求封锁波士顿港口，并在东印度公司的损失完全得到赔偿之后才能开港。这是1774年英国政府试图控制北美殖民地所颁布的、被称作强迫系列法案中的首条法案，结果却激起了殖民者们更强烈地反抗，最终成为1775年美国独立

战争爆发的导火索。英国政府本以为减少东印度公司对政府的干涉就会解决倾茶事件的一再发生，或者至少能与殖民地居民达成某种妥协（因为美国方面以本杰明·富兰克林为代表的一些人主张赔偿毁茶所造成的损失），但是事实证明，茶叶纠纷成了美国迈向独立的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一步。

鸦片与茶叶

1784年，英国茶叶进口税改革以后，官茶价格降低，东印度公司的茶叶销量翻了一番，生意再度兴隆。但是比之先前，东印度公司的影响力逐渐萎缩。公司官员腐败成风，一心聚敛财富。公司由董事会直接管理，向议会负责。1813年，政府逐渐接受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主张，取消了公司对亚洲贸易（除中国）的垄断权。东印度公司随即将其经营重点逐步转向对印度殖民地的管理上。1800年以后，公司大部分的收入都来自收缴印度殖民地的地税。1834年，政府最终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垄断贸易权。



1773年波士顿茶党案，三大船茶叶被抗议者倒入了波士顿港。

尽管政府已经允许自由贸易，东印度公司也失去了昔日的政治影响力，但对鸦片的经营使其仍然有效地控制着茶叶贸易。鸦片是从未成熟的罂粟浆汁中提取出来的，它是一种烈性麻醉剂，古时被用作药品。但吸食鸦片极易成瘾，大量的瘾君子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1729年，清政府宣布禁止鸦片买卖，但非法鸦片贸易屡禁不止。19世纪初，东印度公司与英政府为扭转英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主要原因是英国对中国茶叶的巨大需求），建立了一个走私鸦片的半官方机构，有组织、有计划地增加鸦片贸易。

英国人觉得，中国人对用茶叶交换欧洲产品的贸易根本不感兴趣，只有钟表和机械玩具例外。事实上，这时的欧洲已在很多领域超过中国，只是中国人因循守旧，闭关锁国，对变革持怀疑态度。在中国人眼里，18世纪的机械制造是鲜有的欧洲比中国领先的几个领域之一。但很快，中国人对机械产品的热情消退，以前的问题再次暴露出来：东印度公司又得用硬通货（白银）买进茶叶。但是，一方面进行贸易所需的白银数额巨大，难以筹集，难以携带（一年所需银两折合现在的货币为10亿美元）；另一方面，更糟的是，白银升值比茶叶快得多，会抵消茶叶贸易的部分利润，这对英国人来说尤其难以接受。

鸦片，这个在中国鸦片商眼里被看成是和白银一样值钱的东西，让东印度公司看到了曙光。由于鸦片主要产自印度，而印度的生产和贸易又在很大程度上受东印度公司的控制，所以公司很快就控制了鸦片的种植和生产，并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默许把鸦片卖给走私商和腐败的清政府官员。东印度公司为用鸦片代替白银做茶业贸易，开始大量种植罂粟。种罂粟就等于种钱，他们需要多少就可以种多少。

当然，东印度公司不会明目张胆地进行这种以毒品换茶叶的罪恶交易。为了掩盖其直接参与鸦片贸易的丑恶行径，东印度公司精心策划，使自己在鸦片贸易中扮演了一个幕后指使的角色。鸦片产于孟加拉，并在加尔各答的年度拍卖会上出售。鸦片的买方是某些印度的“国家公司”，它们是独立的贸易组织，得到东印度公司的授权可以直接与中国进行贸易。这样一来，东印度公司就可以佯称对鸦片最终售往何处一无所知。这些国家公司将鸦片装船经海路运往广州湾，在伶仃岛卸货并换成白银，由中国商人装上平底大船走私上岸。这些国家公司可以冠冕堂皇地说，他们并没有将鸦片运进中国，所以没做任何触犯法律之事。而东印度公司也可矢口否认与此贸易有任何干系，因为他们已禁止本公司的所有船只装运鸦片。

清政府的海关官员自然非常清楚所发生的一切，但他们受中国鸦片商的贿赂，同样参与了走私过程。据当时美国商人亨特叙述，“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的贿赂网（竟然表现得和外国人一点干系都没有）！生意做得轻松流畅！偶尔出现阻力（如新官上任等），那也不过是贿赂多少钱的问题。只要钱一送到，类似的问题也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圆满解决，送完钱以后，中间人就可以红光满面地从官府里出来，我们也就安心地做生意了。”地方官偶尔也会颁布法令，要求在伶仃岛附近游弋的外国船只既不许入港，也不可以擅自开走，做些驱逐游戏，至少把外国商船赶出视线以外。之后，当地官府可能张贴公文，称官府又驱走一艘外国走私商船。

在东印度公司及其英政府中的朋党们的眼中，这种卑鄙的伎俩相当有效。仅1830年一年，出口到中国的鸦片就增长了250倍，达1 500吨。其销量足以赚取用来支付购茶费用所需的银两；事实上，从1828年起，中国进口的鸦片价值就已经超过了出口的茶叶价值，英国茶叶贸易逆差完全扭转。这样，赚进的白银会迂回流进东印度公司的腰包。国家公司将白银运回印度，东印度公司用伦敦开出的银行汇票买回这些白银。因为东印度公司也就是印度政府，购买白银的汇票实际

上相当于现金。他们把白银运回伦敦，交给东印度公司的代理，由代理携带白银前往广东买茶。英国为保证中国的茶叶供应，大量出口祸国殃民的鸦片，摧残了无数中国人的健康，培养出了成千上万个大烟鬼。尽管当时的中国自己也非法生产鸦片且数量与进口的鸦片数量相差无几，但这绝不能成为英国政府参与大量走私贸易的理由。

尽管清政府颁布新令要求全力终止鸦片贸易，但由于广东地方政府严重腐败，禁令的效果微乎其微。1838年12月，朝廷派钦差大臣林则徐清剿鸦片。林则徐宣称，“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在林则徐到达广州之前，中英双方就贸易问题就已经闹得面红耳赤了：自1834年东印度公司失去对中国的贸易垄断权后，广东官府与英国政府的代表就贸易原则产生了分歧，并为此争论不休。林则徐到达以后，即刻命令中外烟商销毁鸦片，并保证不再贩卖。由于之前清政府也曾下令销毁鸦片，他们都当耳边风，从未受过任何惩罚，所以鸦片商人和外国同伙都不予理睬。林则徐下令在虎门集中销毁了一年来进口的鸦片。走私者认为，这次只是暂时受挫，他们的生意会像以往一样红火起来。不料，林则徐决心坚定，不管中国人还是英国人，只要贩卖鸦片，一律关押。后来在一次冲突中，两名英国士兵杀害了一名中国人，英国政府拒绝交出凶手，

林则徐一怒之下将英商逐出广州湾。

此举激怒了英国人。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和其他英国商人对本国政府施压，要求政府强迫清政府扩大贸易开放、增加通商口岸，这样商品就不用全都从广东进入中国了。他们要求以自由贸易的原则处理广东的不稳定局势，特别要保护茶叶贸易（及相关的鸦片贸易）。英国政府并不想公开支持鸦片贸易，不过他们坚持中国内部禁烟并不等于中国官员有权搜查和销毁属于英商的货物（即鸦片）。于是，英国以保护自由贸易为借口，发动了历史上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从1839年持续到1842年，历时不算长。由于欧洲武器先进（这大大出乎中国的预料），此次战争几乎是单方战役。在1839年7月的首次遭遇战中，英国仅用两艘战舰就击溃了29艘中国战船。在陆上战役中，中国的中世纪武器也根本无法与英军最先进的滑膛枪相抗衡。到1842年夏，英军占领了香港，控制了珠江三角洲和上海等城市。清政府被迫签署了《中英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开放5个通商口岸，允许自由贸易，并赔偿英国白银2 100万两，其中600万两用以赔偿林则徐所销毁的英商的鸦片。

《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英商的胜利，同

时也翻开了中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中国作为泱泱大国，坚不可摧的形象彻底垮掉。清政府腐败无能，接连不断的宗教起义把它搞得焦头烂额，这回又惨败在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一个岛国手里，被迫开放港口迎接洋鬼子的商船及传教士。这为19世纪后半叶西方列强趁火打劫，挑起一系列争端，并强迫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提供了可供效仿的样板。中国的每次战败都成为西方列强索取商贸特权的良好机遇。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贸易（仍然是中国进口的主要货物）合法化。英国控制了中国海关，进口的纺织品及其他工业品，极大地冲击了中国的手工业使其走向瓦解。中国变成了英、法、德、俄、美、日列强的竞技场。他们竞相瓜分中国，发展各自的势力范围。政府腐败愈演愈烈，经济萧条，鸦片消耗量只增不减，国仇家恨郁结在中国人民的心头。一个曾经辉煌和强盛的中华文明就此没落。总而言之，茶叶凭借着对大英帝国政策的影响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铸成了一幕幕诸如美国独立、中国封建王朝衰败这样的人间传奇。

从广东到阿萨姆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国就逐渐意识到完全

依赖中国供应茶叶非常冒险。其实，早在1788年，东印度公司就曾咨询过当时的植物学权威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在孟加拉山区种植什么最有利可图。班克斯列出了一张清单，其中茶名列榜首，可惜的是并没受到应有的重视。1822年，皇家艺术学会设立了一个奖项，悬赏50基尼（旧时英国金币，1基尼合21先令）给“能在英属西印度群岛、好望角、新南威尔士或东印度发展具有中国规模的茶叶种植者和加工者”。不过此奖从未兑现，因为东印度公司不想削弱其对中国贸易的垄断地位，所以犹犹豫豫，始终对开发其他茶源不甚热衷。

1834年，东印度公司失去了对中国的贸易垄断权，从此开始转变态度，着手开发新茶源。东印度公司总裁、印度总督威廉·卡文迪许·本廷克爵士采纳了下属在一份报告中的建议，“在稳定中国原有的茶叶供应的同时，寻找更可靠的茶源”，并决心自己种茶。本廷克组织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做可行性的调查研究，并向从1728年开始试图在爪哇种茶的荷兰派出了一个代表团，专门咨询种茶建议。代表团也前往中国，希望能得到茶种，招募到有经验的种茶工人。另外，在印度寻找最佳种茶场地的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主张在印度种茶的人认为，如果在印度种茶成功，对英国和印度都有好处。英国消费者有了可靠的茶叶供应，而茶的种植需要大量劳动力，这将为印度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而解决那些受英国廉价布料冲击而失去工作和经济来源的传统纺织工人的工作问题。况且，既然印度开始生产茶叶，印度人就有机会进行茶叶消费，这又拓宽了茶叶的销售市场。一位种茶拥护者说，印度农民“将不仅拥有一种具有巨大价值的商品，而且还得到了一种有益于健康的饮品。”

茶叶种植被认为是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中国的茶叶生产工艺始终保持着祖上的传统，几百年未变。农村一家一户手工生产，然后卖给中间商，由中间商经水路或经陆地翻山越岭运往沿海，再卖给茶商。由茶商进行茶叶混合和包装，在广州卖给欧洲人。在茶叶运输过程中，中间商要加价，还要支付运费、过桥税和经营税。所以，卖到外商手里时，茶叶价格几乎翻了一番。但是，在印度生产茶叶就不会有这么复杂的问题。他们会采用新的工业化方法，把种植园经营成为“茶叶工厂”，尽可能将更多的生产过程机械化，这样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利润自然也就随之提高。随着茶叶在印度的种植，殖民主义开始与工业化携手共进。



1880年印度的茶叶种植园。这里茶叶的生产成本实际上比中国要低出很多。

非常有趣并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本廷克的调查小组成员竭尽全力寻找最佳种茶场地之时，在印度本地，也就是在他们的鼻子底下，一直就长有茶树。19世纪20年代，加尔各答政府的植物学家纳撒尼尔·沃里克收到了一个在阿萨姆发现的类似茶树的植物标本，他将其认定为一种普通的山茶科植物，并没有意识到这实际上就是茶树。1834年，当被任命为本廷克委员会的成员之后，

瓦里茨发出一组调查问卷，考察印度哪些地区最适宜种茶，结果看了从阿萨姆采集的样本，又看了那里送来的插条、种子以及做好的成茶，这次沃里克终于相信委员会给本廷克的报告中所写的话，“毫无疑问，茶树是上阿萨姆土生土长的植物……我们必须立即公布这个惊人的发现……这个至今为止事关大英帝国农业、商业资源、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发现”。

进一步的考察证实了茶树确实生长在阿萨姆地区。若干年前，东印度公司占领了阿萨姆这个偏僻的边境地区作为缓冲地带，以阻止缅甸人的侵入。那时，东印度公司决定，在上阿萨姆地区设置一个傀儡王，他们则将主要精力放在收缴下阿萨姆地区的土地税和作物税等大大小小的税收上。可是，在发现茶叶后没多长时间，傀儡王的政治生命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终结。但是，将阿萨姆的野生茶树变成繁荣的茶叶生产基地，并不像想象的那么轻松。公司主管和负责建厂的科学家们在讨论最佳方案的过程中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茶树应种植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平原还是丘陵？它喜热还是喜凉？其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在讨论什么。茶树和茶种是从中国引进的，即便是谙熟茶性的中国茶工绞尽脑汁，也不能让它们在印度茁壮成长。

最后还是一个名叫查尔斯·布鲁斯的冒险家和探险家解决了这个难题。他熟谙阿萨姆的风土人情和语言地理，将当地人对野茶的认识和中国茶工的专业知识相结合，逐渐摸索出栽培野生茶树的方法，即在什么土地上种植，如何把茶树丛移植到布局规整的茶园里，如何进行杀青、揉捻和干燥。1838年，首批少量的阿萨姆茶叶运抵伦敦，茶商们对茶叶的质量十分满意。现在，印度茶叶生产已无问题，东印度公司决定把种茶这项费力的事转手，让他人经营茶叶种植园，自己则坐收地租、茶税。

一些伦敦商人抓住时机，成立了阿萨姆公司。英国商人不愿看到因为出于无奈和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耻辱境遇”（正是这种状况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埋下伏笔），所以他们希望抓住机会大干一场，在印度建立一个茶叶生产的新基地，因为茶叶生产“有巨大的利润，对英国国家极为重要”。布鲁斯在一份报告中设想：“当我们拥有与中国一样多的茶叶产量时，我们就可以期待用更低的价格与她竞争。我们可以，也应该以低于他们的价格打入市场。”布鲁斯还认为，他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急需为种植园找到足够的劳动力。他指责严重的大烟瘾使得当地人不爱干这样的体力活，但他相信邻近的孟加拉失业工人一旦知道这里有工作机会的话，肯定会蜂拥而至。

阿萨姆公司很快筹集到了资金，公司股份很快被瓜分一空且供不应求。一些投资商因为抢不到股份，不得不退出竞争。1840年，阿萨姆公司控制了东印度公司大部分的实验茶园。但是，他们经验不足，经营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他们雇用了几乎所有可以找到的中国工人，错误地认为只要是中国人就有能力生产出高品质的茶叶，结果生产出的茶叶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低劣，加之公司官员挥金如土，阿萨姆公司的股份因此丧失了99.5%的价值。直到1847年原公司执行总裁解职，布鲁斯接任帅印，公司局面才有所扭转。从1851年起公司开始赢利。同年，他们生产的茶叶受邀参加了伦敦大博览会。这是大英帝国经济实力与财富的象征，也是正式向世人证明了并非只有中国人才能生产茶叶。

随后，茶叶公司如同雨后春笋般纷纷在印度出现，宣告着茶叶时代的到来。然而其中一些公司由于未经过认真思考和市场调研，盲目跟从而最终导致经营失败。最终到19世纪60年代末，茶叶生产才从一窝蜂开厂的盲目状态中恢复过来，茶叶产量也因为有了机械和工业化手段而直线上升，生产场面甚为壮观——茶树成排成行，工人按照严格的作息时间表吃饭、睡觉和工作，统一住在成排的临时工棚里。当时采茶还没有实现

（现在也没有）全部机械化，但从19世纪70年代，茶叶的加工阶段已经实现机械化。机械分工越来越细，逐渐可以进行茶叶揉搓、干燥、分类和包装。机械化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1872年，在印度和中国生产1磅茶叶的消耗大致相同，但到1913年，印度的茶叶生产成本降低了3/4。公路和蒸汽船的使用也极大降低了茶叶运往英国的开支。这样一来，中国的茶叶出口就注定走下坡路了。

数年间，中国逐渐失去了作为英国主要茶叶供应国的地位，以下数字足以说明问题：1859年英国从中国进口31 000吨茶叶，但到1899年就下降到7 000吨，而从印度进口的茶叶却上升到10万吨。印度茶叶工业的崛起对中国茶农的生活和对中国国内的稳定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导致中国在20世纪前半叶陷入了一个到处是起义、革命和战争的混乱局面。可惜东印度公司没有支撑到最后，没有看到英国依靠它的努力，逐渐摆脱了对中国茶叶的依赖。1857年，以孟加拉军队起义为导火索，爆发了反对东印度公司的大规模印度兵变，迫使英国政府只能直接控制印度。1858年，东印度公司宣告破产。

时至今日，印度仍是世界上主要的茶叶生产基地，最大的茶叶消费国。消费量占世界总产量

的23%，中国第二（16%），英国第三（6%）。从全球人均消费量的数据上，我们仍能看到英国对昔日殖民地的影响。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位于世界12大茶叶消费国之列，也是仅有的进入12强的4个西方国家。其余8国除了日本都是中东国家，中东国家禁止饮酒，从而促进了茶叶和咖啡的消费。美、法、德则更中意咖啡，这三个国家的人均茶叶消费量，都差不多只是英国或新西兰的1/10，可见名次相差很多。美国人喜欢喝咖啡胜过喝茶，人们通常错误地以为这是由于茶叶法案和波士顿倾茶案带给美国人的后遗症。但在独立战争期间，当英国被迫中止茶叶供应之后，美国殖民者对饮茶的热情尚未消退。他们在当地千方百计地寻找替代饮料，有人用四叶千屈菜煮“自由茶”；有人喝由长叶车前草、醋栗叶和洋苏叶混合泡制的“芳香茶”。虽然这些茶味道欠佳，但美国人通过喝这些本土茶来表达其至诚的爱国之情。除此以外，也有少量茶叶贴着烟草的标签被偷运进美国。等到战争结束，官茶才再次流通于北美市场。波士顿倾茶案之后的10年里，茶叶的人气一直比咖啡旺。直到1832年美国取消了进口税，咖啡价格下降，才成为一种人人都喝得起的饮料，并在19世纪中叶超过了茶。内战期间，美国的关税曾短期恢复，但1872年再次废除。那年的《伦敦画刊》披露：“美国承认免

除咖啡进口税后，咖啡的销量猛增。”茶叶失宠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移民结构发生了变化，有饮茶习惯的英国移民比重锐减。

茶叶的历史，反映了大英帝国“创造与毁灭并存”的强权扩张史。茶曾作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的民族之饮长达一百多年。那时，英国官员走到哪里，就把茶叶带到哪里；英国士兵无论在哪里打仗（欧洲战场抑或克里米亚战场），都会把茶叶带在身边；还有英国米德兰地区工厂的工人每日都有茶点休息时间。英国从此保留下全民喝茶的习俗。就是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我们也还依稀可辨昔日大英帝国和养育它的茶叶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

可口可乐与美国的崛起

Coca-Cola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从苏打水到可口可乐

响应可口可乐的召唤，你将更健壮！更强大！

品味可口可乐的甘醇，你将更聪颖！更睿智！

——可口可乐公司1896年的广告词

工业的力量产业主义和用户至上主义都源于英国，然而在一种新的工业生产方式的辅助下，它们真正蓬勃发展起来是在美国。在工业化以前，制造一件东西从头到尾全要靠手工艺者，后来，英国把整个生产过程分成几个环节，每一个环节完成自己的任务后，把它交给下一个，并尽可能利用机器辅助生产。美国则更进了一步，他们把流水线生产变为零部件生产，用专门的机器生产出大量的零部件，再组装成成品。这种方法作为美国的生产制造体系而闻名，从枪械制造到缝纫机、自行车、汽车和其他产品的生产，广为应用。它是美国工业实力的基础，使消费品的大规模生产和交换成为可能，并迅速成为美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9世纪的美国为商品的大规模生产和销售提供了理想的环境。美国拥有大量的原材料，但非常缺乏技术熟练的工人。后来，人们发明了专门的机器，使得那些非熟练工也可以把零部件做得像熟练技工一样好。另外，美国不像欧洲那样存在地区和阶级偏好。在美国，一件产品可以在任何地方生产，也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销售，根本无须顾及地区差异。更有利的是，1865年国内战争结束后，全国形成铁路网和通讯网，整个国家成为一个大市场。不久以后，甚至连英国也开始从美国进口工业机器，这充分表明工业领头羊的交椅已经从英国转到美国手里。到1900年，美国经济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19世纪，美国的经济重点主要集中在国内。而20世纪，美国把矛头指向了国外，涉足了两次世界大战，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之后，美国和苏联陷入了“冷战”。双方在军备竞赛中势均力敌，于是较量就转向了经济实力。最终，苏联力不从心，败下阵来。可以说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在世纪之交，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和交流让各国的联系空前紧密，美国作为全球第一的超级大国，实力无人能敌，尤其是军事和经济实力更让其他国家望尘莫及。

20世纪以来美国的崛起、战争、政治、贸易

和通讯的全球化都反映在可口可乐的兴盛中。

冒气泡的苏打水

有一件事颇为有趣，可口可乐及其他人工碳酸饮料实际上都源于同一种制剂。这种制剂是1767年由身为牧师和科学家的约瑟夫·普利斯特利在英国利兹的一个酿酒厂发现的。普利斯特利的本职工作是一位牧师。尽管他的宗教观点与传统思想格格不入，而且说话还有点结巴，但他一有空就会进行科学研究。当时他住在酿酒厂的隔壁，对于发酵缸中冒出的气体（当时称之为“固定的空气”）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之后，他把酿酒厂当作实验室，开始对这种神秘气体的特性进行研究。首先，他在正在发酵的啤酒缸上方放置了一支蜡烛，注意到缸中冒出的气体能把火焰熄灭并能带走蜡烛熄灭后的烛烟。开始烛烟被这种厚重的气体包围着，后来气体绕发酵缸飘了几圈后，落到了地上。这就说明该气体比空气重。普利斯特利还发现如果把两个杯子放在酒缸上方，快速将水从一个杯中倒入另一个杯中，这种气体能够溶解在水中，变成（用他的话说）“让人意想不到的能发泡的水”。今天我们知道这种气体就是二氧化碳，这种水就是苏打水。



约瑟夫·普里斯特利，1772年出版了一本书，专门介绍如何制作苏打水。

当时，人们对“固定的空气”（即二氧化碳）的唯一认识就是，它是一种防腐剂，内含这种气体的饮料可以用作药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冒着气泡的天然碳酸水有益身体健康。1772年，普利

斯特利向伦敦的皇家科学院提交了他的发现成果，并于同年出版了《饱含固定空气的水》一书。同时，为了更好地制造这种冒气泡的水，他设计了一种更有效的方法，通过化学反应在一个瓶子里生成该气体，然后输入到另一个装满水的瓶子。一旦输入的气体充满第二个瓶子，他就摇晃瓶子，使水和气体相混合。由于普利斯特利的这项工作具有潜在的医用价值，英国皇家学会授予他最高荣誉——科普利奖。（在人们普遍知道柠檬汁能有效预防坏血病之前，人们错误地认为碳酸水能有效地帮助出海的人对付坏血病）。普利斯特利本人无意把这个发现用于商业。18世纪70年代早期，第一个把人工碳酸饮料当作药物出售的人是托马斯·亨利，他是曼彻斯特的一个化学家兼药剂师。托马斯·亨利在普利斯特利的基础上制造出了与天然碳酸水（自然矿泉水）更为相近的人工碳酸水，而且他坚信这种水有益于健康，对“炭疽热、痢疾和胆汁性呕吐”等疾病疗效尤为显著。亨利利用自己发明的机器一次可以生产12加仑这种“冒泡的水”。1781年，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其中说道，“这种水必须保存在用木塞封好的瓶子里”，他还推荐把这种水与柠檬水混合（柠檬水就是糖、水和柠檬汁的混合物）饮用，因此他可以算是第一个卖人工碳酸饮料的人。

18世纪90年代，在欧洲的科学家和企业家中

掀起了一股生产人工苏打水的热潮，并分别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托波恩·伯格曼是瑞典的一位科学家。在他的鼓励下，他的一个学生建了一家小型工厂，但工厂的生产效率太低，1个女工1小时只能密封3瓶饮料。相比之下，日内瓦的技工尼古拉·保罗和金融家雅各布·施韦普的买卖就成功多了。1797年，日内瓦的医师宣布保罗的方法最好，于是，保罗的那家合伙公司很快就生意火爆了。到1800年时，公司的瓶装水甚至销往国外。后来，保罗和施韦普分道扬镳，双方都在英国开办了分公司，成了竞争对手。由于施韦普的碳酸水没有保罗公司生产的碳酸水汽泡那么多，所以更符合英国人的口味。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气泡少的水才更接近天然碳酸水（矿泉水），当时有一幅漫画把喝保罗饮料的人比作一个过于膨胀的气球。

那时的很多人工碳酸水都是用碳酸氢钠（苏打）生产的，因此这类冒泡的饮料统称为苏打水。这类饮料在1800年之前仅用于医疗，医生们用它来治疗各种疾病。英国政府把它看作是一种专利药品，规定每瓶苏打水要交3便士的税。1798年，有一位作家曾提到施韦普生产的“苏打水”；1802年，伦敦有一则广告说道：“我们把这种气态的碱性水叫作苏打水，多年来，它在我国深受好评”。

然而，苏打水还是在美国最受欢迎。和欧洲人一样，美国人也对自然碳酸水（自然矿泉水）的特征、功效以及如何进行人工生产有着很大的研究兴趣。著名的费城医师本杰明·拉什调查了费城的各种碳酸水，于1773年向美国哲学学会上交了他的报告。另外，詹姆士·麦迪逊和托马斯·杰弗逊，他们两个人既是政治家又是科学家，对碳酸水的医疗性质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上纽约州的萨拉托加因拥有天然泉水而极负盛名。1783年，乔治·华盛顿参观了萨拉托加，并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次年，他的一位朋友在写给他的信中说想把当地的碳酸水装罐出售，理由是“这里的水与别处的水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含有大量的固定气体，但在罐装这种水时要做到不跑气是很困难的，有好几个人告诉我们，当他们把水装进瓶子并用塞子塞紧时，瓶子炸开了。我们用随身所带的唯一一只瓶子试了试，虽然没有爆炸，但气体愣是从木头瓶塞和封蜡缝儿中逃了出去”。

在美国，苏打水从一种能引起人们科研兴趣的事物变成了一种商品，这种变化主要要归功于耶鲁大学的第一位化学教授本杰明·西利曼。他在1805年去欧洲为他新成立的院系搜集书籍和仪器的时候，惊讶地发现保罗和施韦普的罐装水在伦

敦很受欢迎。回国之后，他开始为朋友制作罐装苏打水。这种罐装水立刻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他在给商业伙伴的信中说道，“人们对苏打水的需求量很大，单凭现有的生产能力，我根本无法满足他们，因此我决定要像伦敦人一样进行大规模生产”。1807年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他开始出售罐装水。

随后在其他城市，许多人纷纷效仿，其中最著名的是费城的约瑟夫·霍金斯，他设计了一种用泉水配制苏打水的新方法。他本想仿造欧洲人把抽水房建在天然的泉眼上，这样就可以把矿泉水（碳酸水）直接倒到杯子里。他在1808年的一份关于自己的温泉房的说明中写道，“含二氧化碳的水从泉眼和蓄水池中不断涌出，流经一根内装有金属管的木柱，木柱的顶端装有一个水龙头，这样，我们只要打开它就可以直接取水了”。1809年，霍金斯的发明获得了专利。然而，在温泉区卖苏打水的主意并不受欢迎，反倒是药剂师们逐渐垄断了苏打水买卖。到19世纪20年代末期，苏打水成了药房的标准特征，苏打水不再是瓶装买卖，而是现产现销。但尽管如此，当时还是有人从欧洲进口瓶装水，而且在1826年，萨拉托加的水也开始以瓶装出售，并取得了极大成功。

和之前的许多饮料一样，苏打水一开始也被用作药物，后来才逐渐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饮料。有传言称它具有医用功效，因此人们除了喜欢，还对它有一种崇敬之情。早在1809年，美国就有一本化学书提到，“苏打水具有很好的提神醒脑功能，尤其是对于发烧发热和疲惫不堪的人而言，效果尤其显著”。苏打水不仅可以单独饮用，还可以用来做碳酸柠檬汁（可以说是最早的碳酸饮料）。19世纪早期，大西洋两岸的国家都用苏打水和葡萄酒混合饮用。一位英国的观察家说道，“加进了苏打水后的葡萄酒更能在口感和劲道上满足消费者”。今天我们把这种混合物称之为葡萄汽酒。但是在19世纪30年代以后，尤其是在美国，苏打水的口味主要用特制的糖浆调配而成。

1830年，《美国健康期刊》提到了这种糖浆，“这种糖浆被用于调味，尤其是在给碳酸水调味时，它的作用更不可取代”。糖浆原是人们从桑果、黑莓、菠萝、覆盆子和撒尔沙根中手工提取的。苏打水的制作开始变得越来越精细，同时一些特别的分装设备也投入使用。人们在苏打水和糖浆里加入冰块以达到冰镇效果。到19世纪70年代，一个大型的苏打水店俨然就是一个巨大的装置。在1876年的费城世界博览会上，来自波士顿的苏打水店巨头詹姆斯·塔夫茨向人们展示了

他的“北极苏打水装置”。该装置高达30英尺，高耸于展厅，参观者须仰视方可见其全貌。周身用大理石、银器和盆栽加以装饰。它必须放置于特殊设计的房间里，操作员都是衣装整洁的侍者。这次展出充分体现了塔夫茨的苏打水公司具有强大的创新和营销能力，并为该公司赢得了大量的订单。

约翰·马修斯是英国苏打水买卖的经验之家，后来移居纽约。多亏了他这样的商人，美国的苏打水买卖才得以悄然实现工业化。起初，他主要是生产和出售自己的苏打水，后来转向卖苏打水设备。再后来，当他的儿子（也叫约翰）加入他的生意之后，他开始向一个新的方向扩张。小马修斯是一个多产的发明家，他设计出一种专门的机器，使得苏打水的制作从碳酸化到清洗瓶子整个过程全部自动化。之后，他开始把这种机器卖给其他公司。到1877年，该公司累计获得一百多项专利，共售出两万多台机器。公司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能“提供生产罐装苏打水以及姜汁无酒精饮料等整套设备”，商品目录的累计金额146.45美元。整套设备包括生产气体的原材料和仪器、2个碳化水的水泵、1台装瓶机器、50罗（罗，计数单位，合12打或144个）瓶子，还有调味汁和色素。小马修斯的发明在许多展览会中展出，并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赢得了多项荣誉。他

的这些发明代表了美国大规模生产的生产方式：整个过程的每一个步骤都有专门的机器操作；瓶子和瓶盖的标准统一；生产出的饮料产量高，成本低，让人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大规模生产的优势。

苏打水逐步走上了生产工业化、消费大众化（贫富皆宜）的道路。事实上，这种饮料代表了某种美国民族精神。1891年，作家兼社会评论家玛丽·盖伊·汉弗莱斯在《哈勃周刊》中这样总结当时大众的看法：“苏打水最大的优点以及它能成为国饮的原因在于它的民主。香槟是富人的杯中物，而啤酒则总是意味着贫穷，只有苏打水才是不分贫富的饮料。”玛丽自己则认为：苏打水能够被称作美国国饮的观点只对了一半，因为实际上当时一种新的国饮已悄然出现，苏打水只不过是它的组成部分的一半而已。

可口可乐的诞生神话

1886年5月，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药剂师约翰·彭伯顿发明了一种新的饮料。根据可口可乐公司的官方记载，他是在配制一种医治头疼的药物时无意中发现可口可乐配方的。一天下午，他在

一个三角锅中加入不同的原料后，得到了一种焦糖色的液体，他把这种东西送到邻近的一家药剂房，加上苏打水后，就制出了后来闻名世界的可口可乐——一种爽口的碳酸甜饮料。然而，事情的真相要复杂得多。

事实上，彭伯顿是一个配制成药（秘方药）的高手。这些被称之为成药的药物其实都是些假药，但在19世纪晚期，美国人很相信它们。这些药片、香液、糖浆、膏、油之类的东西能够受到欢迎，都是药理学广告宣传的结果。这些东西有的对人体无害，有的却含有大量的酒精、咖啡因、鸦片和吗啡。他们在报纸上大做广告促进销售，国内战争后，随着退伍军人大量服用这些成药来麻醉自己，成药生产更是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成药的盛行反映了人们对传统药物的普遍不信任。传统药物往往价格昂贵，效果却不明显。此时成药就提供了一个诱人的选择，它们的销售商常常会打出制药原料来自国外，制药理念源于美国本土人的招牌，药物的名字往往还会带有宗教、爱国或神秘色彩，比如，“可以增强肝脏功能的蒙森波波药片”和“莫斯博士的印第安之根药片”等等。

此类药物的制造商们当然会不顾一切地大肆宣扬他们药物的功效。比如基德医生就宣称他卖

的“万能药”包治“百病：跛子服用2~3个疗程后可以扔掉拐杖，还可以神奇般治愈风湿病、神经痛、胃病、心脏病、肝病、肾病、血液病和皮肤病等”。刊登此类广告的报纸对于药物疗效的真实性不闻不问，他们所关心的是广告收入，收入上去了，报业的发展才能跟上去。到19世纪末，成药的广告远远多于其他任何商品。当时有一种油膏叫“圣·雅各布油”，据说可以治疗肌肉酸痛，仅1881年，其制造商就花费了50万美元用于广告宣传。到1895年，很多广告客户一年花在广告上的费用多达一百多万美元。

成药生意是第一批意识到商标、广告、标语、口号和大广告牌重要性的商业活动之一。由于这种药物成本通常较低，因此花钱搞好营销就显得格外重要。在市场上这类商品很多，竞争相当激烈，根据一项估计，仅有2%能赢利。但是，一旦获得成功，成药的发明者可就财源滚滚了。其中最著名的是莉迪亚·平卡姆的植物合剂，据说该药剂“对于治疗女性经常性疼痛、乏力、体虚非常有效；能治愈神经衰弱、胃胀气等症；能彻底粉碎对刺激性食物想吃又不敢吃的折磨；还能有效增强胃动力”。消费者竞相写信给平卡姆咨询医学建议，甚至在1883年她死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她的死讯没有对外公布，人们还不断地写信给她。来信的消费者都得到了同一模式的回

信，信的内容无一例外地要求他们更多地使用她的合剂。20世纪初，当人们对这种药剂进行分析时发现，它的成分中竟含有15%~20%的酒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戒酒运动中的妇女们都是这种药物的忠实拥护者。彭伯顿制作成药的计划开展得并不顺利，虽然曾有一段时间他能赚些钱，但到19世纪70年代，他走了背运，于1872年宣布破产。此后，他也曾试图东山再起，但两场大火烧毁了他的仓库，也烧掉了他从头再来的希望。不过，他继续配制新的成药，希望能有一种会让他致富。终于在1884年，他取得了一些成果，这次的成功多亏了他加入一种广受欢迎的名叫古柯（南美及西印度群岛所产的一种药用植物）的成分。

南美洲的一些民族早就知道古柯叶具有提神醒脑的功效。古柯更被认为是“印加人（古代秘鲁土著人）的圣物”。咀嚼一小团古柯叶会得到少量的生物碱药品——可卡因。和咖啡因一样，少量的可卡因具有提神醒脑、抑制食欲的功效。据说服用以后，人们即使缺食少眠也能够坚持住，长途跋涉越过安第斯山脉。1855年，人们开始从古柯叶中提炼可卡因。它很快就引起了西方医生和科学家的兴趣，他们认为可卡因可以帮助鸦片成瘾者戒掉毒瘾（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可卡因本身也能让人上瘾）。彭伯顿密切关注医学杂志

上关于古柯的讨论，到19世纪80年代，他和其他的一些成药剂师们在他们的药片、万能药和药膏中加入可卡因。彭伯顿还发明了一种叫作法国古柯葡萄酒的饮料，这也算是他对该领域的贡献吧。

从酒的名称可以推知，法国古柯葡萄酒就是加入了古柯的葡萄酒。事实上，彭伯顿调制这种饮料的初衷是想效仿一种叫作马里亚尼酒的成功成药，这种药选用法国葡萄酒和经法国葡萄酒泡制6个月的古柯叶精制而成。由于可卡因含量高，再加上其发明者科西嘉人安格洛·马里亚尼巧妙的营销手段，这种药物在欧洲和美国很受欢迎。社会名流及政府首脑，包括三位教皇、两位美国总统、维多利亚女王还有大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对该饮料的赞赏之辞汇编成书后竟多达13卷。彭伯顿模仿了这种成药的制法，而且还加入了可乐浸汁。西非的可乐果被认为是另一种具有神奇疗效的药物，它在西方国家受宠的年代和古柯相当。由于它内含约2%的咖啡因，所以咀嚼起来也有一种提神的功效。和南美的古柯叶一样，可乐果被北至塞内加尔、南到安哥拉的西非各民族视为兴奋剂。尼日利亚的约鲁巴人把可乐果用于宗教仪式。塞拉利昂人错误地认为可乐果可以治愈疟疾。19世纪，由于古柯和可乐果功效的相似性，美国人经常把两者混合使用进行成药的配

制。



一个早期瓶盖上的可口可乐标识语。

彭伯顿在仿制的基础上对马里亚尼的配制秘方做了一些改进，同时他还借鉴了马里亚尼的广告手段——利用名人效应为饮料做宣传。他的苦心没有白费，法国古柯葡萄酒的销售量与日俱

增。然而正当彭伯顿的事业即将步入正轨时，亚特兰大及其所属的富尔顿县投票决定：从1886年7月1日起开始禁止酒精饮品的买卖，试行期为两年。当禁酒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时，彭伯顿迫切需要尽快生产出一种为大众所能接受的无酒精替代品。他又回到自己配备有精密设备的实验室家里，开始埋头调制一种内含古柯和可乐果的无酒精饮品，由于两种成分都具有苦味，他又加入了蔗糖。这样调制出来的饮品就不再是通常卖的成药了，彭伯顿想把这种饮品当作药用苏打水的调味品出售。在改进了调制方法之后，他给邻近的一家药剂店送去了一批他的新饮品，这家药剂店把这种新饮品和其他的一些调味品放在一起出售。彭伯顿让他的侄子时常去这家药剂店走走，打听顾客对这种新饮品的口味有何意见。

到1886年5月，彭伯顿对于自己的配方已经相当满意，现在他要做的就是给他的新产品取名字。他的一位商业伙伴弗兰克·罗宾逊建议给这种新饮品取名为“可口可乐”，这个名字是直接取自这种饮料两种成分的名称。罗宾逊后来在回忆中说，他认为“这个名称中的两个C很适合用来做广告”。这种最初的可口可乐含有少量的古柯和少许的可卡因（尽管20世纪早期可口可乐就已经不再用可卡因了，但即使是今天的可口可乐仍加入了从古柯叶中提取的汁液）。可口可乐的发明不

是彭伯顿在自家花园中胡乱调制出来的，而是他作为一个有经验的配制者精心研制数月的结晶。

在发明了可口可乐之后，彭伯顿放手让他的生意伙伴罗宾逊负责生产和销售。1886年5月29日，这种新饮品在《亚特兰大周刊》中刊登了第一则广告，广告词简单明了，“可口可乐由苏打水、古柯及可乐果精制而成，它好喝又解乏，能令你神清气爽、心情愉悦！”这种新产品的推出恰逢亚特兰大试行禁酒令。由于可口可乐是以非酒精饮品的身份出场的，且自称是苏打水的调味品和成药，所以很快就受到了消费者的喜欢。彭伯顿供应给药剂师们的可口可乐（糖浆）装在一些长颈瓶中，上面挂有标签，写道，“这种饮料是生产者智慧的结晶，它不含酒精，兼具古柯和可乐果养脑提神的作用。它不仅好喝又解乏，让人神清气爽、心情愉悦（因为可口可乐是从苏打水和其他的碳酸饮料中配制而成的），还具有滋补大脑的功效，另外它还是各种神经疾病的克星，如：伴有呕吐的头痛、神经痛、歇斯底里症和忧郁症。可口可乐独特的口味让每个人都喜欢它”。或许这些标签上的说明可以反映出为什么这种新产品能如此受欢迎。

罗宾逊为了饮料的销售可谓是奇招迭出。他免费分发一些赠券，凡是持有这些赠券的人就可

以免免费品尝可口可乐。他希望这些人通过品尝以后会喜欢上可口可乐的味道，从而成为可口可乐的消费者。他还在街道汽车上贴海报，在汽水店打出横幅，上写“出售可口可乐，5分钱一杯”。另外，罗宾逊还别出心裁，用草书写标语，并于1887年6月16日第一次以广告形式刊登在报纸上。卖给药剂师的可口可乐在夏季汽水畅销时多达每月200加仑，相当于25 000杯。1887年11月，亚特兰大又投票决定停止禁酒运动，然而此时可口可乐已经站稳了脚跟。

尽管可口可乐的前途一片光明，但彭伯顿的业务伙伴们的心情却不十分舒畅，因为接连几个月，可口可乐的商标所有权和秘方所有权的问题一直被搞得争执不清。本来这些权利都属于彭伯顿化工公司，但该公司的股份一卖再卖，以至于此时已很难说清楚到底谁应该拥有这些权利。更麻烦的是，彭伯顿在1887年7月把可口可乐所有权的 $\frac{2}{3}$ 卖给两位商人，目的很明显，因为他当时的处境很困难，很想尽快多筹些钱（就在这一时期，他的胃癌已经到了晚期）。这笔交易是背着罗宾逊进行的。罗宾逊得知后，坚持自己仍有权力使用可口可乐的配制秘方。后来彭伯顿自己又开了一家新公司，这家新公司也声称对可口可乐的各项权利具有所有权。先前买了彭伯顿股份的那两位商人突然醒过神来，把自己手上的权力转

手卖给了第三方。

这件错综复杂的所有权纷争案最终由阿萨·坎德勒解决了。坎德勒是罗宾逊的律师的兄弟，也是亚特兰大的一位成药剂师。当他得知可口可乐的所有权纷争后站到了罗宾逊一方，他开始买进各方手上的股份。但直至1888年夏天，可口可乐的所有权归属问题依然错综复杂，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在亚特兰大，主要有三个竞争对手为药剂师们提供可口可乐，他们分别是：坎德勒和罗宾逊的新公司、彭伯顿的新公司以及彭伯顿叛逆的儿子查理的一家公司。

1888年8月16日，约翰·彭伯顿死于癌症。这样一来，坎德勒掌握对可口可乐的控制权。彭伯顿死后，坎德勒召集了全城的药剂师前来悼念，并发表了一番感人的、却是言不由衷的讲话。他说彭伯顿不仅是亚特兰大药剂师们的先驱，更是他们的良师益友。他建议所有的药剂师在彭伯顿出殡的那天全部停业，以表示对他的尊敬。通过这次讲话，加之在葬礼上所扮演的护柩者的角色，他成功地让人相信他处处为彭伯顿着想，他的可口可乐才是唯一正宗的。坎德勒在他的演说中说彭伯顿是他的好朋友，这完全是个谎言。但现在想想，他这样说也未尝不可，因为彭伯顿之所以今天还为人们所知完全归功于坎德勒。另

外，如果没有坎德勒的努力，可口可乐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大众化的咖啡因

坎德勒最终以2 300美元的超低价收购了可口可乐的所有权，开始他仅把这种新的饮品当作是自己的一种成药。然而随着销售量的不断增长（到1890年，可口可乐的销售量翻了4番，达到8 855加仑），坎德勒决定放弃其他的成药，因为从受欢迎程度来讲，它们无一能与可口可乐相提并论。本来冬天不应该是喝汽水的季节，但可口可乐在冬天也卖得相当好。看到这种情况，坎德勒雇用了旅行推销员向邻州的药剂师们推销可口可乐；他分发出更多的免费赠券以吸引更多的顾客；另外在广告方面，他也加大了投入。到1895年底，可口可乐的年销售量已超过76 000加仑，销售区域遍布整个美国。

可口可乐公司只卖糖浆，不卖混合了苏打水的成品糖浆，这就使它得以快速发展。坎德勒强烈反对把可口可乐装瓶出售的建议，因为他担心饮料的口味会在储存期间受到影响。因此在当时，说可口可乐打入一个新的城市或州仅仅意味

着和当地的药剂师们达成了交易协定，然后公司就把糖浆和一些相关的广告宣传材料船运过去，主要有一些横幅、记录表和带有公司红白标志的物件。由于亚特兰大是美国铁路系统的枢纽之一，可口可乐的运送绝不是问题。客户也不成问题，因为药剂师们很欢迎可口可乐，它能给他们带来丰厚的利润：每卖出5分钱的可口可乐，他们除去糖浆成本需要1分钱，还能获取近4分钱的纯利润。反过来对可口可乐公司而言，卖出的每一杯饮料也都会带给他们0.75美分的利润，所以他们也是杯杯有利可图。

可口可乐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人们认为它具有医疗功效。此外，公司运营战略的及时调整也极大地推动了产品的销售。直到1895年，可口可乐主要还是被当作医疗保健产品来卖，当时它被称作是“治疗头疼的权威产品”等。然而，把可口可乐当作药物来卖的话，人们就只关心它所治疗的病症，这样一来，消费市场就仅局限于那些自认为有相似症状的人群。相比之下，如果把它当作一种普通的提神饮料来卖的话，那么它就能吸引整个世界。因为如果作为药物，可口可乐不可能治好每个人的病；但作为饮料，它能解每个人的渴。鉴于此，可口可乐的广告中不再强调它的药效，广告词也一改原先的晦涩之风，变得更轻快直接：“可口可乐，爽口提神。”以前的广告主要

针对那些身心疲惫的生意人，他们大多数希望能买到疗效好的头痛药或滋补品；而新的广告将消费人群指向了妇女和儿童。很幸运，公司转变这一营销战略的时机刚刚好。1898年，政府决定对成药征税。一开始可口可乐也被列入成药之列，可口可乐公司据理力争，最终取得了胜利，免交成药税。原因就是他们把可口可乐重新定位，不再是一种药物，而是一种饮品。

有趣的是，采用了瓶装出售策略以后，可口可乐的销售量又一次攀升。坎德勒一向都反对将可乐装瓶，但在1899年，他授权商人本杰明·托马斯和约瑟夫·怀德黑德做瓶装可乐的销售。当时，坎德勒根本没把这笔买卖放在心上，所以他没有向这两个商人索取瓶装权的费用，还答应卖给他们糖浆。他的想法是：如果瓶装可乐卖火了，那么他就可以多卖些糖浆；反之，如果他们失败了（在坎德勒看来，失败是意料之中的事），他也没损失什么。后来，瓶装可乐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由于它更便于运送，因此销售点不再局限于汽水店，比如杂货店、运动场等场所随处有售。很快，托马斯和怀德黑德就发现，与其自己瓶装，倒不如把装瓶的附属专利权卖给他人，以赚取高额利润。这样一来，他们就开创了利润丰厚的经营权业务，同时也让美国城镇村庄都有了可口可乐的踪影。



公司于1916年推出的个性十足、外形优雅的可乐瓶。

正当瓶装可乐的销售蒸蒸日上之时，人们日益关注到了成药的危害性及食物中的添加剂和掺杂物对身体的危害性。代表控方的是哈维·华盛顿·威利。作为一个政府部门的科研工作者，他特别关注假药对儿童的危害。1906年，他的长期游说活动终于有所回报，美国通过了《1906年纯食品和药品法》（又被广泛称为《威利博士法》）。一开始，这些条例似乎对可口可乐极为有利，它曾颇为自豪地宣称新“法案”保证了其饮料的销售，因为它的很多竞争对手都因为不符合要求而退出市场。然而好景不长，就在第二年，威利表示他要调查可口可乐，理由是可口可乐含有咖啡因。他的担忧是，风靡全国的可口可乐与咖啡和茶不一样，它的饮用人群不仅有大人，并且还有孩子。家长们大多都不知道可口可乐内含有咖啡因，而他们的孩子们正在以这种方式吸毒。

1511年，卡伊尔·拜格把咖啡推上了麦加法院的被告席。1911年，威利把可口可乐推上了美国联邦法院的被告席，案名为“美利坚合众国对40大桶和20小桶可口可乐的案件”。庭上，正统派基督教徒对可口可乐大加批判，指责它所含有的咖啡因会提高性犯罪率。政府部门的科学家们详

细说明了可口可乐对兔子和青蛙所产生的影响。而可口可乐公司提供的专家证人则百般强调可口可乐的好处。大剧院以这场历时1个月的官司为素材，编写了控诉陪审团徇私舞弊的故事，并冠以“8杯可口可乐所含有的咖啡因足以让人致命”的敏感题目，其实这并不属实。威利控告可口可乐是基于道德上的考虑，他并没有确凿的科学根据。可口可乐含有咖啡因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问题是这些咖啡因对人体，尤其是对孩子们，到底有没有危害？科学证明它是无害的。另外，咖啡和茶不是也含有咖啡因吗？而威利却没有禁止它们的意思。

鉴于以上的考虑，这起案件的争论最终聚焦到两个问题上：第一，可口可乐公司在其广告中有没有对产品做不实报道；第二，可口可乐公司是否可以称其产品是“纯净饮料”。可口可乐公司最终打赢了这场官司。法院认为，可口可乐这个名字如实反映了该饮料内有含古柯成分的咖啡因，由于咖啡因一直都是可口可乐的配方之一，所以它不能算是添加剂，因此可以称该饮料为纯净饮料。这就是说，上面所提到的需要裁决的第2条在上诉的过程中被推翻。原被告双方同意庭外调解。调解的结果是将可口可乐的咖啡因含量减半。可口可乐公司还承诺在今后的广告中不会有孩子参与的画面（这条政策一直持续到1986

年），但重要的是它把可口可乐这种含咖啡因的饮料卖给孩子已经得到了法律的准许。随着瓶装饮料的流行，可口可乐已经成功地把这种世界上最流行的毒品——咖啡因的使用扩大到茶和咖啡无法触及的领域。

为了把饮料卖给孩子而又不直接在广告中说明。可口可乐公司可谓绞尽脑汁，独辟蹊径。最有名的是1931年首次出现的那些欢乐海报，上面画着圣诞老人喝可口可乐的情景。人们大都错误地认为：可口可乐公司是想通过这些海报来塑造一个留着胡子，身着白色镶边红袍的现代圣诞老人形象，可口可乐公司之所以选择这两种颜色是因为这与他们公司的标志相匹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穿红衣服的圣诞老人形象其实早就有了。1927年11月27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一位圣诞老人出现在纽约市的孩子们面前，他身高、体重和外貌都十分标准：身穿红外套，头戴圆兜帽，留着雪白的胡子，浓密的眉毛下是通红的脸颊和鼻子；背着满满一包玩具，挺着大肚子，正笑容可掬地向人们问好”。不过，可口可乐公司用圣诞老人做广告的真正意图是直接指向孩子们的，它希望能引起孩子们的注意，并希望人们把可口可乐和欢乐祝福联系在一起。

美国精华

20世纪30年代，可口可乐公司遇到了三大挑战：1929年，华尔街股市暴跌，美国经济随后就进入了大萧条时期；百事公司的崛起以及该公司极具竞争力的产品百事可乐；政府解除了从1920年开始实行的禁酒令，这对可口可乐的销售应该是强大的冲击。某媒体曾质问道，“现在人们可以喝到地道的啤酒和‘真正属于男人的’威士忌，还有谁会去喝那些‘没酒劲儿的汽水’？答案既开放又肯定：可口可乐马上就要风光不再了”。然而事实上，取消禁酒对可口可乐的销售量影响甚微，可口可乐与酒精饮品似乎满足的是人们两种截然不同的需求。所以，可口可乐的饮用场合实际上是在继续扩大。

对一些人来说，可口可乐已经代替咖啡成为社交新宠。与酒精饮品不同，可乐被人们视作适于全天候饮用的饮品——即使在早餐饮用也无伤大雅——而且，老少皆宜。在禁酒时期，可口可乐公司杰出的广告员阿哥·李努力推动了可口可乐在汽水店中的销售。作为酒精饮品的替代品，可乐给人以欢乐、友好的形象，同时也为人们逃避经济萧条的残酷现实提供了一种方式。阿哥·李还利用广播这项新技术来宣传可口可乐，并让可口

可乐在许多电影中闪亮登场，这进一步使人们把这种饮料与开心和逃避现实联系在一起。可口可乐的广告展示给人们的总是欢乐而无忧无虑的世界，因此，可口可乐公司在大萧条时期仍然生意兴隆。

当时有位投资分析家注意到，“无论天气多么恶劣，竞争多么激烈，甚至在今天经济如此萧条的情况下，可口可乐的需求量仍是与日俱增”。这种夏日解暑的饮料在冬天也大有市场。它顶住了酒精饮品的冲击，自成一格；同时带动了全球对咖啡因的消费。它是大众实惠的享受，即使在经济低迷时期，人们依然对它念念不忘。

上述一些因素也对可口可乐的对手——百事可乐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百事可乐的起步可以追溯至1894年，先后经历了两次破产后，到了20世纪30年代，纽约商人查尔斯·古思接手之后，它逐渐壮大并成了可口可乐最强劲的对手。查尔斯·古思是糖果和汽水连锁店的老板，他没有和其他商店的老板一样选择出售可口可乐，而是接手了面临破产的百事公司，在自己的店里出售百事饮料。查尔斯·古思决定，既然可口可乐6盎司卖5分钱，那么他就以同样的价格提供12盎司百事可乐，以量取胜。此举赢得很大成功。因为可乐的成本主要是在装瓶和运输上，所以加大饮

料分量并不会增加太多的成本，但这样对于精打细算的顾客而言就很有吸引力了。随后，两个对手因为商标侵权问题（可口可乐诉百事可乐侵权）打起了官司，这场官司一拖就是好几年，双方心力交瘁，最终在1942年通过庭外调解平息了这场风波。可口可乐同意不再和百事可乐纠缠商标问题，百事可乐则选择了一个能明显和可口可乐标志区分开来的红白兰相间的标志。调解还达成一项协定：凡是含咖啡因的棕褐色的碳酸软饮料都可以用“可乐”一词命名。最终，这两家公司共存下来并且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受益——竞争对手的存在让可口可乐必须不停地创新进取；而百事可乐的营销战略（以与可口可乐相同的价格卖双分量的百事可乐）也是在可口可乐打开市场的基础上才显灵。这是一个经典的竞争促进双赢的例子：激烈的竞争能带给消费者很大实惠，从而扩大产品的市场需求。

到20世纪30年代末，可口可乐公司空前强大。它已成为美国民众心中的民族企业，占有全美汽化软饮料近一半的销售额。可口可乐是一种大规模生产和销售的产品，其消费人群既有富人也有穷人。威廉·艾伦·怀特是一位退休记者，一位受人尊重的、著名的社会评论家。他在1938年宣布：“可口可乐是美国魂的精华象征，是真材实料、流传广泛而又能不断创新的生活好伴

侣。”可口可乐征服了美国，它将进而征服全世界，跟随美国日益扩大的影响而遍布世界各地。

瓶子里的全球化

美国世纪

20世纪是世界人民为政治、经济和个性解放，与各种压迫进行斗争的年代，也是一个充斥着战争、屠杀和核灭绝危险的100年。直到这个世纪走近尾声时，人们才普遍意识到：只有被赋予民主权利，推行消费者至上主义，摈弃许多固有的歧视，并在政治、经济和个体领域拥有自由，人们才会感到幸福。

“二战”爆发时，可口可乐已经打入了好几个国家的市场。但直到美国成为全球性的超级大国以后，可口可乐才真正成为一个全球性品牌。1796年，乔治·华盛顿在离职演说中讲道，“我们的正确方针是：不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结成永久同盟”。在随后的整个19世纪，美国也一直遵循着这条方针。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例外，美国帮助英、法联军对抗德国和奥地利，并使战局转向对前者有利的方向，但许多美国人（大部分是孤立主义者）认为这次例外是一个错误。20世

纪30年代，一些孤立主义者主张美国再也不要插手欧洲争端。然而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卷入“二战”，这意味着孤立主义在美国从此偃旗息鼓。美国开始向世界各地派兵，总计1 600万人次，伴随他们辗转世界各地的还有可口可乐。

在战争动员时期，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罗伯特·伍德拉夫发出一条指示，“公司将不惜亏本，争取让每一位士兵在任何地方都能花5分钱买到一瓶可口可乐”。可口可乐早就深受士兵们的喜爱，他们在操练的时候就饮用这种既不醉人又能提神的饮料。可口可乐公司出此良策不仅保持了可口可乐的销售量，更让人们把可口可乐与爱国主义联系起来。此外，身处遥远军事基地的士兵们也的确非常喜欢可口可乐，有了它，他们方能寄托思乡之情，士气大振。

一位军官在写给可口可乐公司的信中说，“在这国家民族危难的时刻，我们衷心地希望贵公司能继续给我们提供饮品。”还有一封信这样写道，“我们认为，可口可乐是鼓舞官兵士气的一剂良药”。此类信件不胜枚举，加上军方明确支持的态度和政客们的多方游说，1942年，可口可乐公司获得不受蔗糖配额供应限制的特权，原因是该公司的产品属军需品。这样一来，在竞争对手们因为限额供应而不得不减半产量的

时候，可口可乐却能得以继续保持产量不变。

然而，如果要把瓶装的可口可乐运往驻军基地的话，需要绕半个地球。这样做十分不经济，至少如此一来它占用了太多宝贵的船运量。因此可口可乐公司就在离基地最近的地方设立了专门的装瓶厂和汽水厂。这样一来，公司就只负责往这些厂运送糖浆就可以了。在许多军官的眼里，维持可口可乐生产正常运转的这些雇员和那些开飞机、坦克的兵士一样重要。军队授予他们“技术观察员”的荣誉称号，还授予军衔，这就是那些所谓的“可乐上校”。整个战争时期，他们在全球共建立了近64家军用装瓶厂，共生产饮料近百亿瓶。这些“技术观察员”设计了一种适于在丛林中使用的便携式自动饮料机，以及一种能进出潜艇舱门的微型自动饮料机。与此同时，他们还把可口可乐推广到美海外驻军基地周边的外国平民中。后来，许多外国人也逐渐喜欢上这种饮料。它的市场不断地扩大，世界各地的人民，从波利尼西亚到祖鲁，第一次尝到了可口可乐的味道。

如今，在可口可乐公司的档案馆里存放有成百上千封信件。从这些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美国士兵们的心里，可口可乐代表着他们的国家。有一位士兵在信中写道，“对我而言，受苦是为了两件同等重要的事情：第一，能让我国的

人民无忧无虑地享受国家给予的福利；第二，我们能像以前一样快乐地喝可乐”。另一位士兵写道，“如果有人问我们战斗的目的是什么，我想我们中有近一半的人会说是为了能再买到可乐”。尽管当时海外一些遥远的战区也能买到可口可乐，但士兵们还是非常珍惜。他们往往把可乐留起来等到特别的场合饮用，或以不可思议的高价卖给别人。在所罗门群岛上，一瓶可乐可以卖到5美元，在卡萨布兰卡，可以卖到10美元，在阿拉斯加，竟可卖到40美元。罗伯特·司各特是太平洋战场上的一名飞行员，在击落第5架日本飞机后，他被授予“王牌飞行员”（击落敌机5架以上者）的荣誉称号，并获得了一瓶可乐。他觉得这瓶可乐太珍贵了，自己没舍得喝，送给了一位在他伤势严重时曾为他动过手术的外科医生。

军队中喜欢可口可乐的不仅仅是士兵和下级军官，很多高级将领也对它赞不绝口，比如：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奥马尔·布拉德利、乔治·巴顿等将军们就很喜欢喝可乐。将军中最喜欢喝可乐的当数欧洲盟军总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1943年6月，在视察盟军在北非的作战态势时，他发了一封电报，详细地列举出那里需要“300万瓶可口可乐（灌满的）和一整套能月产6 000万瓶可乐的设备（包括装瓶、洗瓶和封瓶设备）。在设备送到之前，先送10台能单独工作的机器放在不同

地方，这些机器要求日产量要达到2万瓶。另外还要送来足够生产600万瓶可乐的糖浆和相应数量的瓶盖”。6个月后，北非就架设了多条可口可乐生产线。次年，盟军在D日（行动开始预定日的缩写）行动中完成了著名的诺曼底登陆，可口可乐也随着盟军部队进入了西欧。在横渡莱茵河的战役中，美国部队甚至用可口可乐作为暗号。



You work better
refreshed

有了精神，工作才有效率。“二战”时期的可口可乐广告。

相反，可口可乐早在战前就进入了德国和日本市场，并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尤其是在德国。尽管如此，这两个轴心国的成员国却对可口可乐大肆批判，说它是美国罪恶的典型。避开可口可乐在他们国家大受欢迎这个事实，纳粹的鼓吹者们嘲弄“美国人对世界文明做出的唯一贡献就是发明了口香糖和可口可乐”。无独有偶，他们的盟友日本人则宣称：“进口可口可乐就等于是进口了美国社会的病毒。”

1945年，盟军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可口可乐的军用生产线并没有马上撤回。在随后的战后重建时期，这些生产线继续运转了3年，其销售对象也转向平民。

冷战，可乐战

在可口可乐众多热爱者中，苏联最伟大的军事指挥员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元帅最值得一提。正是他成功地顶住了德国人对苏联的进攻，后来又率领队伍挺进柏林，结束了欧洲战场的战争。朱可夫是少数几个敢于对斯大林说“不”的人之一。战后，美国和苏联为如何划分德国进行了谈判。谈判期间，在艾森豪威尔的推介下，朱可

夫尝到了可口可乐，并深深喜欢上了这种饮料。但随着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较量日益升级，朱可夫不愿继续饮用这种深刻体现美国价值的饮料了。为此，朱可夫提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要求：可不可以去掉可口可乐的棕褐色，让它看上去像传统的俄罗斯饮料——伏特加呢？这一想法传到了可口可乐公司，经美国总统哈瑞·杜鲁门的签字同意后，公司为朱可夫生产了一批无颜色的可乐。这批饮料装在圆柱形瓶子里，盖子是白色的，标签是一枚苏联红星。

1948年，联合国成立的喜悦逐渐淡去之时，苏联封锁了西柏林。当时，西柏林是西方国家所占据的、在地理位置上凸入欧洲苏占区的一块小小的区域。苏联此举无疑是对美国的一个直接挑衅。作为回应，西方国家昼夜对西柏林进行物资空投，此举持续了1年有余，直到苏联解除封锁。1949年，美国和其欧洲盟国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则建立了华沙公约组织予以回应，从此，长达数十年之久的以军备竞赛为主要标志的冷战拉开了帷幕。在此期间，两大集团为扩大各自的影响力而暗中较劲，并在世界多个地方发动了受这两个集团背后操纵的战争。然而，双方从未有过正面的军事冲突。可口可乐原被看作是美国的象征，但自北约建立以后，它的象征意义扩展到代表整个西方世界的价值观——自

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20世纪40年代，可口可乐公司加快了向海外市场进军步伐。到1950年，公司1/3的利润来自海外。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与社会主义势力进行较量。与此同时，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同期，美国政府采取了马歇尔援助欧洲重建的计划。对于那些反对美国扩张势力，并把马歇尔计划视作是帝国主义行径的人来说，可口可乐无疑是最好的出气筒。有些法国人把可口可乐的海外销售称之为“可乐殖民运动”。为反对可口可乐在法国开办新的装罐厂，他们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运动。他们认为可口可乐会损害国内葡萄酒和矿泉水业的发展。他们甚至竭力把可口可乐列为有毒产品，在法律上予以禁止。这样一来美国人坐不住了，他们大骂法国人“忘恩负义”。美国国内的一些报纸社论呼吁政府停止马歇尔计划中对法国的资助部分。针对法国人说可口可乐有毒这一点，公司官员反问道：“试问，可口可乐对那些解放了法国的美军将士们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了吗？”法国报纸对此做出了类似的反应，《世界报》警告说，“法国人的道德已经退化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法国的抗议者们捣翻了装运可口可乐的卡车，砸碎了可乐瓶。然而，他们这样做并没有给可口可乐的销售带来多

大的影响，相反，这样做不但帮可口可乐做了大量的免费广告，还让可口可乐披上了异邦之饮和违法之物的色彩。

类似的运动在其他国家也很多。一些激进的人认为可口可乐有害健康，而且可口可乐的传播会使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污染欧洲文明。这些运动的主要支持者通常是酒商、矿泉水装罐商及软饮料生产商。看到激进分子们卖力地进行反可口可乐运动时，他们心里乐开了花。奥地利的激进分子宣称，他们国家的可口可乐工厂瞬间就可以变成一个原子弹制造厂。意大利的激进分子声称可口可乐让他们国家的孩子们一夜之间白了头。对此，可口可乐公司不作任何回应，他们埋头苦干、艰难前进，并不断开辟海外市场。因为他们深信：只要顾客亲口品尝到了可口可乐，这些谣传就会不攻自破。后来还有人对可口可乐进行了更加荒谬的攻击，他们谣传喝可口可乐会让人变得性无能，甚至会导致癌症或不育症，然而这种谣言也随着可口可乐的日益盛行而逐渐淡去了。



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在1959年莫斯科举办的美国贸易文化展览会上，图为他们在百事产品的展台前。

1959年，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莫斯科时，在一场专门展示美国产品的商品交易会上，与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互相攻击。但在参加百事公司的公关宣传时，记者拍到了尼克松和赫鲁晓夫在百事产品展台前一起喝百事可乐的照片。1965年，可口可乐公司打算在具有广阔市场的苏联建厂，但立即碰了钉子。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允许经营私有企业。如果可口可乐公司在苏联建了厂，那么就要吸收苏联政府作为股东，这样一来，公司的利润就会滚滚流进苏联政府的腰包。另外，随着越南战争不断升级，美

国内批评家们提出，可口可乐在苏联建厂就等于资助了敌人。鉴于这些问题，可口可乐公司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样一来，百事公司就获得了一个良好的契机。1962年，尼克松在竞选加利福尼亚州长失败后当上了百事公司的法律顾问，并成为百事可乐的海外代言人。由于没有打“反共”的旗号，百事可乐在那些所谓的“铁幕”国家中就比较容易立足。1965年，百事可乐在罗马尼亚投资建厂，并在尼克松的帮助下把产品销往苏联。1972年，苏联授予百事公司专用许可证。1980年，可口可乐公司与苏联达成协议，苏联用可口可乐作为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官方软饮料。然而就在可口可乐要进入苏联市场的节骨眼上，由于苏联侵略了阿富汗，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作为抗议，宣布美国将拒绝参加即将举行的奥运会，因此，可口可乐又一次被挡在了苏联的大门外。1989年，德国人民推倒了柏林墙，以及1991年的苏联解体，迎接他们的是可口可乐。一位目睹这一时刻的人后来回忆说，“我们手上拿着香蕉、可口可乐、鲜花和其他一些代表西方用户至上主义的东西，来热烈欢迎这些来自墙那边的同胞们”。东德的人在西德的可口可乐工厂前排队，等候着从厂家直接成箱购买饮料。当时东德人急切想购买的物品主要有：高保真音响制品、

电视机、电冰箱，当然还有成箱的可口可乐。

中东的可口可乐

由于可口可乐与美国价值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除了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外，世界上还有一个地方对可口可乐没有好感，那就是中东。1966年，一位以色列商人指控可口可乐公司为保全更大的阿拉伯市场而退出以色列软饮料市场。因为阿拉伯国家气候炎热，而且严禁饮酒，所以该地区对于可口可乐而言无疑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市场。可口可乐在该地区的年利润额高达2 000万美元。对于以色列的指控，可口可乐公司解释说，1949年他们本打算在以色列投资建厂，但遭到了以色列政府的干涉。另外以色列市场太小，公司担心投资难以收回成本。有评论家指出，可口可乐公司这些解释完全是借口，因为塞浦路斯（地中海东部一岛）比以色列小得多，但可口可乐却在那里建了厂。于是人们对可口可乐公司的这种“反犹太主义”倾向开始大肆口诛笔伐。美国的一些犹太组织，包括曼哈顿的西奈山医院和科尼岛上著名的内森热狗商场联合抵制可口可乐。

迫于压力，可口可乐公司宣布授予以色列特拉维夫市可口可乐的生产经营权。然而，此举又惹恼了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阿盟呼吁其成员国联合抵制可口可乐。这一次，可口可乐公司没有让步。于是1968年8月，阿盟开始正式抵制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公司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很务实的，因为如果不放弃阿拉伯市场，一旦国内的犹太人全都起来抵制可口可乐的话，那样造成的损失将会更大。可口可乐的选择再一次契合了美国的外交政策。趁此机会，百事可乐退出以色列，转而进入阿拉伯市场。此举使百事失去了一些国内顾客，因为犹太人都认为这种做法属于反犹太行为。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阿拉伯的抵制运动才最终结束，这样可口可乐得以再次打入阿拉伯市场，尤其是埃及、黎巴嫩和约旦。但已成为百事可乐第三大国外市场（前两大国外市场分别是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沙特阿拉伯才是真正的大蛋糕。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可口可乐公司用冷冻车为驻沙特阿拉伯的美国部队送去了可乐，但他们根本无法与在沙特阿拉伯开有5家工厂的百事可乐较量。全世界的电视观众都看到了把伊拉克部队赶出科威特的美国联军总司令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在签订停火协议时，身边放着的是一罐百事可乐。对此，可口可乐所采取的策略是加

大在沙特阿拉伯市场的竞争力度，让百事可乐疲于应付从而腾不出精力和它抢占其他市场。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通过攻击软饮料来表达反犹太主义的形式也多样化了。泰国的穆斯林青年们把可口可乐倒掉以抗议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在反美运动高涨的地区，可口可乐的销售量几乎是零。与此同时，中东开始盛行本地产可乐。伊朗出现了一种极受伊拉克、卡塔尔、巴林和沙特阿拉伯欢迎的伊斯兰可乐。生产这种叫作扎姆扎姆可乐的公司先前是百事公司在伊朗的一个合作伙伴。这种可乐上市的第一个星期就在上述地区卖出了400万罐。西岸公司生产的明星可乐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深受欢迎。对于可口可乐保持与美国政府采取同样步调的做法，有人反对，也有人支持。2003年4月，美国部队攻入巴格达并攻占了萨达姆的官邸，为此他们举办了一个烧烤聚餐，人们吃的是汉堡和热狗，喝的当然是可口可乐了。

饮料带来的全球化

可口可乐不仅向世界展示了美国，还向世界介绍了一种全球市场统一化的商业模式，即贸易

全球化。对于全球化，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声音：支持者们主张各国取消关税，打破一切贸易壁垒及其他影响自由贸易的障碍，是让全世界各国，无论先进发达国家还是落后贫穷国家更快富起来的最好途径。比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办厂就是一件双方受益的事：发达国家可以减少产品成本，而发展中国家则可以增加就业机会，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反对者则谴责这种行为是一种赤裸裸的剥削，因为他们通常让发展中国家人民做的都是一些薪水低地位低的活儿。另外，通过雇佣岗位向国外转移，跨国公司可以雇到更廉价的劳动力，获得更宽松的法规环境。如此这般的纷争至今仍不绝于耳，经常听到的抱怨是，随着一些跨国公司把它的触角伸到世界各地，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竞争，全球化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一种新形式而已。一些反全球化的激进人士认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正准备打一场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炮的世界征服战，他们进行的是文化渗透，市场扩张和以微软、麦当劳、可口可乐为代表的品牌战。

就单个产品而言，可口可乐无疑最能代表全球化。它和百事可乐的较量发生在全球的每个角落，中国是他们竞争的新战场。可口可乐已经在

全世界200多个地区开办了公司，其数量远远超出联合国的成员国数。可口可乐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广为人知的产品，而且据说知道“Coca-Cola”这个词的人仅比知道“OK”的少。可口可乐公司可谓是名声远扬，深得民心，对此的确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与其相提并论。在《商业周刊》每年公布的全球最有价值的商标中，可口可乐一直独占鳌头。

但是，如果人们不想要某种产品时，品牌的名气再大也不能说服他们掏腰包。尽管反对全球化的人恰持与此相反的论点，很多人都是冲牌子才去买可口可乐的。1985年，可口可乐公司推出了“新可乐”——一种更接近百事可乐的甜可乐。这一次，品牌效应就不起作用了，自上市以来，这种可乐很少有人问津，使得可口可乐公司的销售量一落千丈。最终公司不得不在几周内重新推出早先的可乐，现在叫作“复古可口可乐”，以挽回市场。这样，可口可乐公司想对自己“美国的象征”的形象作一些改变的努力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了。

1997年，《经济学人》杂志上的一则分析发现：可口可乐的消费不仅代表了一个国家全球化的程度，更与该国的国力、人民的生活水平（以美国制定的标准进行衡量）、人身自由及政治自

由的水平息息相关。该分析最后总结道，“这种拥有世界市场的嘶嘶起泡的饮料，加上它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确是于国于民极为有利的”。当然我们不能说可口可乐让世人变得更加富有、幸福和自由，但在顾客至上主义和民主向全世界发展的过程中，可口可乐总是能紧随其后。

可口可乐是21世纪当之无愧的饮料代表，它见证了美国的崛起、资本主义的兴盛以及全球化的发展。无论你对这种饮料持有什么态度，有一点你无法否认，那就是它对整个世界有一种无法抗拒的魅力。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的名称为：周读 网址：www.ireadweek.com

译者后记

你相信吗？一些饮品曾塑造过人类历史。

饮品是我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作为生活必需品之一，饮品自然地融入生活的大背景中，其历史渊源和历史意义往往被人们忽略。即使我们偶尔想起它们的存在，也难以意识到它们曾经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就这一问题，汤姆·斯丹迪奇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

本书所关注的是在我们现代生活中最具代表性和文化意义的六种饮品，它们分别是：啤酒、葡萄酒、烈酒、咖啡、茶和可口可乐。对于我们而言，这六种饮品看似不足为奇，但实际上都非等闲之辈。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它们都分别扮演了令人意想不到的重要角色。汤姆·斯丹迪奇以独特的视角、翔实的史料、生动的笔墨，纵横古今，谐趣四方，透过六种饮品的发展史，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丰富生动而又意味深长的人类历史画卷。

透过六个瓶子看历史，将人类历史浓缩于六

种饮品的发展史当中——这是本书视角的独特之处。与传统记述历史的方法不同，本书的作者按照各个时期流行的不同饮品把世界历史划分为六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一种标志性饮品。这些饮品曾对当时的社会产生过巨大影响。它们体现着各自时代的文化特质，左右了社会的发展方向，并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以上只是对该书轮廓的概述，书中的万千精彩远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历史的辗转，社会的进步，文化的更迭，个中趣味还须读者自己领略和品味。本书作者汤姆·斯丹迪奇是《经济学人》杂志科技编辑。多年来，他笔耕不辍，曾著有多部著作，荣登2005年《财富》杂志“最睿智书籍”榜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一书便是出自斯丹迪奇之笔。

本书是作者的最新力作。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作者游访了诸多相关国家，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参考了多方面的历史典籍，并多次与业内人士进行沟通，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才著成了这样一部翔实而精彩的作品，为我们追溯历史提供了优秀而珍贵的参考。

古人云：“饮水思源。”我们在享受这些饮品的同时，也应追忆一下它们的缘起和历史脉络，

进而追思人类历史。本书为我们的追本溯源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空间。书中大量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史实真相，名人轶事，五花八门，异彩纷呈。如此精彩的一本好书，绝不可错过！

本书翻译的具体分工情况是：葛文聪译葡萄酒和咖啡的部分，满海霞译啤酒和茶的部分，郑坚译烈酒、可口可乐部分。最后，由吴平对全部的译文内容进行审订，修正错误，统一风格。

译者

2006年6月6日于北京语言大学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加小编微信一起读书

小编微信号：2338856113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20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 1、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 2、 每年豆瓣，当当，亚马逊年度图书销售排行榜
- 3、 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 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著
- 6、 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 7、 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 8、 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 9、 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 10、 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和得到电子书

也可以在我的网站（周读）www.ireadweek.com

自行下载

备用微信公众号：一种思路

